



2021年  
第1期  
总第2期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 田野观察

清华地区研究学人的田野故事

主 责 助

编 编 编

理 组 组

许 高 张

帅 良 静

董 李

慧 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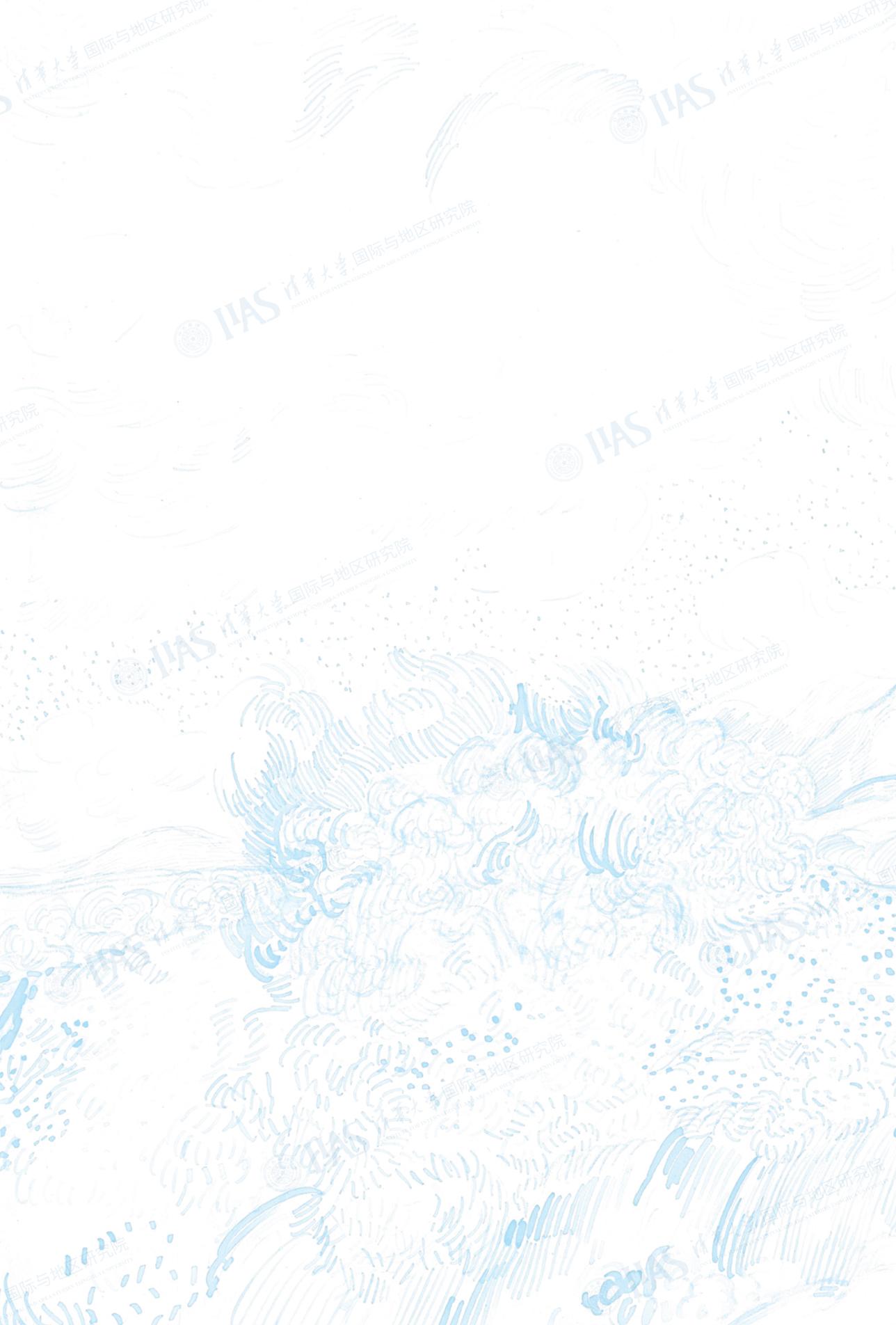
熊  
星  
翰

李

音

郑

楠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TSINGHU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STITUTE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 目录

引 言	I
-----	---

## 学 语 言

杨崇圣	田野期间的语言观察和有效沟通 ——有关我在南非的田野	1
王书剑	在巴黎遇见非洲：我的法国豪萨语研修记	9

## 观 社 会

李 音	墨西哥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吗？ ——反思公共安全与治理策略	21
江 源	田野琐记：曾经平静的提格雷	28
江 琪	摩洛哥的那些社会百态	38

## 悉 他 性

高良敏	美丽“她者”：我的坦桑尼亚二房东	49
刘岚雨	伊朗式个人主义：家之外的自我追逐	64
梁孔孔	苏普拉 (Supra)：走进格鲁吉亚的传统宴会	73

## 体 民 情

袁梦琪	让我为你撑起一个“屋顶”： 记一次在阿根廷志愿建房经历	83
刘博宇	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的田野笔记	95
唐溪源	喀麦隆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田野调查记	104

## 在 他 乡

熊星翰	从“世界尽头”到篮球往事 ——在法国、美国、马达加斯加打球的那些年	115
肖齐家	一个中国女孩在坦桑尼亚的烧烤创业记 (下)	124
曾嘉慧	日惹几日几人	133

## 引言

清华大学地区研究学人足行全球南方已近十载。“田野”的磨砺推进着自我的成长和他者认知的历程；同时，自我与他者也共同参与、共同见证着学人的成长。对于地区研究学人而言，“田野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工作程序”，更是一个生活上、情感上的“修行”，历史镜像、客观事实、主观意志等等并行其中，相互渗入、相互形塑。

简单而言，我们长期的田野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强烈的文化冲击、不适感、逐步适应等一系列生活化的洗礼。在这一过程中，他者与我们相互嵌入对方的生活、学习、研究之中，相互活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自我外部世界他者的认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西方因素”或自我臆想的建构，尽管这种困扰不可避免，也并非不“真实”，但它确实是一个萦绕于田野的幽灵，影响着我们对于“他者”的认知。同样，在学理上，各个学科、各个学者对“他者”都有着不同理解和定义。

那么，研究者自身所拥有的背景知识、研究视角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所谓“他者”的客观真实的？当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自居时，是否就已经预判了田野工作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庄子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无论在进入田野前研读过多少对象国文本，在语言上进行过多少准备，我们又是否能在田野工作中真正捕捉和论证“他者”的真实？汇聚众多学科对于“他者”的反思以解开上述种种迷思，才能为我们理解自身的田野经历提供更多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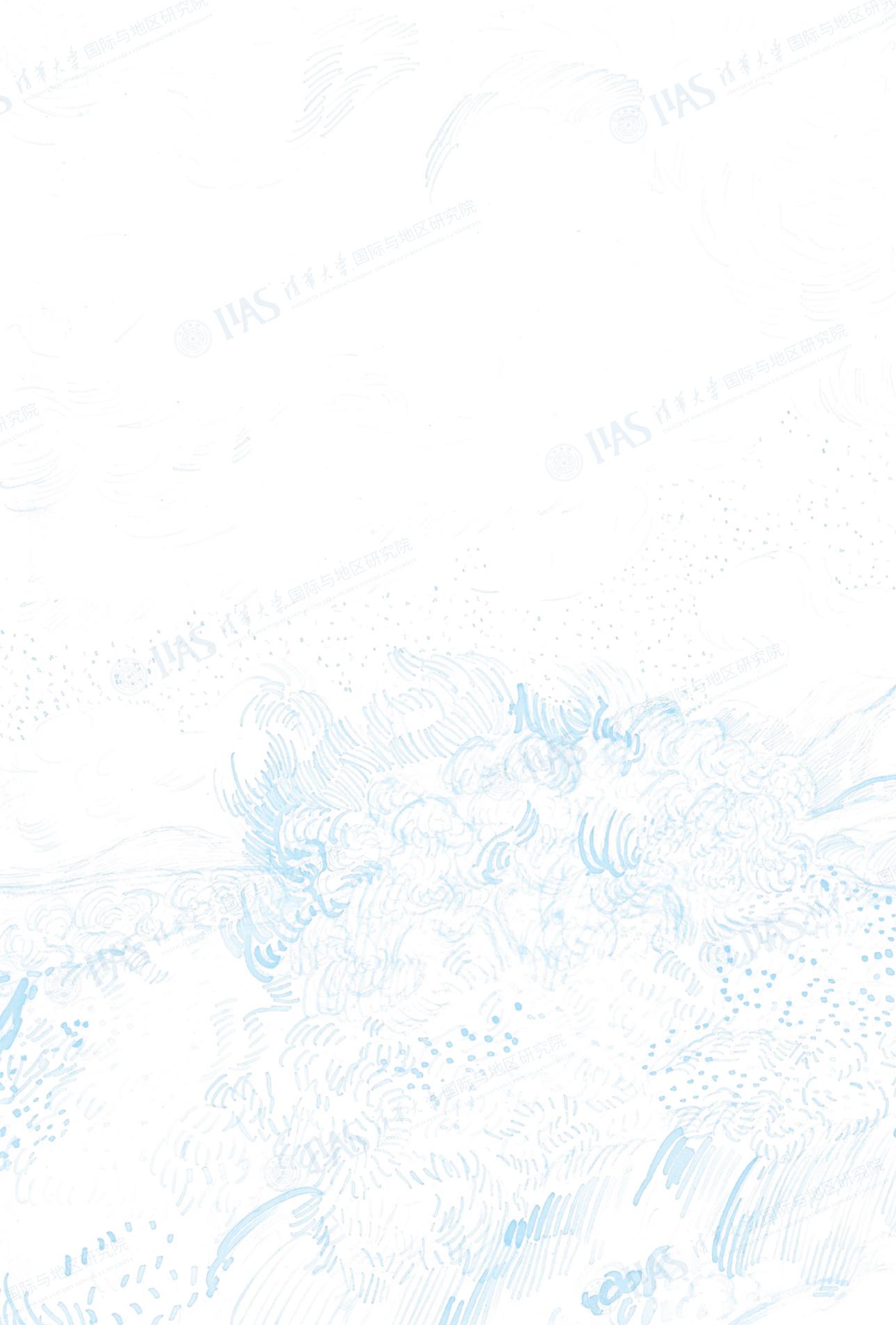
在田野中，我们会遭遇或者邂逅形形色色的图景和元素：**人**——我们的老师、朋友、同事/学、访谈对象、房东、警察，等。**事**——喜怒哀乐之事、七情六欲之事，芝麻般的生活琐事，等。**物**——食物、礼物、交通工具、文化之物或意义之物；**动物**——鸟、狗、猫、猪、牛、羊、鱼，等。**空间**——城市、

社区 / 农村、学校、研究所、医院、警察局、移民局、图书馆，甚至卫生间、厨房等生活空间，等。**情感**——特殊的社交礼仪场景，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或有特殊意义的情感场景或空间，等。**自我**——了解他者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自我，甚至发现自我、批判自我的过程。换言之，田野之“他者”，不再抽象、神秘或充斥着臆想，而是真实、可触摸及灵动之“他者”，其真实的另外一面也在于回望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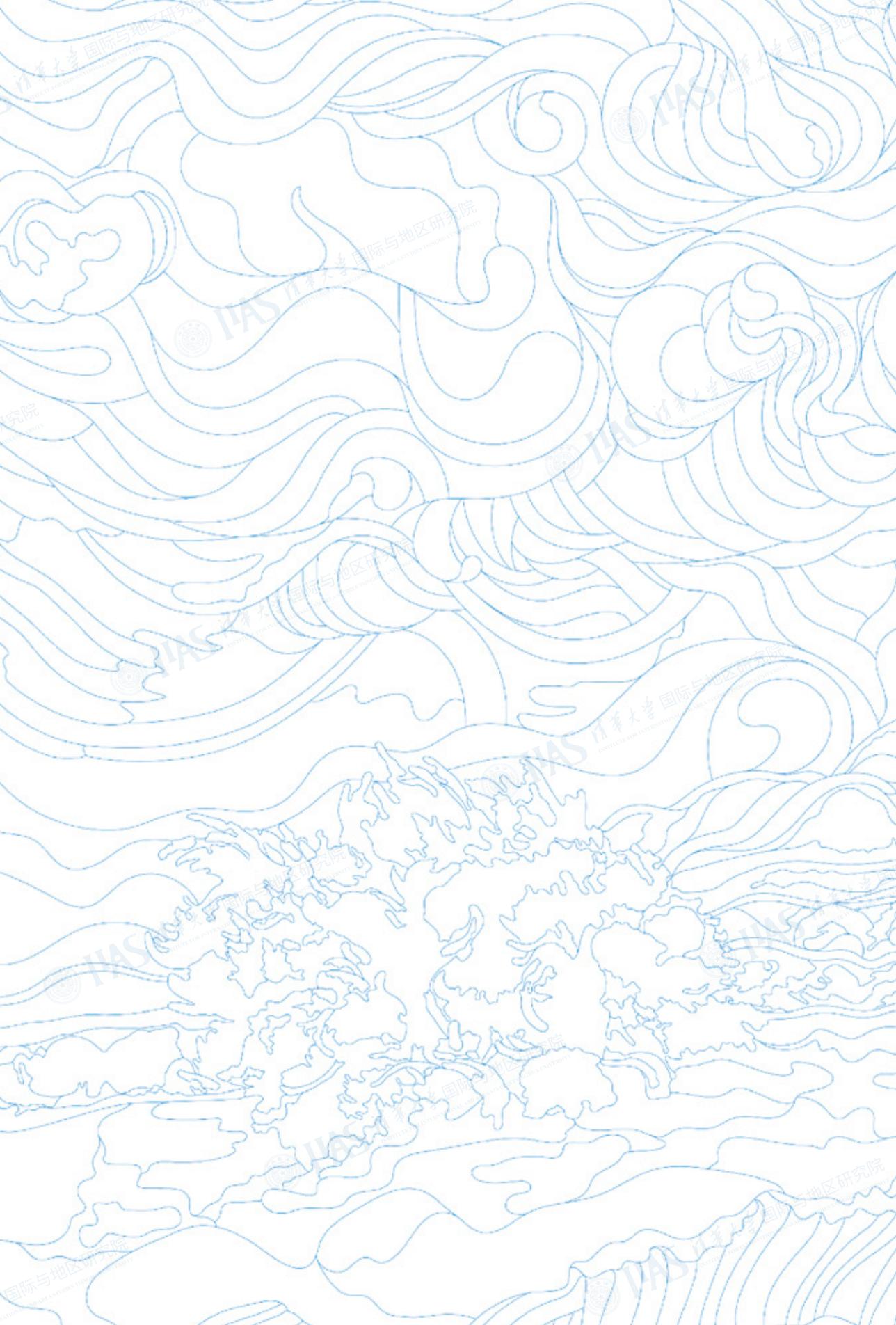
在田野中，我们还会经历步步深入的认知转变与学术成长：起初，我们懵懂、模糊，带着想象，甚至是臆想，它们困扰着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而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后，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拥有微观或日常生活层面的细腻感触，乃至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从而使得我们对“他者”的认知逐步清晰化，对他国的理解、自我的了解也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推动对既有学理研究的反思和批判。

基于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成立《田野观察》责编组，组织院里有长期发展中国家田野调研经历、发达国家访问学习经历的研究员、博士生及部分优秀的外院外校地区研究人员来共同讲述我们的田野故事，以供地区研究学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感兴趣的大众阅读。从地区研究学人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夹叙夹议、有温度的方式，再现田野生活的各色图景，思考“他者”与“自我”的关系，进而彰显田野调研与地区研究之间的张力，重塑其重要性并探讨其意义之可能。责编组拟推出《田野观察》系列，第一期 16 篇稿件已于 2020 年 10-12 月推出并刊印成册，现第二期刊印稿件共 14 篇，拟按照“学语言、观社会、悉他性、察民情、在他乡”五个部分，呈现真实、鲜活的田野故事。第二期（即本书）已于 2021 年 1-2 月陆续在清华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微信公众公众号《田野观察》栏目推送。

《田野观察》责编组  
2021 年 3 月 15 日







# 田野期间的语言观察和有效沟通 —— 有关我在南非的田野

杨崇圣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南非

## 一、解不开的“SA”情缘

地区研究到底是什么？可能让我滔滔不绝一天也说不完，可能一百个地区研究学者有一百种不同的理念，可谓见仁见智。但不管怎样，“田野”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有田野经验的地区研究学人眼中，那些真实、微小且生动的场景，最能带来交流的震荡和共鸣。

我从本科到博士，从澳洲到非洲，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半球度过。本科所在城市是南澳州的首府阿德莱德，“南澳”英文为 South Australia，简写 SA；南非开普敦大学是我博士调研的地点，我在那停留接近三年。“南非”英文为 South Africa，简写也是 SA。求学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这两个字母组合，可谓巧合，也注定了我与南半球的难舍情缘。

从澳洲“SA”到非洲“SA”，南半球犹如“幽灵”，萦绕伴随。田野中不同经历和见闻都慢慢堆积成难能可贵的财富，若干年后，每每回味，虽有苦汗，却甘之如饴。若问我田野期间印象最深的历练和感悟是什么，语言观察和有效沟通绝对首当其中。

## 二、语言观察和实践：从“请问机器人在哪？”开始

就文化差异而言，得益于长期海外求学的背景，对我的影响其实并不明显。尽管那种所谓的“环境冲击”（environmental shock）鲜少发现，但依旧有些田野糗事可以与大家分享。比如，我在开普敦大学的一次“问路”经历。

我所进行访学交流的机构是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综合性大学。1967年，世界第一例心外科移植手术就在此完成。在该校国际处办完手续后，我还需要前往经济系大楼报到，于是，我拦住了一名学生，发生了如下对话。

我：“Hi,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building of School of Economics is? (你好，请问经济系大楼在哪?)”

学生：“Sure, just keep going until you see the robot, and then take the right turn, it's very near, only a hundred meters. (直走，直到你看到一个机器人，然后右转，很近，只有一百米。)”

我：“Thanks so much. (非常感谢。)”

当时，我非常简单认为，机器人嘛，要么是个地标要么是个店面摆设，看见右转就成。然后我走了好几个路口，大概一公里，还没有看到。然后，我停下再拉住一个学生问道：“Hi,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robot?” (请问机器人在哪?)

他指着交通信号灯说：“Yo, this is robot.” (这就是红绿灯啊。)

好嘛，我已经走过好几个红绿灯了。

这是我在英语语言环境还不错的南非，第一次感受到不同英语语言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随后我查了词典，发现只有在南非才把信号灯（traffic signal/traffic light）称为 robot，属于有别于其词本意的衍生用法。据说，这是因为在南非还没有交通灯之前，通常是警察在十字路口亲自指挥交通，而交通信号灯被推广后，警察的身影渐渐消失，给人造成了一种“人类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的印象，因此红绿灯被称为“机器人”。

语言习得中，真实语境中的复用是能帮助学习者快速掌握语言表达的路径。知道“Robot”表达红绿灯后不久，我在乘小巴车（Minibus）去市中心的途中便听到了司机和乘客之间常用的各种非正式表达，其中就有一句话叫“After robot”，表示下一个红绿灯下车。还有比如“Short left”表示司机在方便的时候立即停车的意思。有趣的是，2018年，一位豪登企业家以 Aftarobot 为名，推出了一款小巴叫车软件。虽然该应用程序的下载量极低，只有 1000 次左右，但于我而言，看见这个名字能会心一笑，也是满足。



图 1 公路边的 ROBOT 路标

图片来源：<https://www.2oceansvibe.com/2017/07/24>

另一个较深层次的语言观察来自“种族隔离”及其各种表述。种族隔离的英文是“apartheid”，但种族隔离时期，为了掩盖这一非人道政策的丑恶本质，在各种文字表述中，出现了大量与该词类似的委婉表达方式，比如 separate development（分别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并行发展），independent development（独立发展），self-determination（民族自决）等。如单看基本词义，并不能联想到其与种族隔离有所联系，只有在对象国经过大量的学习和深度的田野实践，才能逐步累积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而体会字里行间的区别及其深意。

作为在国外待过好些年的“老司机”，未曾想到，“问路”时发生的糗事、种族隔离的各种英文表述背后其实都蕴含着当地语言的特有用法及其隐喻，甚至指向了“进入田野”的充要条件。

作为地区研究的学者，掌握对象国和田野点的本土语言是有效融入当地环境的重要前提。语言是承载思想的必要工具，但要尝试理解不同国家的细微差别，往往需要探究更深层次的历史渊源。这些细微差别往往会在词汇、俚语和不同语境中有所体现，但未被录入词典文本。只有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除了英语，南非大地还盛行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在民间使用的语言至少有 35 种，其中 11 种为南非的官方用语。比如，阿菲利加语（南非荷兰语，Afrikaans）、祖鲁语（Zulu）、科萨语（Xhosa）、文达语（Venda）和聪加语（Tsonga）等。不同语系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交织和融合，构建出南非语言图景的独特性与多元性。上述认知均源于我的田野，颇有趣味。又如，南非本地最常听到的一个本土表

达是 Mzansi，意为“南非及各族人民”，是一个常用于口头表达的集体名词，也可以作形容词使用，出了南非语境便很难了解其意。这和澳洲人对自己的称呼为“Aussie”有异曲同工之处。总之，在我看来，对这些带有本土特色语言的了解，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融入当地，了解其多样的文化与曲折的历史。

表 1 一些常见南非本土用语

表达	释义	用法	来源
lekker	形容词，表“酷、棒、好”	a lekker meal a lekker sense of humor	和荷兰语中动词“舔”有关
springbok	跳羚，也可形容国家队运动员	Everyone hopes the Springboks will win the championship.	结合了南非荷兰语的 springen (跳跃) 和 bok (羚羊)
padkos	普遍受人喜爱的东西；在南非，padkos 是假日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所谓的小吃在路边的便利店出售，或者在家里制作，然后带在身边	In South Africa, padko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liday travel.	英语
indaba	讨论的事项、事务、说明；在南非经常被用来指代会议	There are indabas for everything from scouting to mining to design.	祖鲁语
braai	Braaivleis 的简写，表“烧烤”	A braai is an opportunity to fire up the grill or get a fire going, grab your favorite meat (maybe boerewors, a kind of sausage), and hang out.	南非荷兰语
yebo	非正式肯定句，表“是的，我同意”	Yebo, baba. = Yes, grandpa	祖鲁语和班图语

表格来源：作者编译

### 三、有效沟通：“柔性博弈”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板斧

在田野沟通中，存在一种隐藏的“柔性博弈”，可以简单理解成知识阶次的博弈。对于研究者来说，若准备充足，当交谈者发现研究者对于所谈论事物的认知特别深入后，便

会主动深入话题，尝试在知识阶次上更上一个等级，如此一来，研究者所获得的信息质量可能会越有价值。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有广泛的涉猎。我在南非的指导老师曾指出，加深对研究对象国的了解，获取更多有效信息的前提是关注各个大领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需要在认知层面上比大部分一般群众要懂得多，且和每个人都能聊起来。当他们发现一个非南非人对南非的了解比他们还要透彻时，双方的交流便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量宝贵信息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

上述准备使得我在南非的诸多田野访谈和日常交流中得到有效印证。在南非的几年，刚好碰上南非全国性断电频发，各区分时段供电的情形。因此，交谈中大量话题都是基于该现象展开的。一次在办公室刚断电后，我和一个曾经在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工作过的在读 MBA 学员开始聊天，从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y Empowerment, BEE）的具体内容对当下电荒的影响，到 Eskom 多年未更新设备及贪腐问题，再到发展经济学中一篇讨论南非某个社区用电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关系的论文。当他发现我们就断电现象的交谈到了一定程度后，忽然神秘兮兮跟我说：“你知道么，现在学校学生抗议的一个头儿是 Eskom 总裁的儿子，也在开普敦大学读书。”接着，我自动基于此信息脑补了“南非学生抗议领头者家庭背景分析”的研究话题，虽然很惭愧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这种有来有往的启迪式交流确实迸发出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对随后的深度学术思考大有裨益。



图2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所造的灯泡  
图片来源: <https://businesstech.co.za/news/energy>

有效沟通还需明晰一个思路，即书面文字不能代表所有声音，也无法反应所有现象，需要广闻深思和共情。与此同时，还需要理性区分和梳理其内在可靠性较高的信息，不能在一层层的情感激荡中失去主观判断，迷失在过度共情之中。由于我本硕都是商科背景，比较侧重于用数据和案例来论证自己的研究思路，对逻辑闭环的论证也侧重于非共情的理性思考。但在清华读博第一年选修了景军老师的“文化人类学”课程，其中的“本位 (emic)”和“客位 (etic)”让我在田野中受益颇多。结合自身的实际，我更倾向于用本位视角来体验当地人的喜怒哀乐，但在分析这些事件和现象背后的隐形逻辑和发展脉络，则需要更多地回归客位视角，这样做出的研究才能既有血肉骨架，也有精神灵魂；有理性分析，更有感性共鸣。

这和我读大一时，学术写作老师提及的亚里士多德的三种演讲修辞可以联系起来。我把这三种演讲修辞称之为“三板斧”。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的目的是让劝说效果最大

化，基于此，提出了三类可操作的说服受众的手段：情感述求（pathos）、人品述求（ethos）以及理性述求（logos）。情感诉求可以简单理解成“动之以情”，即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受众产生情感波动和共鸣，进而加深对发言者的信任。人品述求则是通过自身权威、引用其他权威或采取显性社会共识来增加语言可信度的方法。理性述求可以理解为“晓之以理”，即用缜密的思维、理性的视角、详实的事据和严格的推理来完成逻辑自洽，使其发言者信服。在田野中，情感诉求的灵活运用可以获得更多有趣或有价值的观点，而回归学术本身，基于情感诉求采取的信息，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成品则更应该回归理性，用人品述求和理性述求交织完成观点的输出。

#### 四、结语

田野中的语言观察，从初次的陌生到习得后的应用，能帮助研究者组建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真切的共鸣，这些共鸣可能隐匿在不同语料的字里行间，也可能穿梭在日常交流对话里。若有心挖掘这些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区域、有独特含义和用法的表述，可进一步加深对研究对象国文化风俗乃至社会历史的认知。

而有效沟通中的“柔性博弈”以及由此获得的大量信息，能帮助研究者在思考问题时具备更多视角，从深度共情到理性思考，从经验描述到学理分析，都是不断塑造其自身地区研究体系的必经阶段。于我而言，也是作为国别和地区研究学人的必备技能之一。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许帅

# 在巴黎遇见非洲：我的法国豪萨语研修记

王书剑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尼日利亚

“你为什么要来法国学豪萨语？”这是我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学习时被问过无数次的问题。确实，除了自身对豪萨地区具有浓厚兴趣外，选择法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历史悠久的非西方语言教学与研究传统。据记载，早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便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翻译家的语言学校，并由此拉开了法国现代意义上非西方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序幕。发展到今天，法国的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就集非西方语言教学和地区研究为一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来说，执牛耳者非东语学院莫属。

## 一、东语学院的发展历程

东语学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669 年创建的青年语言学校（École des jeunes de langues）。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意识到商业和外交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战略途径，因此迫切需要创立一所专门讲授和研究东方语言的机构为此服

务。1795年3月30日，东方语言专科学校（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由法国政府正式颁令成立，教授的首批语种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波斯语和马来语。据档案记载，学校当时挑选语言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与商业的实用性。

随着法兰西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不断扩张，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在19世纪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并于1914年正式更名为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学校教授的语言已增至近50种。受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影响，学校由原来的独立机构变更为巴黎第三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 - Paris 3）的附属机构，并改名为现代东方语言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后于1971年再次更名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并沿用至今。

1985年，东语学院以特殊院校（Grand Établissement）的身份重新从巴黎第三大学独立出来，直接受法国教育部的管辖。2010年，东语学院同其他几所高等院校签署协议共建巴黎城市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 USPC）以共同获得法国政府的重点投资。2011年，东语学院连同语言文化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BULAC）整体搬迁至位于巴黎13区的语言文化中心（Pôl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至此，学院原先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教学点和图书馆成功整合至一栋综合大楼中，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图1 位于巴黎13区的语言文化中心

图片来源：<https://i0.wp.com/www.etudes-armeniennes.org>

目前，东语学院专注于非西方语言文化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下设十二个院系，教授超过100种语言，涉及的地区包括非洲与印度洋、亚洲与太平洋、欧洲与欧亚、中东与马格里布等。除此之外，为满足学生的学术与职业发展需要，学院还开设了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学、传播学等专业课程。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校下辖14个研究团队，这些研究团队大多以地域为划分标准，主要从语言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对该地区展开跨学科研究。

## 二、东语学院的非洲研究

2015年9月，我进入东语学院学习豪萨语，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非洲研究。东语学院的非洲研究主要分为教学和科研两部分。其中，本科和硕士教学主要由非洲与印度洋系（Département Afrique-Océan indien）负责，教授阿姆哈拉语、柏柏尔语、科摩罗语、豪萨语、马达加斯加语、曼丁哥语、富拉尼语、索宁克语、斯瓦希里语、沃

洛夫语和约鲁巴语等 11 种非洲本土语言。黑非洲语言文化实验室 (Laboratoire Langage, Langues et Cultures d'Afrique Noire, LLACAN) 则主要负责非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以及相关的语言学、文学等研究项目的开展。

东语学院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体系十分成熟，且注重语言和地区文化的平衡。以我所在的豪萨语专业为例，学生在本科期间除了需要学习豪萨语的语法、口语、写作等专业课程外，还需要与系里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学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地理、电影等文化课程，以及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基础课程。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下，学生一方面能获得扎实的语言训练，另一方面也能对非洲有一个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认知，并能以此为基础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分析自己感兴趣的非洲议题。

### 三、在东语学院的学习与生活

东语学院目前有两位豪萨语老师。Jean-Charles Hilaire 是豪萨语专业的主管老师，负责语法、翻译和写作等课程。他博士毕业于东语学院，主修语言学，后留校任教至今。Hadiza Nazal 是口语老师，她来自尼日尔，通过政府奖学金赴法留学，并最终留在法国。此外，Nazal 老师还是一位接受过 7 年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两位老师通常一起为我们上课，配合效果非常好。以语法课为例，每当 Hilaire 老师为我们讲完一个重要的单词或语法结构，Nazal 老师就会给出几个地道的例句。如有必要，她还会为我们补充该单词或表达方式在豪萨人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含义，或者向我们展示不同豪萨方言间的表达与发音的异同，非常有趣。



图2 作者与 Nazal 老师（中）和 Hilaire 老师（右） 作者拍摄

和我一同学习豪萨语的同学并不多。第一年，我所在的班级共五名学生。除了我之外，有来自尼日利亚中部乔斯地区的 Emmanuel，有喀麦隆裔法国籍的移民二代 François，有来自乌克兰的语言学博士生 Yulia，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剑桥大学博士生 Noémi。其中，只有我、Emmanuel 和 François 是东语学院的在籍本科生，而 Yulia 和 Noémi 则是通过欧盟伊拉斯谟斯校际交流项目过来的学生。第二年，Yulia 和 Noémi 回到各自的学校，François 因为挂科过多而选择换专业，班上只剩下我和 Emmanuel。到第三年（本科项目最后一年）时，Emmanuel 又因为没有修满核心文化课程学分，只能留级，班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也使得我在最后一年能经常享受两位老师同时为我准备的“VIP 私人定制”课程，虽然更加灵活自由，但课业压力也更大了。



图3 Emmanuel (左一)、Yulia (左二)、François 和作者在进行小组讨论 作者提供

如前文所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文化课也是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语学院的文化课一般是大班教学，尤其是部分核心课程，系里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修。需要说明的是，文化课的任课老师大多是法国白人，他们普遍拥有博士学位和非洲实地调研的学术经历，而系里的在籍学生则基本都是同 François 一样的非裔二代移民。他们自我认同为法国人，但又因种族与肤色难以完全拥抱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作为移民后代，他们又缺乏对自己种族语言文化的深入了解，这导致他们常常面临身份认同等问题。在汇集了大量此类同学的文化课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位白人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法语，间或夹杂着几句富拉尼语或索宁克语，为台下一排排非洲移民后代讲述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学与电影。这个图景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在非洲各地创办教会学校，并为当地青年传授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当这两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交织重合时，我意识到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特定的权力关系依旧难以撼动。

在学习之余，东语学院的课外生活也非常丰富。在豪

萨语班的同学中，Emmanuel 已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所以他带头组建了豪萨语学习小组。除了帮助我们练习口语之外，Emmanuel 还经常和我们分享尼日利亚与豪萨地区的风土人情，带我们去去地道的尼日利亚餐厅，向我们推荐尼日利亚诺莱坞（Nollywood）电影等等。犹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完，我们五个人相约一起去西岱岛逛集市，逛累了就各自买一个土耳其烤肉饼（Kebab）围坐在塞纳河边，边吃边聊。具体的聊天内容我大多已忘记，但那些映着暖黄色夜灯的笑脸我永远记得。此外，东语学院也经常举办电影放映、艺术展、地区文化节等活动。Afrinalco 是非洲与印度洋系的学生会组织，成立于 2013 年，主要负责举办一年一度的非洲文化日（Journée de l’Afrique）和其他与非洲相关的学生活动。非洲文化日当天不仅有非洲研究系列书展、非洲传统服饰展、非洲国家文化展，还有由同学们亲手制作的非洲传统美食摊。活动当天中午，二层大厅总是人潮攒动，大家一边品尝着传统美食，一边和周围的同学或老师聊天，好不惬意。



图 4 Afrinalco 举办的非洲文化日一瞥

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Afrinalco/photos>

#### 四、东语学院非洲研究的发展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国经济增长持续走低，青年失业率也一直处于高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就业市场的需求日益成为法国大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在这一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计算机、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只为求得一份好工作。但与之相对的，外语专业，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日益边缘化，这对东语学院非洲研究的发展打击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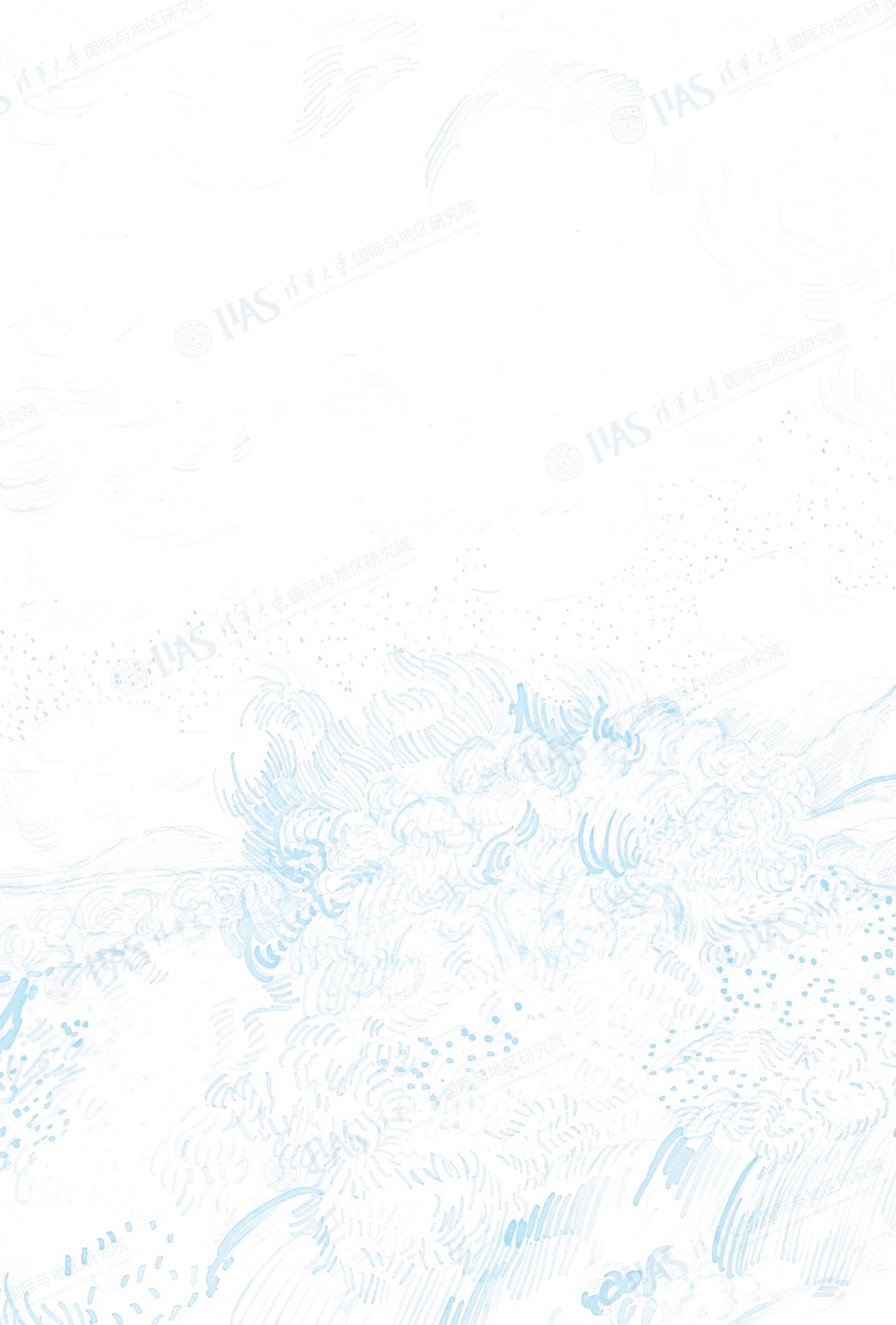
近年来，东语学院非洲语言专业生源严重不足。以豪萨语专业为例，在我入学那年，大一仅三人注册，大二没有人注册，大三仅一人注册，硕士班没有人注册。Hilaire 老师有一次无不沮丧地向我抱怨到，曾经有大量希望从事非洲外交和外贸事业的学生来东语学院接受学位教育，但现如今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反而经常有其他学校主修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或是比较文学的学生，出于专业要求，来这里随便选一个语种读双学位或者副专业，但这些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东语学院的在籍学生。

生源不足问题进一步导致相关的教职和科研经费不断被削减。在法国，教职和科研经费的分配基本是按照招生规模来确定，如果一个专业长期无法招到足够的学生，其所能分配到的资源就会逐渐减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教职数量的“自然消亡”，即当一位教授退休后，该职位就会被取消或是重新分配给其他专业，而不是重新招聘专业教师填补空缺。在这一制度下，“边缘”语种专业也会“自然消亡”，即当负责一个专业的唯一教授退休后，学校可能就取消该专业的招生资格，不再提供学位教育。如果有需要，学校也只会以合同制的形式聘请相关的语言老师（Maître de Langue）开设语言课，但也不会再有过多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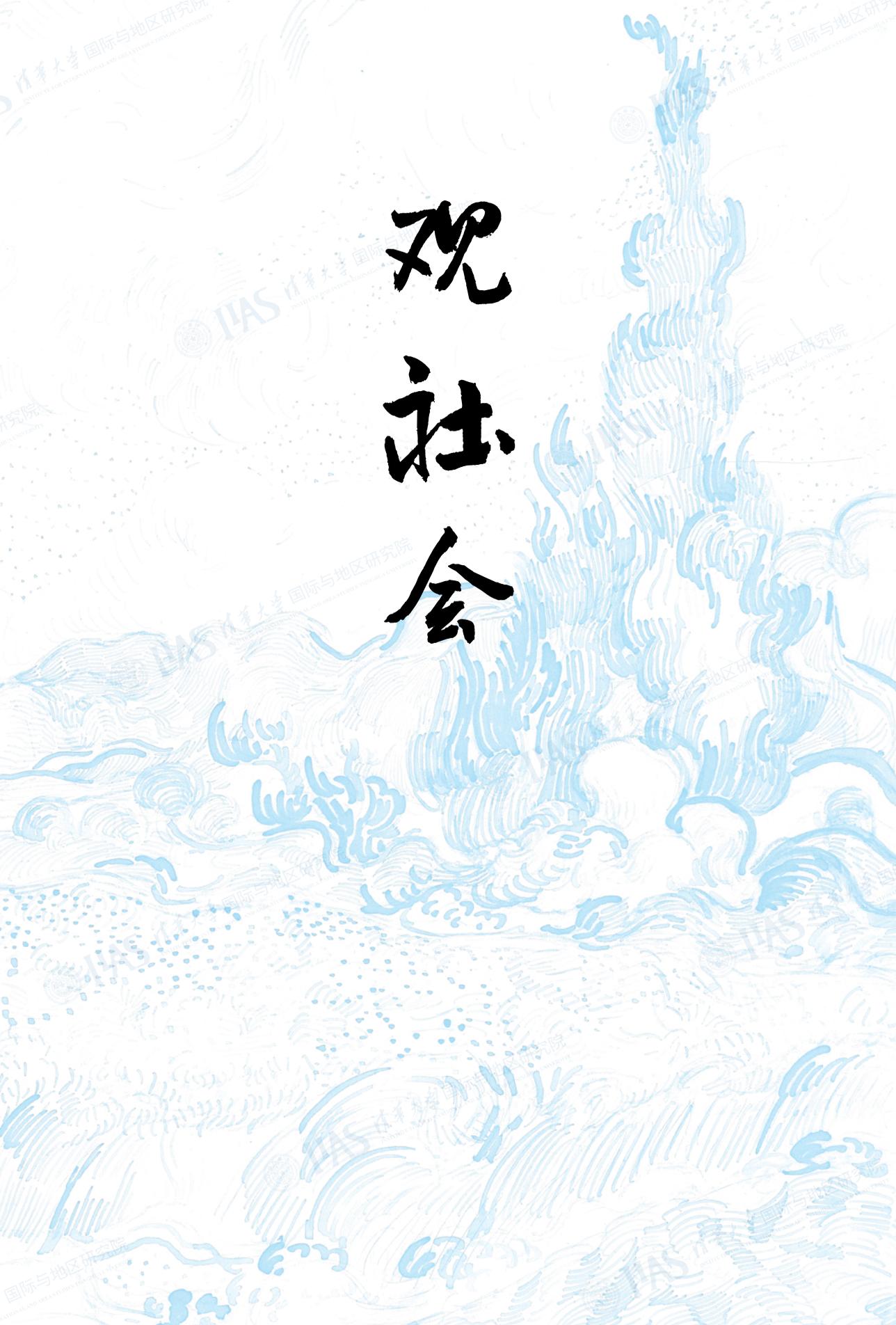
## 五、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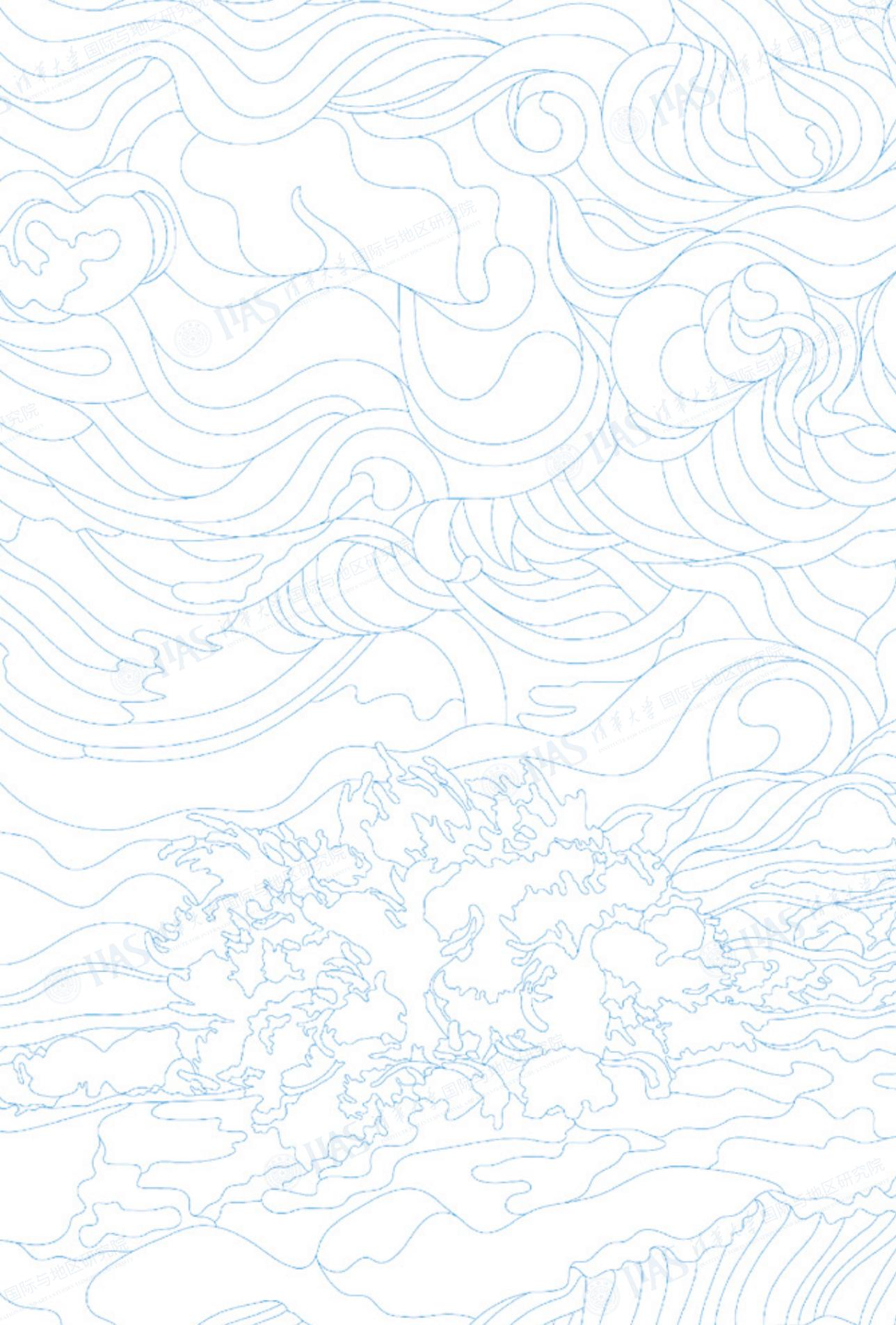
在法国学习豪萨语对我来说是一次“在异文化中学习另一种异文化”的奇妙体验。虽然能系统地接受非洲本土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训练，但其课程设计、学科视角，乃至研究方法，都难免带有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那些非裔二代移民，在学习过程中都需要警惕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我想，对于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来说，除了要真正踏入非洲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外，了解不同国家的非洲研究也十分必要，因为这不仅能够拓宽视角，更能促使我们进行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由此进一步通过“他山之石”更好地理解非洲与自身。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



# 观社会





# 墨西哥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吗？ ——反思公共安全与治理策略

李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墨西哥

每次有家人或朋友得知自己在墨西哥生活学习时，他们总是一脸愁容。在他们的印象里，墨西哥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国家。确实，从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隔三差五的绑架枪杀，还是毒贩之间的激烈火拼，墨西哥似乎离阳光沙滩龙舌兰如此遥远，与好莱坞电影里枪林弹雨的犯罪现场则更近了一步。

2016年，我只身前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访学与调研。2018年下旬，我动身回国，暂时告别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回首在墨西哥城的生活，幸运的是，我并未遭遇过任何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或人身安全造成危险的事情；但如若你问我，墨西哥真的是个如传闻般危险的国家吗？我的回答或许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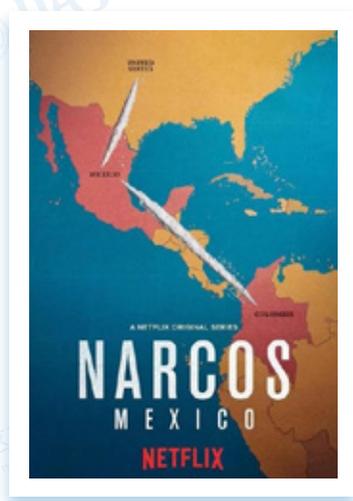


图1《毒枭：墨西哥篇》剧集封面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 一、“危险”：一种不安全感

谈到墨西哥的公共安全局势，不得不提及2006年的“禁毒战争”。当时的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Felipe Calderón Hinojosa）部署了3.6万军队和联邦警察以打击毒贩的有组织犯罪。但即便如此，政府军与毒贩的武装实力依然存在差距，加之政府内部腐败等原因，这场轰轰烈烈的“禁毒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墨西哥的毒品交易依然猖獗，该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北部各州，如锡那罗亚州、下加利福尼亚州、塔毛利帕斯州等）始终笼罩在毒品交易的阴霾之下。

尽管从国家层面来说，墨西哥不同地区存在的贩毒行为是其高危险系数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墨西哥人对于“危险”的认知来源和判断标准。事实上，那些远离毒贩和毒品交易的普通人往往不会受到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更多的时候，他们对于危险的感知是来自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车辆盗窃、入室盗窃、（公交车或道路）抢劫、敲诈、勒索、口头威胁、身体伤害、性侵害乃至交通事故伤害才是他们强烈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而这种不安全感则进一步破坏了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地理信息局每年开展的“犯罪受害情况和公共安全感调查（La Encuesta Nacional de Victimización y Percepción sobre Seguridad Pública, ENVIPE）”显示，人们在公共场所（如街道、地铁或公交车等）最缺乏安全感。这一点，我在墨西哥城感受颇深。我刚到墨西哥不久，就听闻了墨西哥朋友当街遭遇抢劫或被盗窃的经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被他们告知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不要在地铁或公交车上使用价格昂贵的手机，不要在夜间经过墨西哥

城某些特定的地段或街道，不要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随意伸手拦车，一条大道的左右两侧是两个安全系统完全不同的居住区……

还记得某天，一位当地朋友给我发来一条新闻，该新闻报道了距离我所居住的小区大约 10 分钟步行路程的地铁站内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受害者从银行离开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不幸遭到一名持枪罪犯的袭击，由于伤势过重而当场死亡。由于这片区域是墨西哥城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且设有多家银行，所以该事件引发了不小的恐慌。事件发生后的数周里，由于担心罪犯再次作案，政府派遣了警察驻守在该地铁站的不同出入口。后来，每每经过这座地铁站的附近，就算有警察的驻守，我依然战战兢兢，心有余悸。

事实上，行走在墨西哥城街头或乘坐交通工具时，遭遇盗窃、抢劫或枪击当然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当小概率事件的后果是丧失生命这样个人难以承受的代价时，只要个体处于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场所内，它也会被转化为个体强烈的不安全感，如同“恐飞症”患者搭乘飞机时的感受一般。所以，虽然我没有在墨西哥城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包围，日常生活与行动也受限于这种无形的束缚，这种束缚既是“金钟罩”，也是“囹圄”。

“危险”作为一种不安全感，形塑着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的行动轨迹与活动空间，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纽带。鉴于这一状况，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安感，那么民众只能将自己限制在越来越小的所谓安全区域，变得越发孤立无援。



图2 地铁站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景象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 二、营造安全的“社会气氛”

那么，如何消除民众的不安全感？又该如何重建城市的公共安全？从我在墨西哥城生活的真实感受来看，将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放在打击与毒品贩运有关的有组织犯罪并不能真正地、直接地降低大部分民众对于“危险”或“不安全”的感知水平。当各种犯罪行为在社会中产生紧张和不确定性时，缺乏安全感、随时保持警惕心、担忧陌生人对自己的恶意或伤害等心理状态使得一种不安全的气氛在城市不断蔓延，民众和街道将彼此抛弃。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重新修复受到破坏和抛弃的社交交往、信任关系和公共空间，其次是打造一种关于公共安全的“社会气氛”（social atmosphere）。

“社会气氛”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它是日常生活中包裹着我们的准客观实体，也是制约群体内人们共同活动

和思考方式的心理条件。不同的“社会气氛”会产生不同的态度、行动和价值观，比如合作、友谊、竞争、敌意等。“社会气氛”不仅是群体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外在表现，同时也反向改造着群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考虑到墨西哥社会长期遭受暴力及犯罪文化的影响，民众的不安全感是根深蒂固的，这也使得消除不安全感不再是一个只有政府才需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以“社会气氛”定义和理解公共安全意味着将人民视为缔造安全感的积极主体，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或感受者。基于此，社会参与成为了营造安全的“社会气氛”的有效渠道，它使得民众能够重新拥有他们的社区，并以一种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再次创造他们生活与居住的空间。

我在墨西哥城所居住的社区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社区，但是仍然会有偷盗行为的发生。有一段时间，居民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或汽车配件不断遭窃，甚至还有居民楼的窗户被盗贼恶意打碎并导致部分物品被盗，而政府往往不太重视，也很难彻底消除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于是，当地居民通过公民委员会（comité ciudadano）自发安装了摄像头，以捕捉偷盗者的人像画面，再以打印张贴非官方的“通缉令”的方式提醒民众加以防范，共同协作保卫社区。这种自发的自治行为也达到了对偷盗者的威慑作用。有时候，走过一片住宅区或社区，还会看到当地居民贴出的警示语或告示牌，上面写道“你已进入了社区摄像头的监控范围”，用来警示那些图谋不轨之人，降低该社区的犯罪率。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做法便是民众通过社会参与和社区团结主动维护居住空间公共安全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一个人际关系和社区受到不安全感侵蚀的社会中，社会参与变得至关重要。只有民众的参与和协助，才能扭转暴

力犯罪、毒品贩运等行为不断破坏墨西哥社会及社会内部关系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国家是创造适当条件的一方，它使得公共安全成为可能，民众通过集体组织积极投身于公共空间的改造和修复，这是改善公共安全局面以及降低民众不安全感的最佳选择。如上述提到的公民委员会就是这种集体组织的典型代表。公民委员会作为墨西哥城的公民代表机构，由公民民主选举产生，负责制定工作计划以解决居民的主要诉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公共安全是这些委员会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



图3 墨西哥城启用“求救按钮”，民众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呼叫救援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 三、结语

综上，尽管国家仍然有必要通过监禁和打击罪犯降低整体的犯罪率并通过公共安全制度的改革阻止犯罪的发生，但是必须意识到的是，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气氛”作为一种集体心理状态更多的是一个因为恐惧而破碎化的社会所产生的结果。以墨西哥城为例，用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解释民众

对于“危险”的高水平感知，其效用似乎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放弃共同的、公共的空间和场所，将封闭和孤立当作一种假定的保护。

表面上，把公共安全看作一种“社会气氛”似乎太过理论化，缺乏实践意义。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富有意义的，因为它为国家、组织机构和民众理解何为“安全”的公共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当各方都认识到公共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感受及看法，而各方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这个集体心理建设的过程。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墨西哥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或者，起码不再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

本篇责编 熊星翰 文字校审 许帅

# 田野琐记：曾经平静的提格雷

江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区域为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

古城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城破山河在，故人何处寻？

—— 笔者自作

（灵感源于唐代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和杜甫的《春望》。）

2019年12月，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阿姆哈拉语，አብይ አህመድ አሊ）将原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改组为埃塞繁荣党，原执政联盟重要组成政党、由埃塞北部提格雷州的提格雷民族组建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退出执政联盟。阿比总理借此机会与北部邻国厄立特里亚达成和解，并因此获得201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2020年9月，提格雷州在阿比总理两次推迟大选的情况下举行地方选举。联邦政府不承认“提人阵”的选举，并宣布调整提格雷地区的国防军北部基地领导层。11月4日，“提人阵”试图武力控制北部基地，阿比总理随即对该地区宣战。



图1 埃塞总理办公室声明

来源：埃塞总理办公室 Facebook 主页

宣战至今三个多月以来，我夜里多次从睡梦中惊醒，思绪回到那片不久之前还平静的土地，再也无法入睡。自交战当日起，提格雷州的网络和通讯信号就被掐断。我尝试联系当地的朋友，消息均石沉大海。2017年至2019年间，我学习提格雷语并多次在提格雷州进行田野调查。直到今日，我依然不愿去相信，曾经的田野点，就这样被战火吞噬，只能拾起一点还在脑海里的、曾经平静的提格雷，及那些在提格雷地区生活的好友们，祈祷他们一切都好。

## 一、进入田野：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学生

2016年12月5日凌晨，我拽着两个托运箱赶往机场，暂别生活十年的北京，前往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习。回想起当时的心情，没有要开始新生活的紧张和兴奋，

除了对未知世界的忐忑，更多的是害怕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为了不给自己留下打退堂鼓半途而废的机会，我退掉了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住处，所有的家当或变卖或送给朋友。那时候很是带着一点想要义无反顾的悲壮，现在想来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第一次进入田野之前并未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除零零散散地读过几本著作外，大多也是抱着了解不同世界的好奇心态。比如，那时候刚读完项飏老师的《全球猎身》，受到了感召和鼓舞，觉得要做研究的话，就一定要做中国学者自己的“非中国”研究，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理论视角，为避免进一步陷入他所说的“我们挖煤，别人提炼”的恶性循环，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在2016年底第一次进入田野之前我学了十年英语，一直从事语言相关工作。有这样的目标和决心，却完全不知道应从何处着手，我只好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打开突破口——学习语言。于是我申请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语言学位，先读一年语言预科，再读一个学位。就这样，硕士毕业多年以后，我踏进了一个“非中国”的新世界，成为了遥远的东非高原上的一名大学生。

我没有选埃塞使用人数最多的阿姆哈拉语作为主修专业，而是主修了北部提格雷州和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语言提格雷语。从那之后便时常往来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提格雷州。提格雷州的首府默克莱市（መቀሌ）是埃塞第五大城市，也是北部中心城市，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780千米。

## 二、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默克莱青年

第一次去默克莱时，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书的一位提

格雷好友怕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便安排了老家的弟弟给我做向导。年轻人名叫穆鲁（ሙሉ，意为完满），是刚毕业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埃塞彼时刚完成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转型5年计划（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2010-2015, GTP），政府安排大量大学生学习工程专业。刚刚大学毕业的穆鲁踌躇满志，听说到中企可赚很多钱，问我能不能给他写推荐信。

就这样穆鲁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在他的带领下，我很快就融入了默克莱年轻人的生活。一起喝酒聊天时，他们会向我抱怨工作不好找。也有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便在家里帮忙做点家务，照看弟弟妹妹，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坐着喝咖啡发呆或闲聊。街边随处可见的小咖啡室里，有石头磨成的多米诺骨牌，人多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拼骨牌。记得在某天晚上我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赢光所有人的牌之后，他们非常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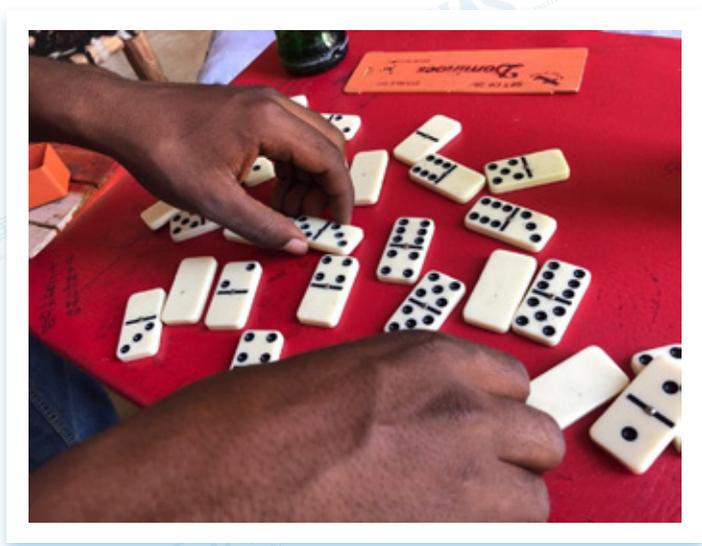


图2 玩多米诺骨牌的埃塞青年 作者拍摄

他们带我去的是市中心一个游戏厅。虽说是游戏厅，其

实是两个大液晶显示器和两台 PlayStation 3 的主机，店里的人不太多，很像是一个秘密基地。两台主机前各有两伙儿人在玩实况足球，其中一边还为谁选阿森纳队起了一点争执。

我也会和默克莱的青年朋友们一起看电影，除了网络上找到的好莱坞大片，还有很多厄立特里亚的电影。厄立特里亚于 1993 年独立，并与埃塞断交。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还未出生，但他们和厄立特里亚提格雷人同属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当在电影里看到阿斯马拉（አስመራ，厄立特里亚首都）美丽的海岸景色时，他们眼里都透着无可掩盖的向往。对于 2018 年厄特和埃塞复交，大家都很兴奋，并计划着一起穿过国境线前往旅行，只可惜这个约定一直也未能成行。

除此之外，我记忆犹新的另一件事是 2017 年 10 月我借宿的房东大叔嫁女。那是我第一次在提格雷参加婚礼，房东一家对此都很兴奋，新娘的妹妹还特意在头一天晚上花了两个小时给我编了一头辫子。顶着一头小辫子，那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睡着，结果半夜 3 点钟就被房东喊醒，他很神秘地让我出去看杀牛。

彼时的埃塞，一头牛售价约 2 万比尔（约 4000 元人民币），哪怕相对富裕的人家，也得多年积蓄才买得起。如果不是结婚这样的大事，不会轻易宰牛。大家围着牛，大声唱歌跳舞，待牛宰好剥皮，他们还熟练地从牛背上割下一小条肉递给我。房东笑着解释，我是尊贵的客人，好客的提格雷人把最好的肉送给我。我沾着准备好的芥末和辣酱，细细嚼着还冒着热气的新鲜生牛肉，慢品牛肉的本味。

从清晨伊始，宾客就陆续到来，整个宴饮持续了一天，直到临近半夜将新郎新娘送走，宾客才渐渐散去。第二天上

午，新郎带着新娘回到娘家，当众向娘家人展示带血的白布，而穿着传统服饰的新娘羞涩地在一旁笑。那个平日里戴着棒球帽和我一起看电影拼骨牌的姑娘，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传统”。



图3 婚礼现场（上）；生牛肉（左下）；准备婚礼的新娘母亲（右下）作者拍摄

### 三、边陲古城阿克苏姆

我所接触到的提格雷青年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提格雷州最北边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境的小城阿克苏姆（አክሱም），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在他们看来，阿克苏姆是埃塞文明开始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克苏姆距离厄特边境 58 公里，是埃塞北部最后一个“大”城市。回顾历史，这里文明始于史前，留下了方尖碑这样的古文化遗产。



图 4 阿克苏姆方尖碑 作者拍摄

在埃塞神话传说中，示巴（ሸባ）女王千里迢迢前往以色列，以修两国之好，并对才思敏捷、风流倜傥的所罗门王一见钟情。一夜交欢之后，珠胎暗结的示巴女王回到阿克苏姆，不久诞下阿克苏姆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孟尼利克一世（ሞነሊክ I）。从那以后，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都自认是所罗门王私生子的后代。

近两千年前，埃塞人民就建造出了阿克苏姆方尖碑墓群这样的宏伟建筑，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其墓室内部的空间结构，完全使用未经雕凿的碎石层层叠叠垒出来，像极了电视剧里重阳真人当年给林朝英修的活死人墓。直到今天，很多当地人兴建房舍、做菜酿酒，依然沿用两千年前的方法。



图5 方尖碑墓室内部构造 作者拍摄

在这个不足十万人人口的“城市”里，观光游客和朝圣者络绎不绝。然而，除了主要景点周围兜售水晶矿石的小贩和讨要钱物的孩子之外，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似乎真的从未参与过这个日新月异发展着的世界。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千年墓园里，我看着守园人从树上摘果子吃，时间似乎停滞，千年时光，弹指刹那。



图6 阿克苏姆市中心广场 作者拍摄

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饮食习惯。酸奶加辣椒粉，牛奶加胡椒粉，而咖啡里加盐；还有当地最常见早餐法塔（馕），是用黄油、酸奶、辣椒粉来拌炒鸡蛋和碎面包。记得第一次吃的时候，好友一脸鄙视地看着目瞪口呆难以下咽的我，我在去亚的斯亚贝巴读大学之前，从来都不知道酸奶和牛奶里还可以加糖。



图7 阿克苏姆传统饮食 作者拍摄

而在不远处的阿克苏姆市高中门口的宣传牌子上，画着一群美丽的妙龄少女，每个姑娘手里都拿着一个安全套。配字翻译过来就是，“Don't be fooled!!”（不要被愚弄了）。



图8 高中外的宣传画 作者拍摄

#### 四、结语

从最后一次田野回来已一年多，我一边梳理着田野材料，一边继续着理论学习。对我来说，民族志研究方法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填平了学术话语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东非古国的北部高地，于我既是田野，也是生活。我可以理性地用各种理论工具分析论述当下这场战争的成因与影响，但闭上眼睛，不由自主想起来的，却都是田野中一件件平常的琐事。那是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是所有人曾经以为就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不会改变的生活。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

# 摩洛哥的那些社会百态

江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摩洛哥

## 进入摩洛哥

在来摩洛哥以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只停留在朋友圈里大家分享的“蓝色小镇”、电影《北非谍影》以及贝蒂·希金斯（Bertie Higgins）根据电影创作的《Casablanca》。出国前，为了对这个国家有更多了解，我特意恶补了一下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苏珊·米勒（Susan Miller）的《摩洛哥史》。通过这些书籍影像资料，在脑海里搜索了一遍我曾去过的中东君主制国家后，我初步判断摩洛哥应该是一个从生活方式到建筑风格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元素的国家。但来到摩洛哥后，我发现如果拿其它的君主制国家做类比，摩洛哥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融合了海湾君主制和约旦君主制的国家。

下了飞机，朋友带我去了一家位于哈桑二世清真寺对面的法式餐厅吃饭。“在摩洛哥，法式餐厅随处可见，你会发现摩洛哥就是一个小‘法国’。”朋友向我介绍道。我问，“这和这个国家的殖民史有关么？”，朋友向我解释道，“历史是一个原因，地理上的相近也不可忽略。摩洛哥的精英阶层大

部分从小就学习法语，大学一般会去法国念。我接触到的摩洛哥人，我们在谈业务的时候都说法语，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消除我的疑惑，反而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在这张疑惑的网格上，历历在目的是人/与人、语言、信仰、食物等承载社会百态的最基本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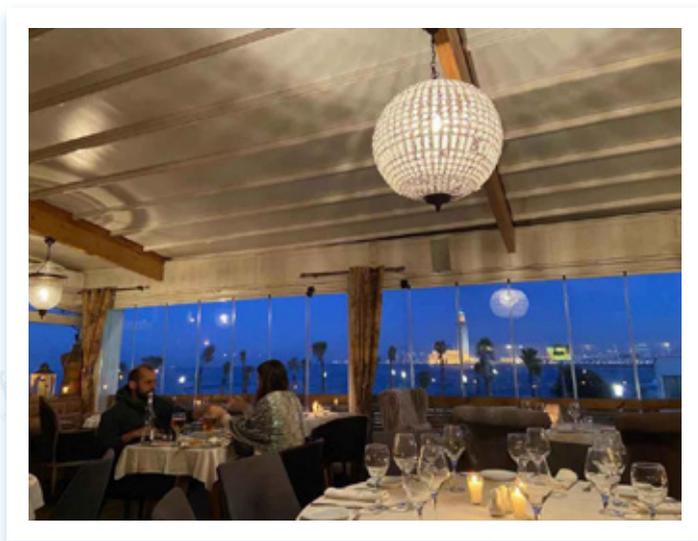


图1 位于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对面的法式餐厅 作者提供

## 保姆亦“家人”

我居住的地方位于拉巴特中产阶级聚集的艾格达尔 (Agdal) 区。在小区里，从酒吧、酒庄、咖啡店、传统小吃店、快餐店、银行、药店到私人诊所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且同一类型的店铺不会相隔很远。如果想要去远一点，出门可以乘坐有轨电车或打车，且不需要等太久。社会发达程度依此可见一般。而我的房东玛丽（化名）是一个有着多套房产的中产阶级，除了一套自己住外，其它的用于出租。

有一次我去拜访她，在她家里见到了她的保姆阿伊莎（化

名)。与其说她俩是雇佣关系，不如说她们是见证彼此成长的姐妹关系。阿伊莎 15 岁便来到了玛丽家，是一个常年身着摩洛哥传统服饰的穆斯林，而玛丽则是一个在法式教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她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穿西式裙子上学。玛丽的孩子则是在美国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穆斯林，目前已在美国娶妻生子，从事财经类的工作。除了周六、周日和特殊节日外，阿伊莎都住在玛丽家。我和房东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是通过阿伊莎，如，每月交房租时，房东会派阿伊莎过来取。一开始，我对她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感到讶异。在了解了她们的相处时间，在听到玛丽的孩子给阿伊莎打电话问候，在听阿伊莎分享玛丽的孙子是如何在电话里说他们想念她做的蛋糕后，我明白了这份信任的背后不只是契约精神，更是几十年间亲情式的积淀。当然，玛丽和阿伊莎之间的相处模式并不是个例外。在艾格达尔区，像玛丽这样的中产阶级有很多，他们与家里保姆也多是相处几十年的伙伴。



图 2 摩洛哥的有轨电车 作者提供

## 疫情之下坦然的保姆

疫情期间，在房东的叮嘱下，阿伊莎会定期给我送生活补给。在摩洛哥三月份刚暴发疫情时，我曾问她：“疫情在摩洛哥传播速度这么快，你害不害怕？”她说：“安拉保护着摩洛哥，我们的国王也保护着我们，情况会好起来的。”在6月份疫情出现好转时，我曾感谢她说：“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照顾玛丽和我，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她说：“你知道么，我每天都礼拜祈祷，所以我的身体特别健康。你放心吧，有我和玛丽在，我们会保护你的。”在11月底，摩洛哥媒体报道政府将于12月中旬开始给国民接种中国产的疫苗。阿伊莎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么，我们马上就要接种疫苗了，摩洛哥的疫情很快就会好转了。”除了上述三次比较有代表性的谈话，我们也讨论过中国、摩洛哥、美国和欧洲对疫情的管控方法。从阿伊莎的身上我观察到，对于变化的世界，内心的笃定使得她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

## 坚持使用阿拉伯语的官员

我曾经协助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穆斯塔法（化名）教授接待了一个前来考察的中国团队，活动的其中一站是到摩洛哥议会与一些政党的负责人进行交流。那个团队里有一名专门负责交流的法语翻译，但是当天摩洛哥的政府官员却坚持用阿拉伯语介绍摩洛哥的政治结构和相关政党的发展史，于是我便临时担任了讨论会的中阿交传。事后，我问穆斯塔法教授：“那些官员都会说法语，为什么在和他们介绍了有专门的法语翻译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说阿拉伯语呢？”教

授解释到：“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是我们的官方语言，他们代表的是摩洛哥政府，所以会用阿拉伯语而不是法语发言。”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民族属性可能会在一些场合被人为地淡化了，但是在另一些更为重要的场景下，却尽现民族尊严。



图3 摩洛哥议会的内景 作者提供

### 社区中的酒吧

每逢节假日，伴随深夜酒吧的音乐声，喝醉的人们从酒吧出来时仍然带着未尽的叫嚷声以及酒吧内众人观看足球比赛时的沸腾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周围人对酒吧的接受度。虽然社区的一些人在酒吧的上方挂了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抗议酒吧的横幅，但这些都伊斯兰教法里被列为禁忌的事物依旧存在。我不知道酒吧里到底有多少摩洛哥人，但朋友的一次生日聚会让我了解到酒吧的服务人员都是本地人。我曾问过我的一个学习伊斯兰教法的摩洛哥朋友：“如果那些酒吧的

服务人员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那他们会如何看待酒吧的工作呢？”他回答道：“摩洛哥的失业现象是很严重的，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作。”“那在摩洛哥的法律里，酒吧的存在是合法的么？”我接着追问。“在伊斯兰教法里，酒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摩洛哥的世俗法里，经营酒吧需要有营业执照，这个营业执照的审批是很严格的。”他答道。



图4 酒吧上方张贴着抗议的横幅，横幅左侧的图像是摩洛哥的国旗，右侧是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照片 作者拍摄

## 法式餐厅与传统小吃

对于法式餐厅在摩洛哥的每个城市是否都“遍地开花”这个问题。我目前的观察是，前者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后者的商业化程度。在卡萨和拉巴特这两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周围建筑的风格和法式餐厅的数量一度让我回忆起在欧洲的旅游经历，但每天宣礼塔定时传出的诵经声，极具摩洛哥特色的马赛克，旅游景点恢弘的历史遗迹又时刻提醒着我身在何处。而在伊芙兰、梅克内斯和菲斯这三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景点定位的不同影响着城市中餐厅的种类。在素有“小瑞士”之称的伊芙兰，大雪过后漫步在城市道路间，欧式风格的餐厅随处可见。在古城梅克内斯和菲斯，摩洛哥的传统美食往往会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购买。由于疫情原因，我还没来得及游历摩洛哥南部的城市。据我从事旅游业的朋友介绍，摩洛哥南部城市的传统餐厅会多一点，而且今后旅游业的发展会更突出传统文化的特色。“摩洛哥的游客绝大多数来自欧美，他们最常去的是历史景点和有摩洛哥特色的地方，他们购买的多是摩洛哥传统的手工艺品，摩洛哥的传统小吃也比较受他们的欢迎。所以要想使旅游业保持竞争力，就得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他解释道。



图5 雪后的伊芙兰小镇 作者拍摄



图6 梅克内斯的历史遗迹 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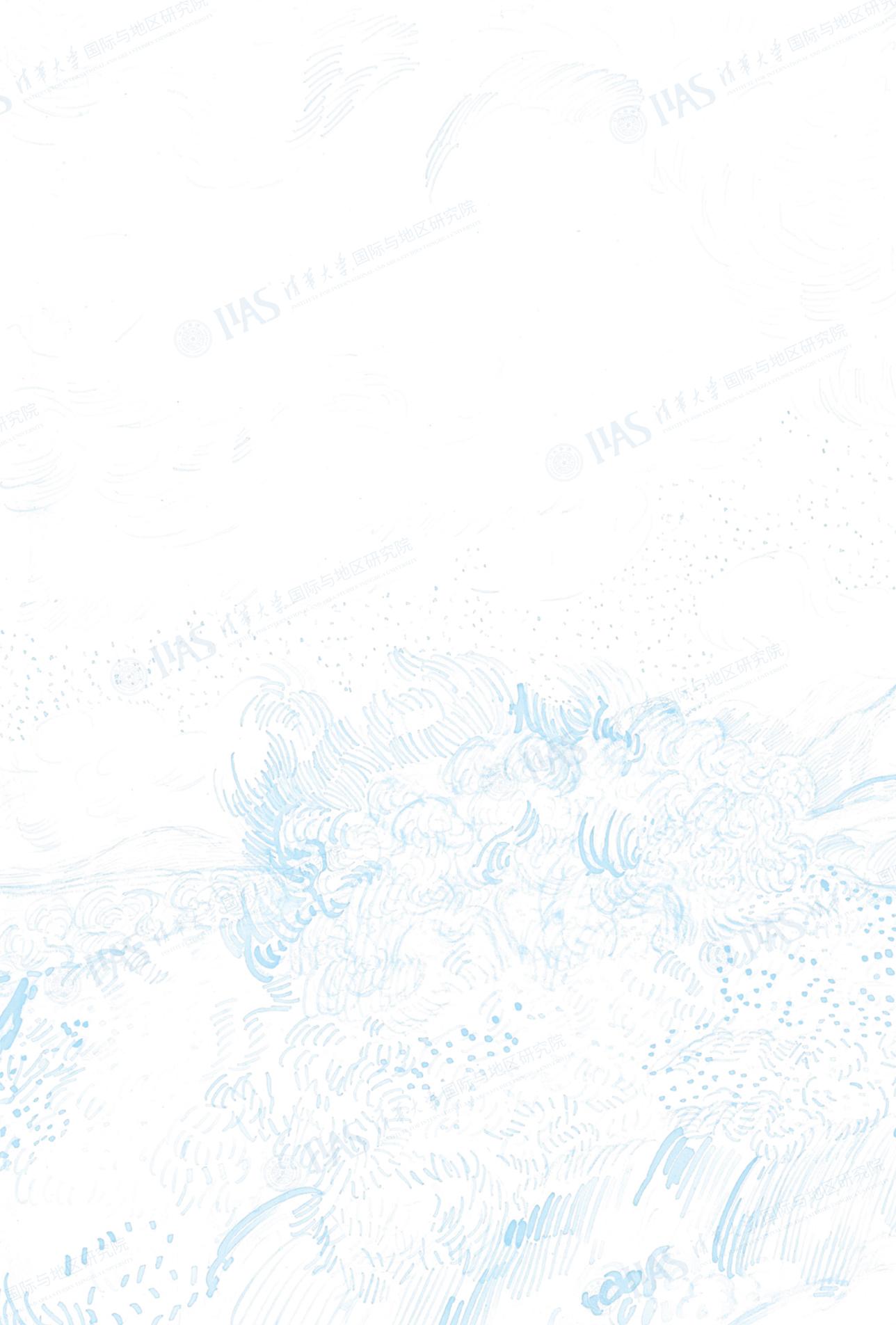


图7 古城菲斯 作者拍摄

## 写在最后

虽然疫情减缓了我探索摩洛哥社会的进度，但也让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摩洛哥的社会百态。我相信，在未来，我会带着诸多问题继续去观察摩洛哥社会。通过观察不同的人/与人、事、场景，去拨开摩洛哥社会的面纱，发现摩洛哥社会的更多可能。

本篇责编 李宇晴 文字校审 许帅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TSINGHU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STITUTE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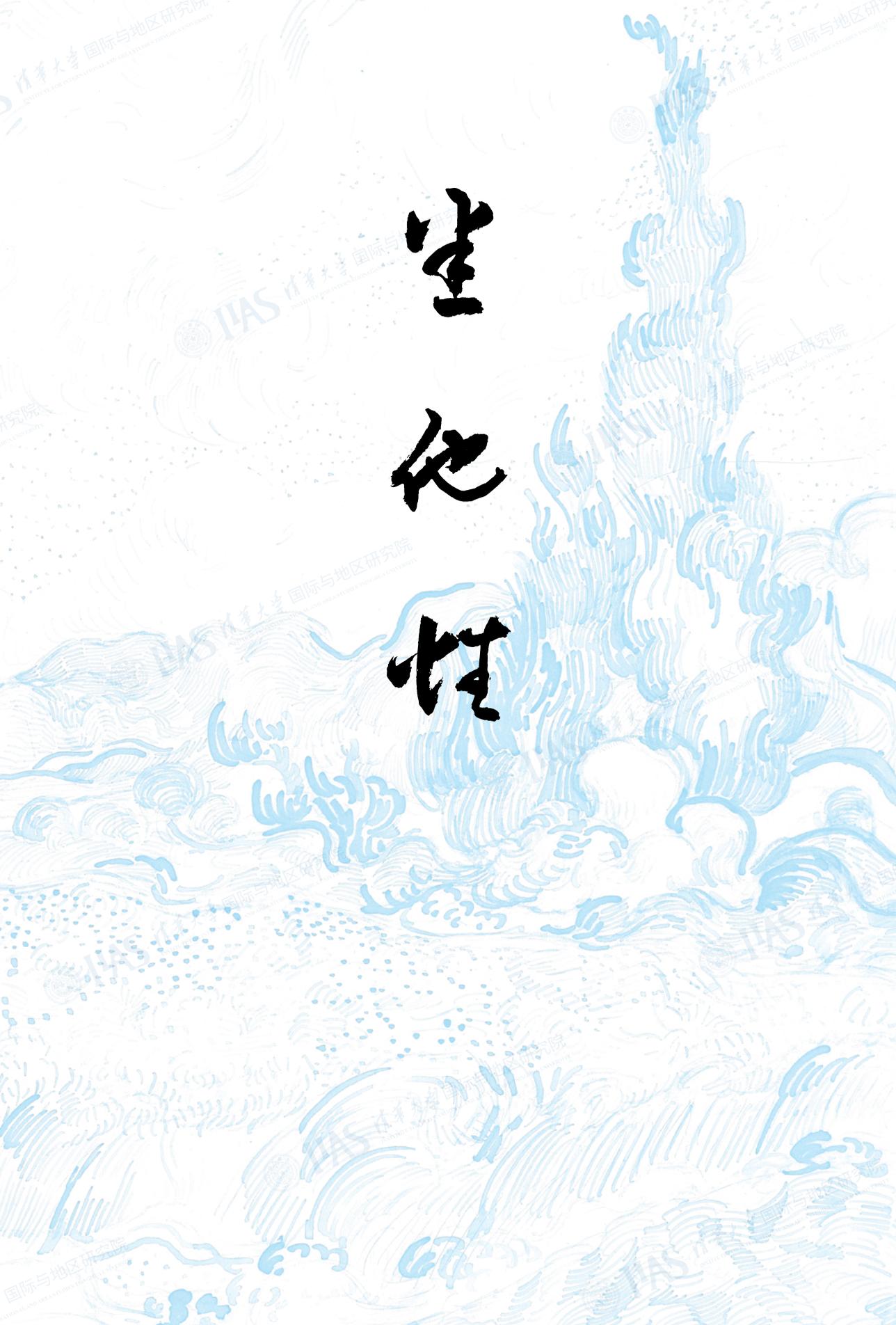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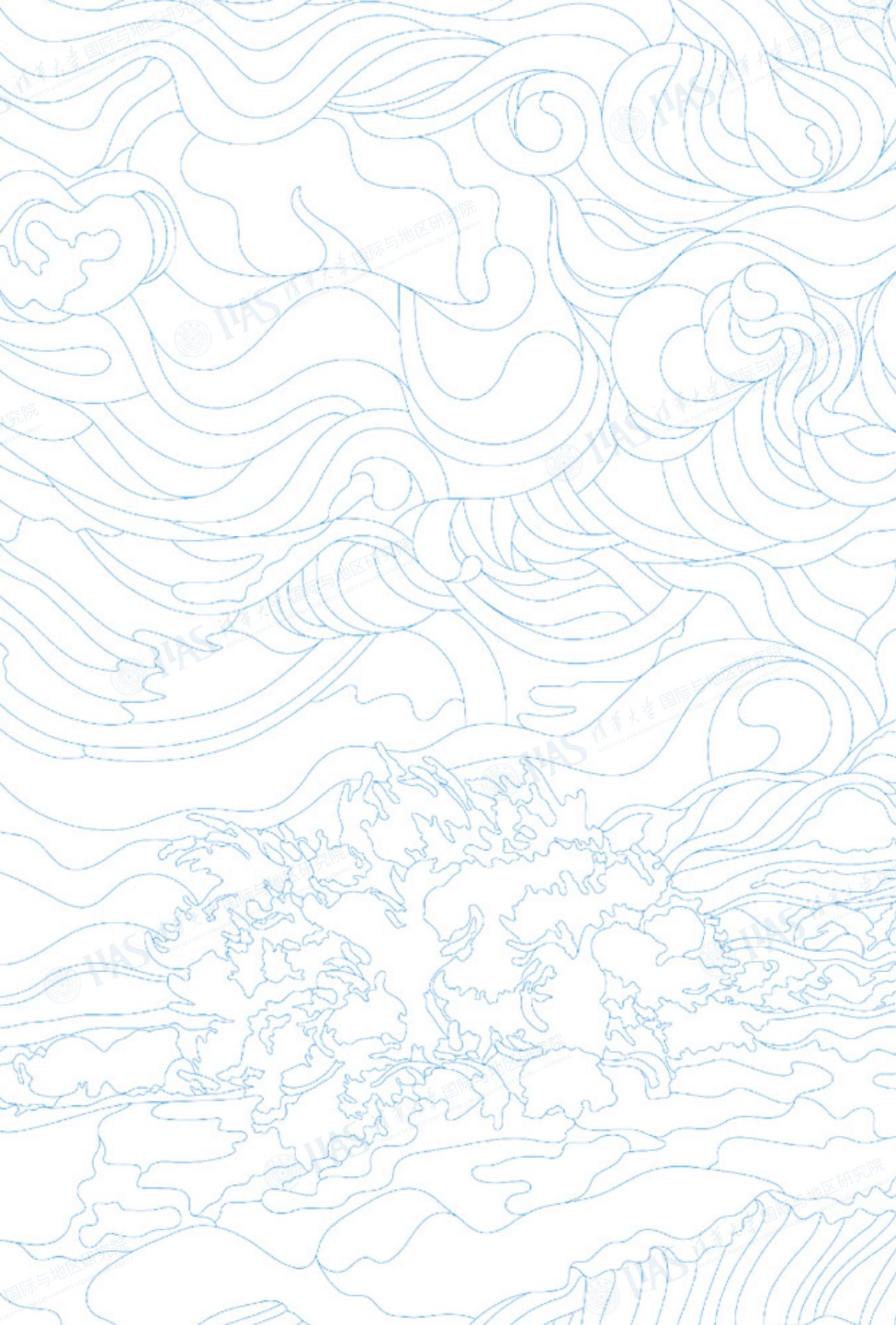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AS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 生物多样性





# 美丽“她者”：我的坦桑尼亚二房东

高良敏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与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

说实话，以男性的角度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我有些惶恐。然而，在坦桑尼亚的生活中，我无法忽视“女性”。除了那些自信、偶尔傲慢、高谈阔论、高高在上的男性之外，“她”和“她们”组成了我田野调研与生活的另一部分。从女性同事、病人、医护人员、二房东等身上，我不仅看到勤劳又任劳任怨的她们所承载的“生活常如及社会苦楚”，还看到她们的奋进、独立、自信，甚至人间大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她们无疑都是走在方兴未艾的女性崛起之路上的美丽‘她者’”，并非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所控诉的“看不见的女人”。行路者之一便是我的二房东，何况她是离我如此之近的一位坦桑女性。

## 一、奋进之美：初见二房东

“Neema”为斯瓦希里语，经常被用作女性的名字，其意之二大致为“出生在繁荣时期的人”或“一个美丽的女子”，含安享繁荣、美好生活的意愿。内玛（Neema）也是我在坦桑尼亚巴加莫约（Bagamoyo）小镇的二房东的名字。

2016年1月23日，由于法拉扎玛村（Falazama village）周边环境嘈杂，尤其周末经常莺歌燕舞，为了寻找适合晚上整理笔记和写作的房子，我决定搬离。在第二天早上，经朋友介绍，说内玛哥哥有空房子可出租，我和朋友欣然前往。我从巴加莫约小镇路边进入一个1-2亩的大院子，看到两边停满了报废的摩托车和二手汽车，远处正对着的简洁清爽的房子前，有两棵印度苦楝树（Neem tree，也称宁树）如同门一般侧立。

在院子里，我见到了内玛。她穿着当地妇女的典型装束，手挽扶扫把，体态端庄，谈吐优雅地向我打招呼。此时，一个身穿白色背心的男子从房右侧门里走出来，他便是内玛的哥哥吉瓦拉拉（谐音）。只见他脚踩十字拖，见到我们后非常绅士地解释说，他正在打扫房间，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图1 笔者所租房子 作者拍摄

内玛，40岁（2016年），离异多年，现无业，靠出租房和一间生意不怎么样的商店维持日常生活，女儿在达累斯萨

拉姆市（简称“达市”）读私立高中。内玛出生在坦西南部的苏巴汪嘎省（Sumbawanga），高中毕业后，自费来到巴加莫约艺术学院（Tasuba）学习非洲画和舞蹈，后来和一名公务员结婚，生育一女。婚后5年，老公调往达市任职，便抛弃了内玛。2000年，内玛曾受聘于德国某非政府组织，开办了一所非洲传统雕塑学校，她任校长一职。起初，学校生源不错，但在第一个5年周期结束后，由于雕塑作品售卖不理想，日常运营入不敷出，学校在2006年被迫关闭。

之后，她凭借深厚的技艺功底和艺术修养，依靠雕刻木雕、编织饰品、绘画、染织等手艺换得了一份可观的生计来源。内玛还在雕塑学校背后购置了土地，搭盖了两间大房子，一间自己居住，一间出租。租客大多为来到当地的外国人，因仅有一个房间，价格一般在每个月10-20万先令不等（约300-600人民币）。内玛说：“常租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钱的多少，其实很多当地人都可以出得起这样的房租；而是因为外国人来到这里，可以和他们聊天、交朋友，偶尔还会品尝不同国度的美食，了解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情，开阔自己的眼界，这是非常棒的经历。我在当校长期间，也去过德国、英国等国家，社会文化都不同于坦桑尼亚。”

或许，内玛遭遇婚变后的种种成就足以说明其努力奋进的美好品质，但她的“美”在对于情感的追寻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 二、“家”之美：兄妹与家人

我的房东吉瓦拉拉已经结婚，育有3个孩子，在家中排行第二，有9个兄弟姐妹。因父亲为一名军人，他和几个兄

弟姐妹有机会系统地接受现代教育，在巴加莫约艺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来在芬兰获博士学位后定居芬兰，一般每年5到7月、12月到次年1月返回坦桑尼亚。之所以回国，一是为了处理房屋出租、维修和支付门卫工资等事宜；二是由于北欧日照时间短，天气寒冷，他希望回到炙热的印度洋“度假”；三是为了处理苏巴汪嘎老家留下的各种事务，如父亲去世后，与老家的亲妹妹发生的漫长的房产继承权纠纷，以及我所租房屋所在地的土地权纠纷等。他定期来往于坦桑尼亚与芬兰，可谓“候鸟式”的生活常态。

对于内玛，尽管吉瓦拉拉一直在我面前称其为“妹妹”，但其实他们早已“如胶似漆”，可谓“兄妹亦情人”。之所以如此，在内玛的立场上，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在传统意义上，她的女性身份被固着于家庭、宗教、子女。

对于家庭，内玛不愿意过多谈及前夫，只是说他会偶尔给女儿生活费并资助女儿到达市上私立学校。她也将大部分房租及一些额外收入留给女儿，毕竟以后还要送她到欧美留学。在她现在居住的房屋里，也一直为女儿留有房间。除了女儿，内玛最为重要的人就是吉瓦拉拉。刚认识内玛时，我天真地以为吉瓦拉拉真是她哥哥，经过一系列事情后，才改变我对他们兄妹关系的判断。

在谈到宗教信仰时，内玛说她父亲信仰基督教，母亲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她也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信仰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她说：“我既是基督教，也是穆斯林，50%和50%！我很少去教堂，也基本不去清真寺。”在当地穆斯林的眼中，一夫多妻天经地义，这种婚姻模式既彰显着男性的魅力、财富、地位，也代表着女性归属于稳定而强大的家庭。

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多性伴或婚外性则是禁忌。女性忠实于丈夫，情感亦或身体。拥有 50% 的伊斯兰信仰认同的内玛显然知道，跨越宗教框定的“界限”意味着什么。因此，长期单身的她，对之前失败的婚姻充斥失望的同时，也在新的情感生活中寻求期待。在吉瓦拉拉这个游离于芬兰和坦桑之间的“候鸟”身上，她找到了渴望的情感。而另外 50% 的基督教徒身份使得她在处理与异性的交往时，少了很多牵绊。在当地的基督教社区中，甚至一些穆斯林群体中，“多性伴”的现象常见于较为年轻的人群，也偶见一夫多妻。显然，“兄妹”、“家人”成为了内玛处理或者游历于个体情感空间的最佳“托词”。

在女儿眼中，内玛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仅就这一点，内玛不可能让女儿知晓她和吉瓦拉拉的情人关系，这会破坏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在她们的谈话和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吉瓦拉拉”。2016 年 5 月底，吉瓦拉拉准备返回芬兰，内玛依依不舍，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我也会很识趣地尽量避开。而面对女儿，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吉瓦拉拉的关系。2016 年 6 月的某个周末，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从达市返回巴加莫约，内玛希望我能够告诉她女儿一些关于申请国外奖学金的信息。我让她周末带着女儿到我租的房子一起上网查询相关信息，但她说：“还是去我家，这里不适合，她很少来这边。到时候你把电脑带过去就行，我可以为你们准备午餐。”她还说女儿不怎么知道吉瓦拉拉的房子。她和吉瓦拉拉的情人关系成为了母女间不能说的“秘密”。周末我去她家时，内玛女儿难掩自己对于母亲的佩服：“我很爱我妈妈，妈妈和爸爸离婚后，她还会给我钱，支持我去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我妈妈很伟大，以前是雕塑学校校长，现在自己开商店、出租房屋，还是一个妇女互助组织的领导。她总是努

力的去赚钱，为我的未来计划着。我很爱她！”



图2 正在院子里印度苦楝树下打扫卫生的内玛 作者拍摄

原因之二，不是说有了家庭、宗教、女儿的束缚，内玛的情感就没有了表述的空间，“情人关系”的建构与处理诠释着情感表述的另一个面向。

虽然，在我面前他们一直都互称兄妹，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我获知了他们真正的“关系”为情人。首先，起初入住时的每天下午1点左右，我都会在院子里看到内玛为吉瓦拉拉准备的一篮子丰盛午餐。如果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内玛不可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准时地为吉瓦拉拉准备丰盛的食物。第二，入住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吉瓦拉拉问我是否需要一起到内玛家吃饭，在我表示已用餐后，他提起一个大包走出院子，还说今晚不回来。第三，直到入住的第二个周末，我正式认定了他们为情人关系。那晚，我在房间里看书，在客厅（厨房、客厅为同一间）中，吉瓦拉拉正在准备晚餐。长期在芬兰生活使他养成了男人下厨的习惯，在坦桑尼亚则很少见。晚餐准备好后，他和内玛在客厅边用餐、边聊着甜蜜的话语，

喝着南非红酒，浪漫而温馨。到晚10点时，他们进入了吉瓦拉拉房间。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在客厅见到了刚刚起床的内玛。此刻开始，我认定了他们的情人关系，之前互称“兄妹”也只是一种说辞或对我这个外人有所避讳。

不过，相处时间久后，他们并不再把我当外人，而是把我当家人。厨房、冰箱的食物，我们共享。他们也很喜欢我做的中国菜，比如简单的土豆炒牛肉。慢慢地，内玛和吉瓦拉拉在我面前也不再以“兄妹”互称，而是以“家人”代之，当然这里的“家人”也包括我这个租客。之前，他们一直以隐讳方式来处理这种情人关系，这使得我们的共同朋友大多都不知情。因为，吉瓦拉拉在向他的好朋友介绍内玛时，总是称她为“妹妹”。

对于“家”，内玛的情感体现在常见的处理与家庭息息相关的一切事宜之中，还内嵌到与“外人”关系界定之中。特别是她与吉瓦拉拉互称“兄妹”关系，以及将我视为“家人”，都使得她对“家”情感阐释得到延展和丰富。

当然，种种“家”之外，内玛那种美的细腻表达则体现在她与吉瓦拉拉“燥热而漫长”情感守护之中。

### 三、爱情之美：“候鸟式”情感的等待与矜持

2016年12月，我第二次去坦桑尼亚期间，再次租下了吉瓦拉拉的房子。由于他还在芬兰，内玛代为处理一切租房事宜，便成为了我的二房东。刚到第二天，在她的邀请下，我去了她家做客并再次见到了她的女儿。长期相处下来，我在她们的谈话中仍然没有听到“吉瓦拉拉”的名字。2017年4月初，内玛告诉我吉瓦拉拉要回国。除了喜悦、激动，

她还要用行动来迎接自己的“情人”。用她的话来说：“……我得给他惊喜……我要表达思念，表达对他情感的自信和美丽……”

接下来是全面清扫庭院、屋子。2017年4月13日，内玛雇佣了一个年轻、偏瘦、呆滞而木讷的妇女来清理。她的名字叫马莉，家在镇周边的村子，今年19岁，家里很穷，是门卫大叔的亲戚。经门卫大叔介绍前来锄草，两天内完成可获2万先令酬劳（约60元人民币）。由于院子杂草较为茂盛，天气炙热，加之马莉锄草速度较慢、力度不足，她时常跑到水龙头处喝水和休息。见到我房间里有Afya（健康）牌桶装水时，她问道：“我可以喝点健康牌的水吗？”。晚饭时间，我在知晓她仍未用午饭之后，便邀请她一起用餐。我用一个大盘子装上米饭、蔬菜和一块鱼肉，递到她面前。只见她二话不说，不到2分钟就全吃完。这时，门卫大叔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开始质疑马莉的锄草进度。被训斥一番后，马莉便抽泣起来，索性缩卷在屋檐下，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第二天早8点，马莉再次前来锄草。她也格外卖力、认真，虽然天气依然炙热，休息次数也比昨天少。然而，直到下午3点时，内玛出现了。她查看了锄草的进度并表示十分不满意。一通抱怨之后，说想要换人。她打了个电话，然后骂骂咧咧地向屋子走来。见到我时，还向我抱怨，说已经换了一个年轻男性前来，一会就到，否则吉瓦拉拉回来时见到定然不高兴。10多分钟后，来了一个年轻壮实、抬着一把锄头的男子。比起马莉，他锄草的动作娴熟、有力，且速度快。站在一旁的马莉着急了，向内玛哭诉，希望让她继续工作。内玛态度强硬，骂骂咧咧地说了马莉一通。马莉听后，委屈地大声哭了起来。一番嚷嚷之后，内玛给了她8000先令（约24元人

民币)，她才哭着走出院子。3个小时后，男子锄完了整个院子的草，并得到了1万先令的酬劳。

除了打扫庭院外，内玛还要精心打扮一番。2017年4月14日（周五），约早上7点，刚刚起床的我便见到内玛和她的家仆（house girl- 吉妮妮）一同前来。内玛边走边吩咐吉妮妮今天早上要做的事情，包括把吉瓦拉拉房间的所有行李、衣物、蚊帐都清洗一遍，还要打扫卧室和客厅。见到我后，她高兴地说明天吉瓦拉拉就要回来了，还让我今天早一点从医院回来，也把房间打扫打扫。

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年多以来内玛第一次这么早来，甚至还未用早餐。我从她温柔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中，透知了她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对于近半年未见的情人吉瓦拉拉，她的迎接方式和面部表情充斥着“荷尔蒙”之“美”。

而在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女人的“美”不仅体现在勤劳持家之上，还体现在对自身体态的维持、容貌的打扮梳理之上，展示美丽的自信与独立的个体，当然也为了吸引异性。在自身体态方面，女人对于“美”的追求体现在穿着打扮的细枝末节。华丽而耀眼的长裙为显示身材之婀娜多姿自然不可或缺，是重要节日、仪式、庆典以及会见或迎接重要客人的基本装束；身上的纹饰既保守又灵动，显欲望与自信之美；在头颈部，各种坠饰自然也不能少，黄金坠饰是向外界显示自身财富和高贵地位的重要饰品。而大多当地妇女，往往趋向于购买廉价的装饰品，多为金光闪闪之物。在我看来，那些时尚、自信、美丽而多样的发型则成为了她们诠释“美”的最重要特征。

同样，对于内玛而言，她需要好好对自己的头发打扮一番，目的是为了向许久未见的吉瓦拉拉展示美丽，表达对从

远方前来的情郎之爱慕与思念。当天下午4点左右，当我从医院回来时，内玛高兴地对我说，她请了一个当地著名的发型师来做头发。我说：“为什么不去理发店？”，她回答道：“在家里做头发，理发师会很认真，但我也得多付钱。”我好奇地问道：“你要做什么发型？”，她说：“当然是脏辫了！”。我又问：“为什么呢？”，她直接回我，“因为时尚、美丽！”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尼格罗人中（黑肤色的人），毛发多为卷曲状，但头发却成为展示身体之美、表达自信及彰显时尚的一个重要元素。殊不知，通过头发或发型表达“美”的文化早就在非洲扎根和流行开来。很多当地人都有“锁发”的习惯，因族群、地点和个人而异，比如东非的马赛族武士常用长而薄的红土“锁发”；它同时也是很多族群巫术中的重要元素。很多族群的孩子出生后就被锁住头发，正如格莱齐尔（Glazier）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那样，班图语中的“Dada”（女士）一词就来源于此。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从牙买加而来的 Rastas 发型逐步进入非洲，与本地发型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系列新发型，也就是我们所熟悉各种各样的“脏辫”（Dreadlocks）。



图3 笔者与当地艺术家兄弟们 作者提供

据我了解，在坦桑尼亚一带脏辫大致可分为六类，但不局限于此：第一，错位型（Twende kilioni），将短短的头发挤成一束，从额头往后面按列编排，不管头发长短均可。简便时尚，很受在校学生、青少年欢迎。第二，乞力马扎罗山型（Kilimanjaro），此风格往往在第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完成，但需要更多的头发，特别是长头发，像乞力马扎罗山一样层层叠叠而高耸。第三，牙买加自然型（Rasta Asili），用自然的头发编织而成，由于这种风格的脏辫往往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使用最自然的头发，否则时间长了会产生异味。第四种，人造发的牙买加风格型（Rasta za Bandia），人造头发嫁接到自然头发之上，形成一种新发型。当地人说，这样的头发不会像欧洲人的头发那样变白。第五，顿挫型（Mabutu），简单而时尚，一小撮头发独自成体，犹如顿挫型通道。第六，黑人发型（Afro），通过修剪而成，适合中等长短的头发，犹如一把撑开的伞。在上述六种中，在当地最为常见的是错位型。

据波利亚科夫·迈克尔（Poliakoff Michael）的研究，脏辫的产生有宗教因素。Dread为“敬畏”之意，Lock为“锁”，编发时要用技巧把头发从发端“锁”住，然后往下编。古时非洲人所编的雷鬼头，蕴含着尊重自我、敬畏神灵之意。据非洲历史记载，最早开始编脏辫的是埃塞俄比亚某祭司，脏辫逐渐成为神圣的象征。据记载，非洲之外最早出现的“脏辫”可追溯至公元前1600-1500年，阿克罗蒂里（Akrotiri）（现代希腊圣托里尼岛-Santorini）一幅年轻拳击手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男子的长长发髻，属于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中的一种（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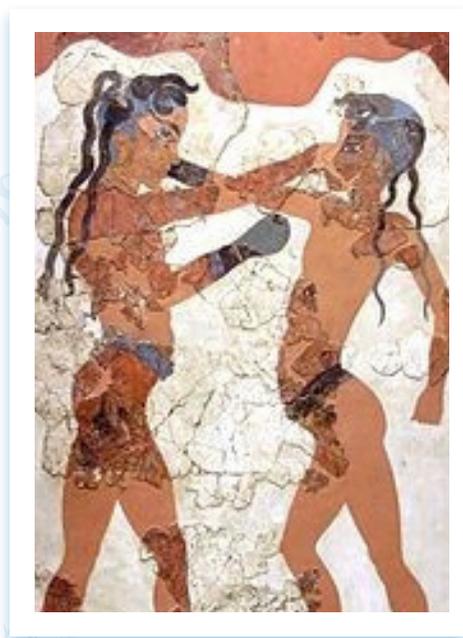


图4 古典脏辫图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pic/脏辫>

而当下脏辫也逐步演变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交需要，也体现着时尚与美观。脏辫之所以为“脏”，一个重要原因在外人看来，自头发接上去之后，就无法也不会洗头，看起来毛糙而奔放。然而，在当地女性看来，这是展示自我躯体之美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展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然，也有人比较喜欢来自亚洲的黑短顺发型。在当地医院工作期间，我的头发就时常被当地病人、医生和护士触摸，他们还会说上一两句“头发真好”的话。加上，医院里也有常戴短顺假发的某护士，我们俩就经常被戏称为“中国男孩、中国女孩”！

就脏辫发型的现实意义而言，正如巴加莫约某理发店店主哈桑妮对我说的那样：“在非洲，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每个人都爱美，而我们拥有天然短细的卷发，很难展示出美和自信，因此接上假发也就很有必要。这是非常时尚的，男

女老少均适用。不过接头发是花钱的事，一般要花费 4-5 万坦先令（约 150 元人民币）。很多农村人会选择自然的发型，近年来也比较受到推崇，比如错位型、顿挫型。无论如何，发型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庆典、重要节日、仪式的时候。”

下午 5 点多，发型师前来。内玛和他便在空旷的院子里摆开阵式，开始做起了头发。大概 2 个小时后，内玛的头发终于做好。她高兴地问我，“这头发如何？”我竖起大拇指说，“很漂亮，和你的美很搭。”说完，她还小跑到我房间的大镜子前照了一番。随后，只见她高兴地哼着小曲到卫生间清洗手之后，来到厨房，将早上买来的鸡肉、牛肉从冰箱取出，准备做饭。她说，吉瓦拉拉好久没有吃到坦桑尼亚的食物了，要好好准备晚餐。



图 5 我与两位房东一起就餐 作者拍摄

然而，因交通拥堵，吉瓦拉拉来电说，到达巴加莫约时估计会是晚上 11 点左右了。内玛得知后，一个晚上都显得有些焦躁，来回地在客厅走动，还不时看看早早做好的饭菜。

直到晚上十一点半，随着院子大门外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她终于等到吉瓦拉拉了。他们在快速用餐后，开始享受彼此陪伴的宁静与惬意……

### 四、大爱之美：二房东的悲悯之情

如同很多奋力前行的女性一样，内玛之“美”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她的那份社会情怀。多年前，她与巴加莫约的八个妇女一起，共同成立了妇女互惠互助的自发组织。这九名核心成员多为离婚妇女或寡妇，旨在通过倡导女性通过传统手工技艺来寻求经济与人格的独立，同时积极帮助当地的年轻女性，特别是那些被男性抛弃的女性。此外，她的小组还不时以传授传统手工技艺的方式，为当地青年女孩或在校女孩提供指导和帮助。之所以提及年轻女性，是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田野图景分别是：其一，我所在的当地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的艾滋病患者中 70% 左右为女性，且 20 岁以下女性较多。她们大多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在祷告、给家人准备早餐之后，搭乘乡间巴士，摇上几个小时前来中心就诊。



图6 作者办公桌前的日常，排队领药的病人，女性多寡一眼可见 作者拍摄

其二，时常被坦桑尼亚媒体提及的在校学生怀孕事件，政府往往不允许在校期间怀孕的学生返校，并时常予以讥讽和排斥，进而对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予以削弱和剥夺。另外，还有层出不穷的童婚事件，等等。可悲的是，政府却以权力和道德的名义剥夺她们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让无尽苦楚留存人间。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内玛等诸多领路人所怀有的悲悯之心。尽管坦桑尼亚女性崛起之路方兴未艾，但抗争与救赎，乃至自立之路却一直存在。正如内玛所说：“这类事情在坦桑尼亚很常见，我们也帮助过很多人。我们知道要改变真的很难，但我们小组一直在做，特别是教授一些传统手工技艺，让女孩们长大后可以获得一份使其独立的生计。”

## 五、看得见之美

回到生活之常如，内玛如同诸多当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偶尔有着高高在上之面向，也会对更低阶层的女性或男性大呼小叫；同时，她也有着普通女性对现实生活的努力奋进，对生计问题的“斤斤计较”，对家人关怀之无微不至。诚然生活之悲与欢，不能否认其看得见的美。在这一意义上，我看到内玛之“美”在于生活和事业之奋进，对女儿关怀备至之亲情，对爱情之追寻与守候。在她这里，“美”的表达无不体现着独立、自信与矜持，以及人间大爱。

尽管“人如其名”，她者之美并非“看不见”！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许帅

# 伊朗式个人主义：家之外的自我追逐

刘岚雨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中东

## 一、缘于知识界对“伊朗为什么会落后？”的追问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相对于解释或解读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先制造一个问题，好听一点说叫发现一个困惑。就拿 Ali Mohammad Izadi、Kazem Elmdari、Mahmood Sariolghalam、Homa Katouzian、Sadegh Zibakalam、Mohammad Reza Tajik 等诸多知名的研究伊朗发展问题的当代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着迷于一个以“伊朗为什么会落后”为困惑的问题范式。这一困惑是在比较 19 世纪以来伊朗和西欧国家的发展史，以及看到伊朗今天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后产生的。



图 1 Kazem Elmdari 的《为什么伊朗落后而欧洲进步了？》

图片来源：伊朗 economya 网站

伊朗为什么会落后？这一困惑的产生反映出伊朗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在看待伊朗发展问题时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首先，这一困惑体现出当下伊朗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才会让他们感到伊朗落后于西方会是个问题。伊朗人的民族优越感主要源于伊朗人对其三千年辉煌古代文明的集体记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人接受了雅利安人是最优等种族的学说，其结果是伊朗人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基因始终是上等的。相比之下，对于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心有不甘。其次，这一困惑也体现出伊朗人内心的自卑，这可能源于屈辱的现代史和当下差强人意的发展现状。他们渐渐质疑自己的一切，包括历史、法律、教育、信仰、文化、人际交往模式、自然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发色、肤色、容貌、穿着、语言、思维方式……

但是，这种自我怀疑并不是因为他们正视和接受了自己的不足，相反，这些质疑是作为个体伊朗人走出矛盾心理，重获优越感的出路。现代伊朗之所以被称之为落后，是因为每个伊朗人内心中对优越感的追求。通过否定一个抽象化的、刻板化的和典型化的落后伊朗和伊朗人，可以剥离自己的伊朗属性，也就是落后的属性，从而重拾内心的优越感。正因如此，在当今伊朗社会中我们能看到女性以染金发为荣；会说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人会有优越感；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孩会去美容院定期接受紫外线照射以使肤色保持古铜色；有亲属在欧美国家生活或留学会拿来炫耀……然而，尽管作为个体的伊朗人极力通过质疑和否定伊朗元素来摆脱所谓落后的伊朗身份，但是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却是非常伊朗化的，即追求并捍卫内心中根深蒂固的个体化的民族优越感。

这种以否定旧有身份认同而重获个人优越感的路径导致

了社会凝聚力的缺失，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每个派系都不承认和接受其他人、其他家庭和其他派系与自己有共同属性，相互间视彼此为落后的、没文化的、自私的、心怀恶意的……，认为只有自己、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圈子是优越的、有文化的、慷慨的、善良的……这导致伊朗社会中存在明显特权个人主义，社会呈现出家族本位和圈子文化的特征，政治领域的突出特点是派系政治。

在两次和 Homa Katouzian 博士探讨伊朗为何时至今日仍难以实现社会长期积累时，他都提到了 Reza Banakar 和 Zara Saeidzadeh 所提出的伊朗式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伊朗式个人主义不同于西欧式个人主义，西欧式个人主义者会考虑公共的自我形象，行为趋于理性，用“我”进行自我界定，而不是“我们”。这种个人主义实质上仍接受社会的约束，但是已经摆脱家庭纽带的牵制。而伊朗式的个人主义者需要用“他们”来界定“我”和“我们”，而“他们”常常带有负面色彩。正如 Katouzian 指出的那样，在伊朗式的个人主义下，伊朗家庭成员之间会对彼此倾力支持，但是对家庭成员之外的陌生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加以利用。可见，伊朗式个人主义正是本文所说的基于“我”和“我们”优越，“他”和“他们”落后认知下不计手段谋求优越感的特权个人主义。



图2 Sadeq Zibakalam 的《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的？伊朗落后原因的探究》  
图片来源：伊朗 hiword 网站

## 二、家：彼此倾力支持的社会单元

伊朗式个人主义的盛行导致社会中存在普遍的排他性，不仅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排斥，而且国家与社会之间也相互排斥，主要表现是信任的缺失。在一个缺乏信任，彼此相互排斥的丛林社会中，个人的避风港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尽管在这两个社会单元中也存在成员间彼此攀比的现象，但是更多的则是相互之间彼此关照和倾力支持。

在这里笔者讲一个自己的经历。我和 H 君是好朋友，但是 H 君视我为家人，他总是亲切地叫我 Dadash（指兄弟）。每次去他家做客，他的母亲总是盛情招待。每当我表示感谢时，她的妈妈总是说：“你就像是我的儿子，和 H 没有区别”。在成为 H 君的家人后，除日常生活用品外的“贵重物品”多数都是通过他的熟人网络完成的。在一次他陪我去商场买登山鞋时，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去买，我在巴扎认识熟人，价格相对便宜。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去买东西一定会被坑，他们能开出任何可能的高价……事实上，就算我这伊朗人去买东西也经常被骗。”此后，我从他表弟朋友的店里买了登山鞋；从他姨夫父亲家的地里买了藏红花；从他小姨夫家里买了地毯。

在这之后，有一次我和 H 君途经一家地毯店时



图3 从田地里采摘的新鲜藏红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看到了与我的地毯相似的地毯，他说：“走，进去看看，让你知道我给你省了多少钱！”进去后一问价格，竟然比我买的还便宜五百万土曼（约 1250 人民币）。走出店后，H 君开始认真地解释说：“你看见了吗？那个地毯颜色那么亮，肯定是化学染料，里面肯定有塑料。现在的地毯商为了赚钱，什么都做的出来。”

### 三、两个观察：家之外的他者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分享两个对家之外他者的观察，以让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伊朗式个人主义。

#### 观察一：“因为伊朗人”

S 君是一名受到后现代思潮洗礼的政治学博士生，反对社会中一切固有的条条框框，带有一种唯自由的专制气质。在和他熟络之前，我常常向他询问一些琐碎的问题，且常常带有负面色彩，诸如“为什么你们的米饭那么大分量”，“为什么你们开车那么快”，“为什么你们总是迟到”。有趣的是，他在回答时从来不说“因为我们”，取而代之的是“因为伊朗人”和“因为有些伊朗人”，常常给人一种他不是伊朗人的感觉。

事实上，他经常向我重申他和典型的伊朗人不一样：“伊朗人喜欢喝红茶，但是我喜欢喝绿茶”；“伊朗的饮食非常糟糕，太多的烤物、炖菜和太多米饭，很不新鲜，很不健康，我在家只吃沙拉和鸡肉，西方人都这么吃”；“伊朗人从不遵守纪律，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做，我没法和他们共事，所以我不想出去工作”……

今年 8 月的一个工作日，我乘他的车去拜访他的导师，

由于心情紧张，他开得忽快忽慢，数次突然刹车让我精神高度集中。在快行至高速路的一个出口时，出现了一长一短的两个车队，显然是等待出高速的队伍。S君从外侧车队的直行道上驶过，然而在驶过后他突然掉头拐弯，向外侧车队的前排插去，等待时机加塞儿通过。他的这一举动颠覆了我对他的认知，此前我曾以为他真是自己标榜的少有的几个遵纪守法的伊朗人。

“我们是这是要插队吗？”我问。

“我刚才没有注意到我们需要从这个口下高速，如果不是从这个口下高速我们得绕很大一圈才能到教授那，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口出。”他回答说。

“那些排队的司机看到我们插队一定很生气，可能不会给我们让路。”我说。

“不会的，对于他们来讲很常见，等前面那辆车走的时候我们得迅速跟上。”他说道，“你看，这里有两个队伍，肯定是之前哪个想要插队没有很快通过，在他后面又排了一队”。

不到3分钟的等待，S君成功抓住间隙迅速挤进车队中，此时我们的后面多了三辆等着加塞儿的车。在进入辅路后，S君长舒一口气



图4 位于德黑兰的一条街道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说：“感谢神，终于出来了”。

### 观察二：“我应有的权力”

11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和S君约好一起去爬山，由于政府加强了防疫举措，外地车牌的车在德黑兰限行。因S君的车牌是外地的，所以我们通过搭车软件叫了一辆车。运气不错，我们叫到了一辆崭新的白色萨曼德轿车。司机是一个稳重的中年男人，从气质上看他很像银行部门经理。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有大量高学历的人成了拉客司机，也有很多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工作之余通过拉客来补贴家用。就我个人经验，多数高学历的拉客司机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而多数兼职的拉客司机是银行职员。

由于将近下班时间，市区的主干道车流开始增多，但还没到拥堵的程度，呈现出车辆高密度的迅速流动状态。我们的车在驶过一个三岔路口10米左右后突然在路边停了下来。S君忙问司机状况，司机表示刚才应该在三岔路口右拐。在回答完S君后，司机开始往后倒车。看着后面连续驶过的车流，我有点害怕，我询问司机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到。司机没有回答我，继续倒车。我看了眼S君，S君做出无奈的表情。

司机终于将车倒回到了三岔路口的边缘，但是后面向右拐的车没有丝毫减速让路的意思，相反后面车在意识到我们想要倒车右拐时都加快了右拐的速度。司机开始全神贯注地寻找倒进三岔路的时机，当他终于看到后面向右转的车辆之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距离差后，他猛然加速将车倒入三岔路口，然后迅速右拐。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辆后面的车鸣笛，仿佛大家都将其看作是比拼技艺和勇气的游戏。

回到正路之后，司机高度紧张的神经开始放松，他终于回想起我问他的问题，他说：“有其它的路，很多路到那里，但是要绕很远，在这样的国家经济形势下，在这样的油价下，绕那么远我会亏的”。显然，这是司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反了交规，将乘客和其它车辆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但是司机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相反觉得是政府的错，是因为政府在没有治理好经济的同时，提高了油价导致他遵守交规会亏损。对于司机而言，他刚才的倒车并不是违规行为，相反是他应有的权力，他早已忘记了自己在此之前开错路的失误。

#### 四、思考

家庭之外的伊朗个人主义者，在维护个人利益时可以牺牲纪律、法律、规则、规范等一切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限制，就像 S 君和司机在开错路后为了避免绕远路可以轻易地通过违反交规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违反规则后，伊朗个人主义者通常不会觉得自己犯了错，相反认为违规是一种权力。就像 S 君在为自己行为证成时所说的“第二个车队也是之前插队造成的”，他认为别人既然可以这么做，自己理应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就像司机认为，他之所以违规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好，他的违规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力。

上述证成逻辑透露出了伊朗式特权个人主义的核心心态，即我是优于他 / 他们，或我跟他 / 他们比相对不那么坏。在这种心态下，伊朗式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是一种个人特权，而犯错则也是一种权力。伊朗式特权个人主义普遍致使伊朗今天仍然很难形成一个有纪律和有凝聚力的社会，个人、家庭、宗族、圈子和派系的利益不仅凌驾于集体、

## 田野观察

社区和国家之上，甚至经常相互矛盾。其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排斥增加了伊朗维持国家能力的成本，国家在贯彻自身意志和目标时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理解和配合，效果常常大打折扣。

本篇责编 李宇晴 文字校审 董慧

# 苏普拉 (Supra) : 走进格鲁吉亚的传统宴会

梁孔孔

兰州大学格鲁吉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国家为格鲁吉亚

## 一、寻找苏普拉

2013年9月，因工作契机，我来到了地处南北高加索山之间的国家——格鲁吉亚，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美好时光。

格鲁吉亚不仅是欧亚文化融合的十字路口，保留了大量古老的历史遗迹，而且拥有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如雪山、草原草甸、海洋、沙漠戈壁等。春天，草原草甸地区各种野花盛放，红的、黄色、粉的，争奇斗艳，一片片的花海一望无际。当我和同事们驱车行驶在公路上时，只见路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花海，仿佛置身天堂。夏天是去黑海海滨度假的好时节。

周末，我们乘坐火车抵达美丽的海滨城市巴图米。海滩上遍布着形状各异的小鹅卵石，赤脚踩来踩去，非常舒服。有时我们也会前往山区、林区避暑，那里空气新鲜、气候湿润，让人流连忘返。金秋时节，葡萄成熟了。此时，前往当地朋友家的葡萄园采摘葡萄，可体验格式特色家酿葡萄酒工艺。冬天的格鲁吉亚最美，古多里 (Gudauri)、巴赫马罗 (Bakhamaro)、巴库里阿尼 (Bakuriani) 白雪皑皑。每年这个时候，滑雪场陆续开放，前往滑雪可体验在茫茫雪原中疾驰的快感。

提及格鲁吉亚，其曾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到1991年4

月9日才正式独立。然而国人对于格鲁吉亚知之甚少，大多数人对格鲁吉亚的了解只停留在茅盾先生笔下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以及它是斯大林的故乡。其实，格鲁吉亚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优质的旅游资源以及璀璨夺目的文化才是这个国家的名片。

纵观格鲁吉亚酿造葡萄酒历史，有8000年之久，是世界葡萄酒发源地之一。东部卡赫季州是名副其实的葡萄和美酒之乡，为格鲁吉亚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该地区种植的很多葡萄品种为格鲁吉亚独有。此外，首都第比利斯的街头巷尾都种满了葡萄树。到十月时，葡萄树枝头挂满了晶莹剔透的葡萄，踮踮脚便可以摘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这里的葡萄主要用来酿酒，家家户户都掌握了酿酒的技术。不仅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葡萄酒，让人眼花缭乱，而且在当地人喜欢的聚会上，一定少不了葡萄酒。不夸张地说，葡萄酒之于格鲁吉亚人，类似于白开水之于中国人。

而与葡萄酒密切相关的当地传统文化无疑是，我在当地生活7年中令我印象最深刻、心底最怀念的苏普拉(Supra)。之所以怀念苏普拉，不仅是因为美味的格餐和香醇的家酿葡萄酒，更是因为传统格式宴会融洽、和谐、热烈的氛围和别具一格的酒司令——塔玛达(Tamada，格鲁吉亚语:თამადა)文化，每每想起都亲切无比。

苏普拉(格鲁吉亚语:სუფრა)是格鲁吉亚的传统宴会文化，分为Keipi(格语为ღვინის სუფრა)(宗教、节日类宴会)和Kelekhi(格语为ჭირის სუფრა)(即严肃的、通常在葬礼后举办的宴会)。在格鲁吉亚语中，苏普拉意为“桌布”，可能与波斯语中的sofre(سرفس)，阿拉伯语中的sufra(سفرس)，亚美尼亚语中的sproc(սփրոց)和土耳其语中的sofra有关。上

至国家元首接待外宾，下到每家每户过节聚会，苏普拉都是主要形式，是格鲁吉亚社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还被列入了“格鲁吉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上，苏普拉的参与者主要为男性。一方面，女性和男性社会地位的差异，加之女性需要为聚会准备丰盛的各式美食，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及聚会过程中的传菜侍应的工作，所以她们在聚会中被视为次要位置。而当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已大有改观，女性也成为了参与苏普拉的重要角色。整个聚会过程中，餐桌上的男士会多次起身碰杯，相互致意，女士则无需起身，而且男士要主动为在座的女士斟酒，以示对女士们为举办聚会付出辛勤劳动的感谢。



图1 格鲁吉亚著名画家尼可·皮罗斯曼尼 (Niko Pirosmiani) 的油画作品“Begos 的朋友们”，展现的就是苏普拉之一 Keipi 的宴会场景。图中右侧手持牛角杯发表祝酒词的人为塔玛达 (酒司令)。该作品收藏于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

## 二、“一食两得”：与苏普拉的第一次邂逅

我第一次参加苏普拉，是受学生 Mecia 的邀请一起前往其卡赫基州的老家庆祝生日。Mecia 和她的父母、姐姐在首都

第比利斯生活和学习，祖母和其他的亲属则在老家生活。出发前一天，我订了生日蛋糕作为礼物。第二天早上，Mecia 的爸爸开车来接我和另一个同事，取完蛋糕后，我们就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达。只见 Mecia 的祖母、叔叔和婶婶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我用仅会的几句格鲁吉亚语和他们打招呼，然后就一起进入院子。院子虽不大，但收拾得非常干净，两侧花园里种着葡萄和蔬菜。而 Mecia 的叔叔早就搭好了烤肉的架子，上面架着一排排串好的烤肉，香味四溢。

格式宴会，烤肉不可缺少。提及格式烤肉，其中的姆祖阿迪（Mtsvadi）是特色，其食材以猪肉和牛肉为主，肉块较大（见图 2）。晒干的木材是烤肉的理想热力源，而葡萄藤是烤肉木材中的上品。烤制前，先将切好的肉块用调料、

盐和洋葱腌制，烤的过程中再往肉串上数次淋浇葡萄酒或葡萄汁，烤出来的肉肉质嫩滑、味道鲜美。边



图 2 格式烤肉姆祖阿迪（Mtsvadi）

图片来源：[https://www.tripadvisor.com/Restaurant\\_Review](https://www.tripadvisor.com/Restaurant_Review)

吃烤肉，边喝葡萄酒，真是极致体验。

Mecia 的叔叔在院子前方忙着烤肉，婶婶领着我们走进房子。客厅宽敞，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够十多人就餐。餐桌上早已摆满大盘小盘的格式菜肴和餐具，两大瓶家酿葡萄酒摆放在餐桌正中间，非常醒目。两大盘金卡利

(Khinkali) 紧挨着葡萄酒，也在中间位置。

金卡利是格鲁吉亚美食界的“网红”，其外形神似中国的包子，烹制方法则更像饺子，以水煮而非汽蒸；其馅儿以拌有香料的肉末儿为主，有奶酪馅儿、土豆馅儿和蘑菇馅儿。在山区，居民以牧羊为生，使得羊肉成为主要的肉类食材，因此山区居民多喜食羊肉馅儿的金卡利，而在其他地区，牛肉和猪肉末的混合馅儿则更受欢迎。金卡利一般趁热吃，吃法也颇有



图3 金卡利 (Khinkali)

图片来源: <https://www.tasteatlas.com/khinkali>

讲究，不能借助刀叉，而是直接上手。一只手捏住顶端的“尖尖儿”，另一只手托住底部，在皮儿上咬一个小口，从这个小口儿一点点吸吮里面的汤汁，等汤汁吮吸完，再将皮连同馅儿一口一口吃掉，最后留下顶端的“尖尖儿”放在盘子上。不吃“尖尖儿”倒不是因为什么特别讲究，而是因为“尖尖儿”往往夹生的，所以当地人一般不食用。关于金卡利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说古代鞑靼人将制作金卡利的方法带到该地区，也有人认为金卡利是格鲁吉亚原始山区的本土产物。之所以能从古代保留至今，大抵是因为它将格鲁吉亚人最喜欢的两种食材——肉和面食，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可谓“一食两得”的缘故。

而金卡利旁边摆的是烤蘑菇。烤蘑菇是将口蘑的根茎去掉，蘑菇口朝上放在陶制盘子中，将奶酪挤入口蘑中，置于烤箱中烤制而成。烤蘑菇的旁边放的是两大盘恰恰布里 (Khachapuri)。恰恰布里是“一食两得”的另一种美食，温热



图4 哈哈布里 (Khachapuri)

图片来源: <https://foodperestroika.com/2014/02/04>

粘稠的奶酪夹在饼中，轻咬一口，奶酪几乎要流将出来。奶酪香味四溢，实乃人间至味。而格式炖肉哈尔丘(Kharcho)、茄盒拌核桃末儿

和格式腌菜依次摆放在桌子的四周。

院子里烤好的烤肉端上了桌，Mecia 的爸爸开始招呼我们落座。看着满桌的美食，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Mecia 的爸爸告诉我们，暂时还不能开席，因为苏普拉的主角之一——酒司令塔玛达还没到。



图5 阿加路里 (Adjaruli)，哈哈布里的一种，做法类似于披萨，将奶酪置于做成格鲁吉亚传统面包——绍提 (Shoti) 状的面饼上，加鸡蛋后烤制而成。

图片来源: <https://www.tastingtable.com/dine/national/khachapuri-cheese-bread>

### 三、酒司令——塔玛达

传统宴会苏普拉的酒司令被称为塔玛达。毫不夸张地说，一场苏普拉成功与否，效果如何，与塔玛达的综合“素质”关系巨大。一名出色的塔玛达必须要有敏捷的思维，强烈的幽默感，要极善言辞、说话清晰灵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海量”。如果某位塔玛达在宴会中先醉倒，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塔玛达通常由家里的男主人或者聚会组织者指定的有威望者

担任，通常坐在长方形餐桌的一端，方便给在座的宾客敬酒。

对于这次聚会，Mecia 的爸爸邀请邻居担任塔玛达。大约十分钟后，本次宴会的塔玛达终于现身，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魁梧，体格健硕，肚子微腆。塔玛达热情地跟在场的所有人依次行格式贴面礼，当看到我和同事两张中国面孔时格外高兴。然后，他就坐于专属位置后，抬抬手示意大家落座，宴会正式开始。

随后，塔玛达起身端起酒杯，发表第一轮祝酒词，大致意思是祝贺今天聚会的主角——我们的寿星生日快乐，学习进步，越来越漂亮，并号召大家一起举杯向她表示祝贺。话毕，塔玛达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也纷纷效仿。随后，塔玛达示意大家落座并品尝美味的食物。在塔玛达发表祝酒词过程中，其他人要认真听讲，显示尊重。甚至是在每一轮祝酒间隙，其他人也不能私下互相敬酒，除非征得塔玛达的同意。

吃了一会儿之后，塔玛达起身端起第二杯酒，开始第二轮的祝酒词。这一杯是敬上帝，感谢主的恩典，赐给人类美味的食物和佳酿。接着第三杯是敬和平。此时塔玛达特别动情，他表示格鲁吉亚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爆发过无数战争，像他一样的老百姓格外珍视和平。同时，他特别提到，“中国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历史上从未侵略过别国”，他希望借这杯酒祝愿格鲁吉亚和中国都不再遭受战争的摧残，祝愿世界和平。第四杯是敬国家。祈求格鲁吉亚和中国都国泰民安，民族富强。第五杯敬友谊。塔玛达说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不可替代的美好情感，理应珍惜。他号召大家举杯同祝中格友谊万古长青，让我和同事深受感动。塔玛达特别强调下一杯敬亲朋好友身体健康，好运常在。此后一杯缅怀亡人，寄托哀思。再一杯，塔玛达建议在座的男士举杯

敬在座的女士们，感谢她们为聚会准备美味的食物，为家庭操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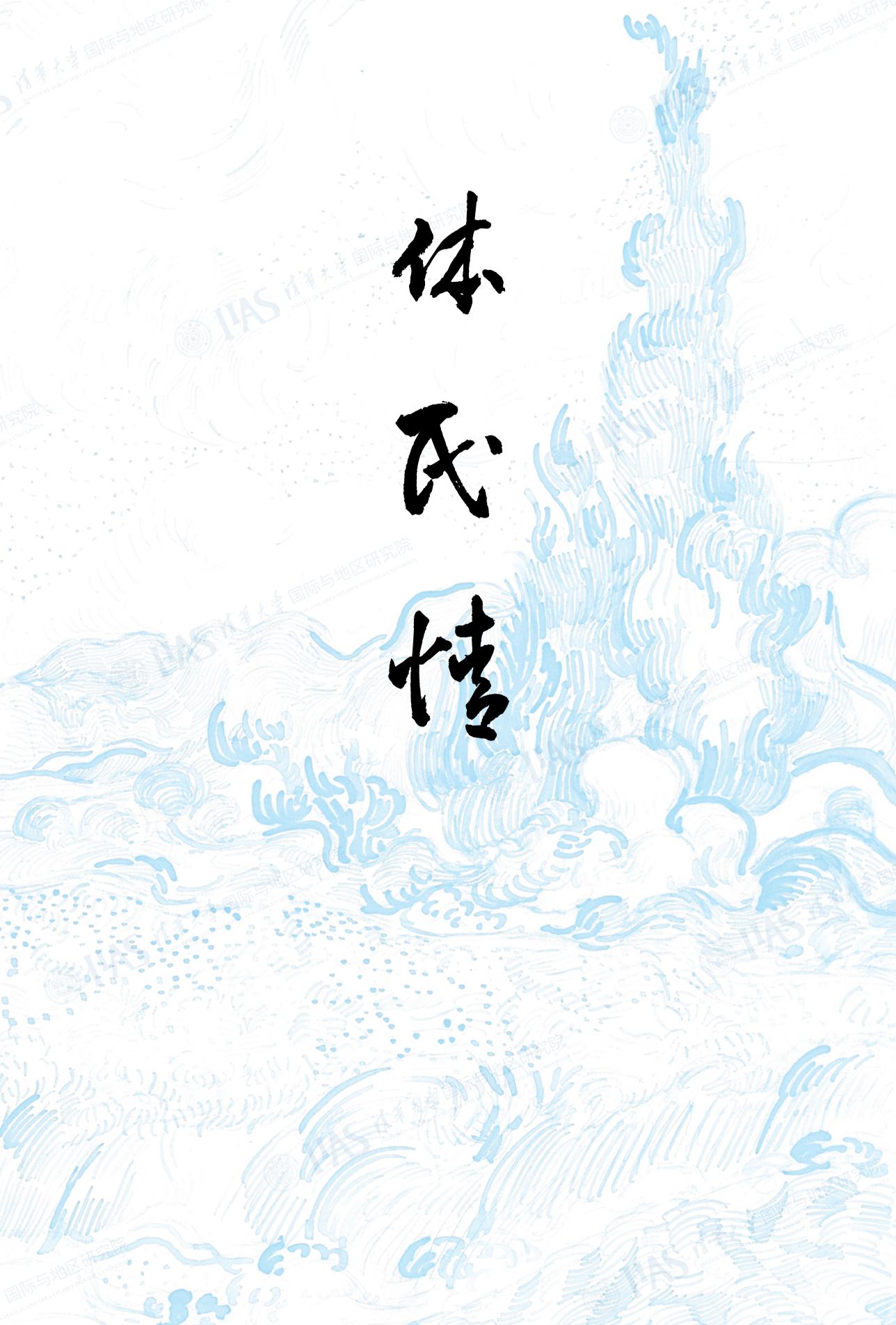
几轮下来，酒至酣处，塔玛达带头唱起了歌儿、跳起了舞蹈，并邀请所有人加入，聚会气氛越来越活泼。塔玛达开始挨个给每个人单独敬酒，其他人之间也开始相互敬酒，所有人都沉浸在美好氛围中。此时，Mecia 的祖母将点燃蜡烛的蛋糕端了上来，众人将 Mecia 围在中间，唱起《生日快乐歌》，第一遍是格语版，第二遍是英文版，第三遍中文版则由我和同事、学生一起演唱。这一唱，在场的其他人都来了兴致，纷纷表示想学中文生日快乐歌，我们三个开始逐字逐句地教授。经过十分钟教学，塔玛达开始领唱，大家一起唱起中文版的《生日快乐歌》，聚会气氛也达到顶点。整个房子里飘荡着欢声笑语，快乐冲出屋顶，回旋在整个院子中，萦绕在每个人心里，沉淀在每个人记忆里。美好且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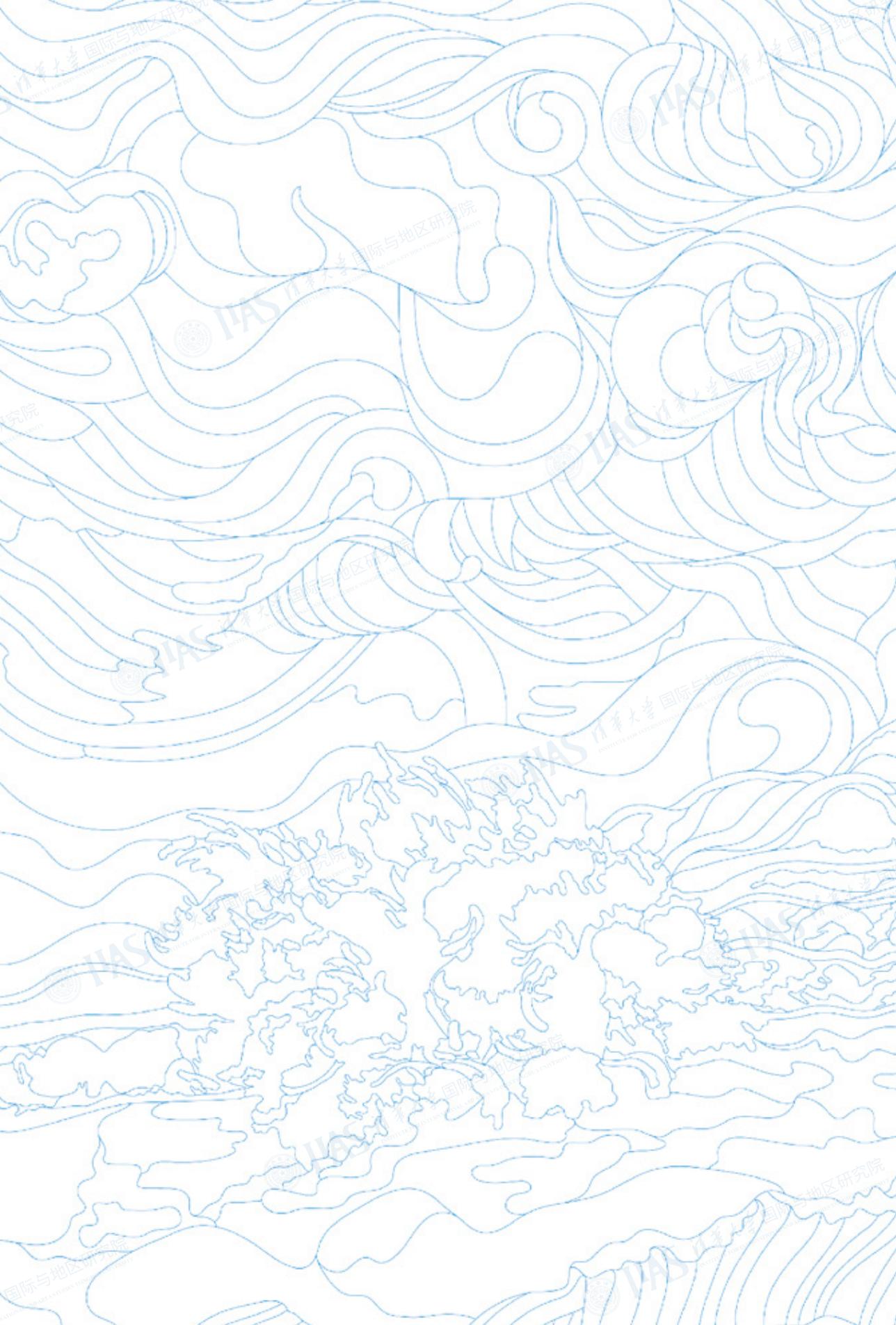
#### 四、结语

当下格鲁吉亚的饮食文化是由传统饮食方式演变，及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食物种类、烹调方法是这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饮食文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该国社会演变与运行方式。而富有格鲁吉亚特色的酒文化是其悠久葡萄酒酿造历史的深厚积淀，也能够反映出格鲁吉亚民众热情好客、爱好和平、注重家庭和睦的性格特征。

本篇责编 高良敏 文字校审 许帅

体  
民  
情





# 让我为你撑起一个“屋顶”：记一次在阿根廷志愿建房经历

袁梦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阿根廷

在 2015 年 9 月到阿根廷之后，最初一个月时间我的活动范围基本集中在首都市区内，来回于学校和家，或跟随同学参加总统选举的周边活动，或呆在家跟房东老太太练习西班牙语。10 月初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注册参加了非营利性组织 TECHO (Un Techo para mi País) 的志愿活动。我就这么跌跌撞撞地一头扎进了阿根廷的另一面，和当地现实的贫困问题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逐渐认识到除首都的繁华和喧闹之外，还有更完整的、更多元的阿根廷。

## 一、初识 TECHO

TECHO，在西班牙语中是屋顶的意思。而 TECHO 的目标也的确是致力于让贫困人群都能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1997 年，一群智利年轻人了解到拉美严峻的贫困问题，想要解决贫民窟居民的住房窘境，便成立了这一组织。他们希望能为居住条件糟糕的家庭建造适用的周转房屋，并改善拉美整体的住房环境问题。之后，这一组织扩展到了拉美其它的 18 个国家，既致力于解决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还关

注社会不公平现象。这一组织在 2006 年落地阿根廷，现在 19 个省份有分支，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 51 个区开展过志愿活动。该组织成员们会前往不同的贫民区进行入户调研，根据每户家庭的情况和户主的意愿来匹配哪些家庭需获得组织帮助修建紧急住房（viviendas de emergencias）。这些紧急住房标准大致为一间 3 米 \* 6 米的木屋，无水电系统，造价在 100 美金左右；如符合条件，且户主有意愿，每户支付约 10 美金就能得到一间紧急住房，且由 TECHO 提供原材料并组织志愿者协助建房。到 2015 年时，TECHO 仅在布省范围内就建造了近 6800 间紧急住房，全国范围内近 11700 间。这个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成员们一年两次的街头义演募捐；另有组织年会时，邀请前来参加的公司们加入 TECHO 发起的“扶贫众筹”。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资金来自志愿者或志愿家庭。

我最终加入的志愿小分队，属于 TECHO 首都联邦区分支，主要负责的是布省 Ezeiza 市 La Porteña 贫民区的紧急住房搭建。队里成员大多数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或刚工作的职场新人，每个人在周中时都在各自的主业上勤奋工作和认真学习，照顾着自己内心小小的梦想，但周末时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集合在一起，为有需要的居民们奔走。领队 Daniel 考虑事情周到，每次通知都要确保每个人都收到。我猜八成与他工科生式的严谨有关。地区负责人 Lucia 工作时则需要保持高度专注，但在周末志愿活动时最喜欢入户和街坊聊天。队里的翻译 Mariana 原本学着翻译专业，但因喜欢艺术，便转学到了阿根廷国立艺术大学修习艺术史，她每次都会负责带来气球和彩带装饰集合的中心广场，再把这些东西送给前来的小朋友。而队里的“糕点师”Vicky，周中忙着经济学的学业，周末还要带上烤好的点心去拜访贫民区居

民。此外，还有 Lucas 和 Luqui，他们在每年的街头义演中承担着主要表演，因幽默细胞发达，每次入户调研都能逗得家里孩子们开心。在每一次的入户调研之后，这些志愿者们往往并没有急着离开，大家整理好每一份问卷的回答之后，还会再次跟居民们道别，和家里的“留守儿童”们玩耍，或者是帮一些单亲妈妈们修理家里的电器，一些好心的邻居甚至会挽留我们吃晚饭。

我积极地参与入户调研，最初私心其实不是出于喜欢这个组织，而是想借着走访居民的机会完成关于阿根廷 2015 年总统大选的访谈，为自己的政治课题补充材料，有一种急切的功利心在其中。在我来阿根廷之前，我觉得田野是一项任务，是博士毕业的要求之一，是参加考核的必要条件。但当我真的进入这个组织和这群志愿者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开始享受田野的慢节奏，开始感受这个组织带着我了解一个远离大城市模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我从最开始听到贫民区就联想到暴力、毒品和犯罪的惶恐，也转变成愿意真心去了解大家的难处和感受这些居民带给我们的温情和友好。



图 1 志愿小队和居民们 作者拍摄

## 二、破冰见面会

由于 2015 年底要完成搭建紧急住房的计划，小分队需要每周六带领志愿者前往所负责的区域和有意愿参与的家庭举行见面会。在 10 月 17 日和 10 月 24 日的两个周六，大家都约定 8 点 15 分时在首都的 Constitución 火车站售票亭前集合，搭乘火车前往 Ezeiza 市，一般都规定乘坐 2 号车厢，以方便沿途接到其他伙伴。Ezeiza 市位于首都以南 36km 处，一般在上午 9 点 30 分时可到达。接着，志愿者们会聚集在中心广场，准备和居民面对面沟通。

第一次见面会，志愿者们会前往居民家中查看居住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查看家庭成员情况、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接着询问他们是否有特别的需求。由于这一片区是初次见面，出于不信任，他们不愿意提供给我们各自的家庭情况和个人信息。我发现这些居民们虽然愿意参加我们的项目，希望可获额外住房，但还是少不了疑惑和质问，甚至反感志愿者入户调研而选择关门不见。可是如果不入户的话，志愿者们很难对居民真实的生活情况进行评判。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社区里负责政府救助项目发放的大姐带我们完成最后的入户调研，有了熟人作保证，小心翼翼的家庭们终于愿意让我们踏进家门。

第二次见面会，是告知居民在经过综合评定之后，最终确认参与紧急住房搭建项目的家庭，并张贴施工区域地图和让居民们了解工期进程。我们让参加的每一户人家都到中心广场集合，大家围站成一个大圆圈，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做一次自我介绍。轮到我的时候，大家问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好奇看法。然后领队 Daniel 让每个人说出对各自新家的期待，并且接力写在一张挂起来的白纸上。接着我们再拿

出准备好的颜料交给每户居民家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在白纸上作画，搭配着各自对新家的愿望，画上他们心里最真的愿望。这一次的见面会，虽然是阴云密布，但是大家的内心都充满着喜悦的阳光：一方面邻居们相互之间彼此更加熟悉了，加上对我们志愿活动的信任，他们对新房子的期待更真切了；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都放下戒备了，原本偷瞟我们的那种戒备的眼神，转变成了好奇的打量。加上我的亚洲面孔，更多的小朋友们开始围着我叽叽喳喳的问问题，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一看见我就逃跑了。



图2 在中心广场的第二次见面会 作者拍摄



图3 在中心广场的愿望墙 作者拍摄

### 三、卸货之旅

在确定好需要参与此次紧急住房搭建计划的 19 个家庭后，我们继续在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7 日两个周六完成开工前期的卸货任务。大家还是先乘坐火车到达 Ezeiza 站，然后一部分换乘载有建筑材料的卡车，另一部分直接前往居民家中等卡车到来后卸货，将建房子所需的木桩、木板和屋顶材料等放置在每个家庭的空地上。相较之前两次见面会，卸货入户过程中居民们明显更热情，更愿意沟通。许多家庭的小朋友们也会主动参与到劳动中，他们叽叽喳喳，不再是对志愿者进行怀疑性的“人口普查”，而是询问房子会是怎样，多久能住上等问题。有些单亲妈妈们还会拉着我们询问下次再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帮她带一些家居装饰品，让她的孩子们可以生活在更温馨的家庭环境中。每次卸货完成后，小分队会乘着空卡车挨家挨户地问候一圈，还有居民会站在路边向卡车上的我们递消暑饮料。夕阳西下，这些石子路、臭水沟、旧房子、废弃汽车都被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仿佛贫民区的脆弱和难过都被一些新的希冀给盖过。之前入户调研时有的居民曾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戒备状态，此时差不多都已消散，大概是因为对向往的美好生活更近了一步，于是人们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愉悦了许多。



图 4 卸载木板 作者拍摄

我们跟居民们的对话也从最开始的“Que hacen en mi casa?!”（西班牙语：你们在我家干什么?!），变成了热烈的打招呼“¿Como van, mis

queridos (amigos) ?” (西班牙语：怎么样呀？我亲爱的朋友们？)

#### 四、搭建住房

搭建住房的时间是周末两天。大家各自准备睡袋和食物后，周五晚上在城北的大巴车站集中，一同前往 Ezeiza 市的中心小学。而我背着借来的睡袋、两袋火腿肠和保温杯上路。到达小学之后，所有的志愿者们都围坐在课桌前做自我介绍，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们一阵热闹。大家都被划分在不同的建房小分队，基本四人一队，多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曾有过搭建紧急住房经历的志愿者为领队。我的建房小分队由一位 TECHO 其它分支的成员、一位瑞典男生、一位意大利女生和我组成。在简单闲聊各自学业和在阿根廷的经历后，我们在教室里裹着睡袋大通铺式地睡下，以便第二天能在 5 点起来干活。



图 5 教室里席地而睡的志愿者们 作者拍摄



图6 整齐摆放的工具 作者拍摄

周六早上天还没亮，大家已经陆陆续续地爬起，空气里是属于夏日清晨的凉爽，掺杂着些许兴奋。小分队会先拿到铁锹、锯子、锤子、一大包长钉和卷尺等工具。而由于安全要求，施工建房时不可使用电器。接着根据指定地址，小分队前往被分配到的家庭。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打好地基，将15根支撑木桩完好地、牢固地打入3米\*6米的长方形。我们协助的家庭仅有一间半砖砌半铁皮的自用住房，两大人、三小孩晚上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屋里的地面只是简单糊上水泥，仍坑坑洼洼；屋外堆着没用完的红砖和干掉的水泥，细木棍连接的栅栏上晒着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衣服；因为没钱买整块防水布，屋顶上盖着各式拼接的残布。在开始准备干活时，我才发现地面坑洼较多，不好固定木桩，因此特地找邻居借了一个犁子给土地找平。接着大家两两一组测量建房区域范围和木桩间隔距离，做好标记，接着就是挖洞埋桩的漫长劳动。在把木地基埋入土里时，每个人还将一张写着祝福语的纸条也一同埋进去，算是送个祝福。这天上午我们完成了10根支撑木桩填埋地基的任务，午饭借住户的厨房煮了面条。这些面条是随工具包一起分发的，因劳作而将就这顿

简单却美味的午饭。下午时分，因为男主人弟弟加入打地基，不到5点我们就完成木桩地基的深埋、夯实和固定工作，接着便铺上第一层木地板。



图7 进入这户人家的第一眼 作者拍摄



图8 在居民家厨房做午饭 作者提供

第二天依旧5点从学校出发，因为昨天最难和最关键的地基部分都已顺利完成，接下来的装订木墙和搭盖屋顶就没那么困难，大家信心倍增。我和意大利女生负责扶住木墙面，另两位男生则抓紧用长钉子固定连接的五金零件，等到把四

面墙体都固定好之后，再把屋顶的房梁架上并固定，接着依次铺上保暖层、防水层和金属板，再用长钉固定所有的屋顶材料。这个大框架搭好之后，最后安装门窗。在整个拼装房间的过程中，家里小孩子们都十分兴奋地在木地板上跑来跑去，还比赛谁能更快地到达房间的另一边。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这些劳作最好的回报，以前觉得这话矫情，但此刻我只想发自内心的同意。



图9 完成屋顶的搭建 作者拍摄



图10 夕阳西照中的新房子 作者拍摄

## 五、结语

布大的同学曾告诉我：“在阿根廷，其实很多家庭都有一个朴素的理想生活模版，就是三个‘O’：Domingo, Asado, Amigo，西班牙语分别是星期天、烤肉和朋友，表达了阿根廷人希望能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在家里热闹地烤肉的家庭生活愿望。”鉴于我曾“单纯地”比较过阿根廷和中国的牛肉价格，加上我身边的布大学生们半工半读也能在首都养活自己，我认为这个朴素的生活愿望是毫无疑问可以实现的。可是当我们走访这些家庭时，看着那些没鞋穿的小孩、濒临报废的不安全电器、无法遮风挡雨的屋檐，我才切实地感受到阿根廷的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帮助的这户人家在这个贫民区算是典型家庭，男主人在首都靠打零工赚钱，负责家里食物开销，女主人没有工作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家里没有清洁的水源，小孩子坐在土堆上吃零食，光着脚跑来跑去，没有所谓的讲卫生、勤洗手的习惯。这户家庭对外接电线，他们每天都担心断电，也怕带不动家里本就不是大件的电器。家长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教育，至少能识字，但没有钱送小孩去幼儿园和买书。这基本也是阿根廷贫困阶层家庭的真实写照，大多数男性户主在非正式经济中工作或接受政府补助，女性户主则是照顾着家里3、4个孩子。有些家庭还是单亲妈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基本就只能依靠政府救济，或靠爷爷奶奶资助。这些家庭每天都在为能否拥有干净的自来水和充足的电力而操心，甚至为明天的一顿饭从哪儿来而担忧，他们朴素的生活愿望只是温饱。财富的鸿沟使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都有如此大差距。

第二，阿根廷贫困人口常年占总人口数量的30%，政府为了减贫推出过从教育、医疗到住房等很多的社会福利政

策，需要承认的是政府救济确实能解决很多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我们接触到的贫困家庭基本每一户都接受政府现金转移扶贫项目。虽然学界对这些研究大多数持正面评价，但我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中父母辈接受救济行为，其实会间接地影响儿童的个人发展。许多青少年在“父母接受政府资助也能生活下来”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地失去了奋斗动力，而坦然地选择接受救济。有的青少年甚至提到“我父母接受了十年救济，没上过班也生活得挺好，我为什么不能呢？”此时，这种长期效应值得再思考，减贫模式需再讨论。

第三，跟随着 TECHO 在布省里走街串巷的田野经历，让我对阿根廷贫困还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这种贫困不仅是体现在经济或教育上，还影响着一国居民的政治生活。因没钱买报纸、收音机和电视等，他们难以获取实时信息，大多数居民被动地选择“政治冷漠”。我曾在私下询问了许多贫民区居民对 2015 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意向，一部分人可能出于自我保护而不说出真实想法，但许多居民对最终六位候选人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另外，他们也很直白地告诉我：“谁把传单发到手上就选谁，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这种出于物质目的的“政治理性人”行为，完全是因为利益需要超越精神需要，政治选择都因此变得更简单了。

在 TECHO 参与活动的这些日子，让我不仅仅了解了拉美的非营利性组织高效运作的内部情形，也了解了立体多面的阿根廷。

本篇责编 高良敏 文字校审 董慧

# 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的田野笔记

刘博宇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

“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和破败郊区的月亮。”

——博尔赫斯

我未曾想到，上帝之城还慷慨地给予我更多：暴力和温暖在这里共存，传统的烤肉文化，还有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在此长期生活所碰撞出的缤纷色彩和火花。

## 一、“丛林法则”

飞机在近 30 小时的飞行后，终于落地在里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国际机场。从那天起，我和这座上帝之城的缘分就真正开始。当我从北半球的寒风中懵懂地闯进了里约盛夏的高温，依稀记得空气中弥漫着的海风、尾气以及夏天的潮湿味。坐上去市区的出租车，两旁的风景竟是如此地破旧，随即铺天盖地的贫民窟映入眼帘，那是在半山坡上层层叠叠的灰色建筑。司机告诉我，这些贫民窟非常危险，尤其是机场附近的 Maré（中文意为潮水）贫民窟，是里约最危险的贫民窟之一，发生枪战那是平常事。里约是巴西最危险的城

市，经常发生入室抢劫、抢车，甚至警匪枪战，毒贩火拼。由费尔南多·梅里尔斯（Fernando Meirelles）与卡提亚·兰德（Katia Lund）所执导的电影《上帝之城》描述的就是里约一个贫民窟中的众多犯罪故事。这个贫民窟在里约真实存在，且目前仍然十分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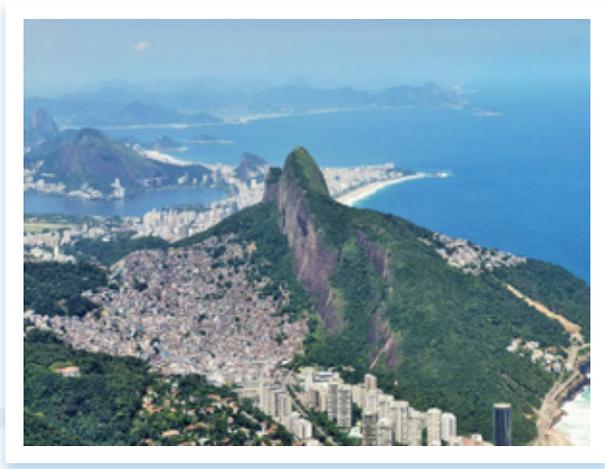


图1 巴西最大的贫民窟 Rocinha 作者拍摄

里约的危险不仅在贫民窟周边，因此时时刻刻都需要留心。我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突然跑进来一群拿着枪的“小黑哥”，他们在全力追逐着一个在前面逃跑的“小黑哥”，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一般。最前面的年轻人奋力逃跑，在超市里左窜右突，把货架上的商品撞掉一大片，到处是商品哐当哐当的掉落声。最让人害怕的是后面一群大声叫嚷的“小黑哥”，他们中好几人携带手枪。看到此景，超市的保安也懵了，呆站在那里。我当时正在结账，赶紧和其他人一样蹲下来。在我前面的小哥告诉我，这个逃跑的“小黑哥”一定是在帮派中犯了过错，导致被其他人追赶，他是肯定要被惩罚的。有趣的是，“小黑哥”竟然试图跑进超市的保安室寻求帮助，但被保安大叔们集体拒绝，毕竟保安大叔没有枪。后来小哥不得不从后门逃跑，那一大群人也就追了出去，留下一片狼

藉。“Welcome to the jungle（欢迎来到丛林）”，我前面的小哥用英语和我说。

想要在丛林中生存，必须掌握丛林法则。为了避免成为传说中的“某交换生同学，来里约三个月活生生被抢劫了六次”的复刻版，我开始向周围同学、朋友学习丛林的生存之道。

丛林法则第一条，避免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比如，夜晚市中心就十分危险，那里是吸毒者、抢劫犯和流浪汉的天下。如果晚上出现在那里，肯定是免不了被迫“捐献”一些财物。记得有一次，我去市中心一栋十分摩登的大楼办事，出来时天色已很晚。更不巧的是，我走错了一个街区，结果发现白天繁华的街道，晚上竟然躺满流浪汉。他们睡在街道旁边，似乎那里就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见我十分好奇，几个流浪汉缓缓踉跄着围了上来，如同僵尸一般，慢慢向我逼近，我似乎感觉到一丝危险及尴尬，便赶紧跑回大楼内用软件叫车。摩登大楼的门卫告诉我，这里晚上经常发生持刀抢劫，基本是这些流浪汉所为。我听了不禁脊背发凉，仿佛幸运地逃过一劫。



图2 Rocinha 贫民窟远景 作者拍摄

丛林法则第二条，“穿着需要低调，最破、最旧的衣服是你的护身符”，某老师这样告诉我。除了去学校等必要场合，我基本穿简单、朴素的短裤、短袖。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华裔老师相约打排球，到了地方，一位有着多年里约生存经验的华裔老师打量我一番，然后说：“你竟然敢穿长裤，这么正式，很容易被抢啊。”我不禁哭笑不得，那天我确实忘记了，但凸显里约默认的生存 Dressing code（着装准则）可见一斑。另外，你还需要避免一些特定的穿着图案。这是一位街边卖菜的巴西大妈的忠告，她也许曾救了我一命。记得那天我去买菜，一位巴西大妈看我面善，便让我帮她看下场子，她临时有点事，我想都没想便答应。等了约 10 分钟，巴西大妈回来，她竟然盯着我的衣服看，她用葡语问我：“你是一点也不怕死吗？”我愕然，心想怎么年纪大的同志也不讲武德，便问大妈何出此言，大妈指着我的 T 恤说：“你穿这件衣服，去贫民窟会被打死的，这是很容易的。”我低头一看，原来 T 恤上的图案是一个 Batman（蝙蝠侠），大妈解释说：“里约是犯罪天堂，我们最讨厌、最痛恨蝙蝠侠，因为蝙蝠侠打击罪犯，小伙子你赶快把这件衣服烧掉吧，再也别穿了。”原来，我竟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如此胆大包天，与整座“高谭市”的神秘力量在“作对”。于是，这件蝙蝠侠的 T 恤就被放进箱子的底层，自此不见天日。



图 3 “丛林深处” 作者拍摄

丛林法则第三条，理解是最安全的共存之道。这是我悟出的法则。贫民窟的小黑们普遍精瘦、黝黑以及喜欢上身赤裸，他们平日的的生活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酒精、足球以及维系基本生活的“拿”和“取”。他们也是弱肉强食的巴西丛林法则的运动员和裁判。这种情况和贫民窟（Favela）一词的来源有关，“Favela”原指在巴西内陆腹地的耐旱植物，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随着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的殖民进程，沿海城市最先受到欧洲白人文化的入侵。伴随着沿海与内陆的小径逐渐被踩踏清晰，生活在内陆的原住民慢慢来到城市定居，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腹地的生存模式，即丛林法则，并开始在城市的贫民窟落地。平民窟代表着地道的巴西文化，这些“小黑哥”中的一部分正是葡萄牙男子与非洲妇女联姻产生的混血儿（Mulato）。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巴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才是这座城市长久的主人和灵魂，而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这一基础上，尊重和理解，让我更加明白挣扎在生存底线人群面临的生活尴尬，从而获得外在和内心的自我安全。

## 二、人生一串

如果有什么可以代表里约，那一定是烧烤。巴西人对于烤肉的热情举世闻名。烧烤或巴西烤肉（Churrasco）是巴西美食的精髓。巴西人在很多方面非常随意，但对于烤肉却很讲究的。巴西人把牛分为不同的部位，每一处都有独特的味道，其中最受欢迎的部位是牛臂部的三角肉（Picanha）。

巴西的牛肉肉质非常好，这得益于广阔草原，其面积相当于耕地面积的三倍，亚马逊平原、巴西高原和巴拉圭盆地都是极佳的牛肉产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牛肉味道

鲜美，烧烤不用加很多调料，只需简单地加上粗盐，就可以将牛肉本身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将牛肉放置到烤架或炭火上，撒上粗盐，待温度上来后，粗盐的鲜味逐渐渗透到牛肉内部，便可获最佳口感。牛肉外表烤熟后，即可食用，鲜美的肉汁入口，那陶醉的口感让人难忘。如果你有心，也可以加一点胡椒粉，便可获更丰富口感。最诱惑的烤肉绝对不是全熟，烤至六成熟即可，这时内部的牛肉还是粉红色的，外焦里嫩的烤肉才是极品。

烤肉代表了巴西粗犷、狂野的草原文化。这种集体“撸串”的行为特别能拉近友情和亲情。巴西人喜欢在海滩烧烤，周末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沙滩上，



图4 自制巴西烤肉 作者拍摄

烤架搭起来，把烤肉穿进竹签，很快肉的焦香味、混合着孜然或粗盐的味道就飘过来。这种模式特别像国内的包饺子，是美好、和谐家庭生活的寄托和象征。除了在海滩，巴西烤肉也出现在高档烤肉自助餐厅或街头巷尾的烤肉摊位上，比起那些高级餐厅，神出鬼没的街头摊位更能引起我的观察兴趣。这些街头摊主往往是贫民窟的“小黑哥”，他们真正掌握了烤肉的核心科技。每当夜幕降临，摊主支起烤架，把串好的食材放在炭火上，随着香气扩散，这些摊位的旁边就慢慢开始聚集起人来，三五个一伙，或是刚下班的打工人，或是附近居住相熟的老头，或是穿着校服的

学生。他们从黑夜的四面八方赶来，一起参加这场饕餮盛宴，牛肉、鸡肉、香肠混合，竹签把美味串起来，在炭火上逐渐散发出诱人的焦香。食客们享受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聊着天，喝着冰啤酒，配上四五串烤肉，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一般，只剩下味蕾的幸福，简单而纯粹。如果有烦恼，也有烤肉足够解忧，一串不够，那就再来一串。

### 三、彩色熔炉

500多年前，带着不同的动机，另一片大陆的男人们、女人们纷纷起航，穿过大西洋寻求各自的梦想：追求财物、权力、宗教传播、社会地位或是个人探险。尽管这片波澜壮阔的美洲土地已被占领多年，但当地土著却用自己的传统文化，让外来者学习到更多。欧洲白人并没有如愿将这片土地重塑成自己理想的模样，与其说殖民和征服，不如把它形容成一场伟大的“相遇”。欧洲大陆人、美洲人、刚果人和约鲁巴人，以及那些讲着图皮语、欧式葡语和克丘亚语的人，他们共同重塑了这片土地，用不同的肤色、迥异的价值观在拉丁美洲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熔炉。

观察如今的里约，你仍能赞叹这场伟大相遇的遗产。自1502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称里约为“Rio de



图5 秩序与混乱 作者拍摄于里约的海滩大道

Janeiro” (一月的河流) 开始, 这场相遇让不同肤色的人们生活在这里。熔炉首先体现在肤色和种族上, 如今的里约可以轻易发现各种肤色的人, 由最深肤色 (接近黑色) 的贫民窟“小黑哥”, 到中间肤色的混血儿 (Mestiço), 还有明显的欧洲后裔。这种多元的肤色, 背后是不同种族代代互相通婚的结果。后殖民国家往往有身份认同的疑虑, 在众多角色中, 究竟哪一个形象可以代表巴西? 答案不会是欧洲白人, 也不可能是来自内陆的土著印第安人。巴西土著印第安人和欧洲白人通婚的混血儿, 或葡萄牙白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儿 (mulato), 两种典型形象逐渐浮现。这类混血儿既拥有外来血统, 同时保留了自身的内在, 不认同自己的欧洲或非洲血统, 或许是巴西民族形象的最好表达。

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 熔炉为巴西提供了丰富色彩。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在里约耶稣的怀抱下共同生活, 尤其是少数派可以在这里找到心安的栖息之地。LGBT 是女同性恋者 (Lesbian)、男同性恋者 (Gay)、双性恋者 (Bisexual) 与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属于性少数人群。针对这部分人群, 巴西社会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支持。我在里约最好的朋友 Q 就是一位同性恋, 由于她生长于中国华人家庭, 迫于压力她一直没能向家人坦白自己的性取向。但在巴西, 她过得很开心,



图6 夕阳照耀上帝之城 作者拍摄

有许多同性恋的群体愿意包容、接纳她。除了结交到许多朋友外，她还找到过属于自己的伴侣。在里约每年一度的狂欢节上，经常能看见同性恋主题的花车，宣扬 LGBT 人群的价值观念和合法权益。另外，在巴西主要城市，每年都会举行 LGBT 人群的游行、派对等大型活动。巴西社会对于少数性群体的包容吸引了很多社会精英前来生活，由于 LGBT 人群在很多国家仍是边缘人群，如德国、中东国家等，所以他们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到巴西生活。

#### 四、结语

来到上帝之城，我对巴西的理解深入了许多。我们的一生也许只有一道选择题：选择与怎样的人、物和空间形成羁绊。走进另一片田野，我们都是大地上的异乡者。自我们出生起，就在不断探索生活的边际。就像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中的年轻诗人一样，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向往和渴求。这份向往就像茫茫黑夜海上的星光，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个港湾，探索全新的地平线，并让我们与素昧平生的人、物和空间产生联系和牵挂。1941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撰写的《巴西：未来之国》出版，这本书曾是我窥探巴西的启蒙读物。直到我在巴西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明白茨威格在这里写的未来并不是指经济、科技的发展，或艺术的进步，这里的未来指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芒：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尊重与包容。或许这些将促使巴西成为“TA们”未来世界的“灯塔”，在暗夜里闪耀。

本篇责编 高良敏 文字校审 董慧

# 喀麦隆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田野 调查记

唐溪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喀麦隆

2018年4月至5月期间，我曾对喀麦隆雅温得南部工业区（la zone industrielle de Yaoundé-Sud）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在这次考察中，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模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觉有很多细节值得回味。

## 一、考察前的功课

此次考察起源于我在雅温得第一大学访学期间做的一个关于非洲经济特区的课题，在得知雅温得郊区就有这样一个类似经济特区的工业园存在时，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个近在眼前的研究案例进行深入调查。

在此之前，我也曾参观和考察过几个国内外的经济特区，又在导师的指导下查阅过不少文献，对经济特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进行过梳理，自认为对经济特区有一定的了解。我通过网上查阅资料得知，雅温得南部工业区建立于1983年，区内主要产业有木材加工、生物制药、钣金加工、农产品加工、石油化工和服务业（交通-商业），总占地面积316公顷。在了解了这些信息后，我的脑海中已浮现出了

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规模现代化工业园区的轮廓：成排高耸的石油炼化设备和存储罐，规模庞大的原木堆栈和木材加工厂，专门加工棕榈、香蕉、可可等喀麦隆特产的农产品厂区，洁净而富有科技气息的生物制药公司……这些画面让我对这个位于首都郊区的工业园区充满期待。

考虑到一些成熟的工业园区往往管理较为严格，且园区中有敏感度较高的石油化工产业，我估计自己难以轻易进入进行调研。为此，我请我的非洲导师以雅温得第一大学的名义开了一封研究介绍信，以应对可能的盘查。同时，我准备了10余份访谈申请信，以备进入园区后向各企业的外联部门递交。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份访谈提纲，以便受访者能提前知晓访谈方向，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雅温得小雨季短暂间歇的一个晴朗上午，我开始了探寻南部工业园之旅。

## 二、工业区到底在哪？

出发之前，我曾向当地人打听过工业区的地址。但无论是我的非洲导师，还是路边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这个“雅温得南部工业区”在哪儿。甚至在听到这个名字时，他们都露出了困惑和陌生的表情。网上查到的园区电话无法打通，我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搜寻半天，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叫“恩萨姆-恩万”（Nsam-Mvan）的地名，和工业区似乎相关。地图导航一搜，这一名称指向南部郊区一片城乡结合部。我估计工业区就在此附近，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车过去。

其实，我很不愿自己开车前往。因为驾车前往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意味着许多潜在的麻烦，特别是喀麦隆交通警察

的盘查和刁难。在路况不熟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被警察找到借口，一通罚款和索贿，真是烦不胜烦。然而，由于我并不清楚具体目的地在哪儿，无法打车前往，只好硬着头皮开过去。

开着我的 2001 款卡罗拉（从欧洲进口来的报废车），经过大概一个多小时路程后，导航提示我已经到了“恩萨姆-恩万”。但在我眼前的依然是一条破碎的半柏油马路，以及路边稀稀疏疏的铁皮或木质民房，想象中的现代化工业园不见踪影。在一个狭窄的丁字路口，一名警察正在指挥着拥堵的交通，我缓缓地随着车流排队前行，当我开到警察近前时，却迟迟没看到这名警察向右通行的手势。10 秒钟后，警察向我走来，示意我靠边停车。“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不禁心下叹了口气。

“为什么不及时通过，故意堵塞交通？”警察故作生气地质问我。

“在有警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以警察的指示为最高级别通行信号。”去年刚以高分通过喀麦隆交规考试的我，自然是回答得干脆利落，处变不惊。

“驾驶证、身份证！”警察再次命令我。

我利索地拿出证件，并把保险文件、黄背心、灭火器、年检标志、三角指示牌乃至备胎一一向其展示，以表明我是有备而来。

警察见无破绽可寻，便又将我带到路边一处树荫之下，一名长官模样的人和其它几名警察正在那里休息。

那长官一通官腔，话音最终落在了“给钱”这件事上。这场面我早已见得多了，也不含糊，一通慷慨陈词，主旨三

点：一，穷学生，没钱；二，我受国家委派，到喀麦隆来开展研究，不应受此刁难；三，我要给中国使馆及我的喀方导师打电话，请求保护和帮助。经过几番舌辩，那警官见我是铁了心不给，也觉得有点耗时过久，便找了个台阶下，说：“这次就先放过你，主要是看在中国是喀麦隆的友好国家，如果是白人，我肯定不放！”我也无意去辩他说的是真是假，就应承道：“多谢，中喀的确是朋友。”说完转身就要走，又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便问：“请问您知道南部工业区在哪吗？”那警官说：“这里就是。”

### 三、几大支柱产业

警察说我已经在了工业区内了，这令我一阵纳闷，为什么只见民房不见工厂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园在城中，城在园中，产城一体”？没想到喀麦隆已经采用了如此先进的园区 2.0 理念！这时，一辆拉着巨型原木的卡车路过。我心想，这不就是往木材加工厂送原料的车么？于是跟随卡车前行。在开过一段约 2 公里的红土路后，我果然在一个半山腰处看到了一片由木栏杆围起来的木材堆栈。

在向门卫通报了来意后，一位工人引我进入了厂区。此时正是上午 11 点钟左右，烈日当空，厂区内大约二十多名工人正三三两两地坐在阴凉处休息。堆场中心的位置有一个 100 平米见方的凉棚，棚下是几台木材切割设备，但不知为何没有开工。木材厂老板是一位热情的喀麦隆大叔，他表示很愿意接受我的访谈，我随即向他提出了一系列我感兴趣的问题。

据老板介绍，工厂的主要业务，是将收购来的非洲紫檀木（Padouk）切割成方木，然后出口欧洲，主要用于装修。

原木收购价约为 10 万中非法郎（约人民币 1150 元）一立方米，出口价大概 40 万非郎（约人民币 4600 元）一立方米。每周大约能加工 40-50 立方米方木。工厂目前的订单情况尚好，但因为杜阿拉港口堵塞，产品难以运出，耽误了许多时间。工厂的设备主要是来自欧洲的二手机器，大概花费了 2500 万非郎（约人民币 28.75 万元）。最近他又从越南进口了一台新机器，大概花了 900 万非郎。老板说，他很想再生产一些附加值更高的板材，但苦于没有技术和设备。他听说中国的加工厂能用边角料加工木板，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没有找到门路，以至于他最近自己还进口了一批中国复合板，用于装修。老板还提到，最近附近开了一家越南木材厂，一家黎巴嫩木材厂，对方的资本比他雄厚，技术也更先进，这使得他的工厂面临比较严峻的竞争，特别是在原料采购方面，对方的大笔进货已经给他造成了压力。

提起工业区的运营与管理，这位老板抱怨连连。他与工业园管理局签订了 25 年租地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约。工厂占地 1.5 公顷，但几乎是原始地表，初到时杂草树木丛生，需要自己清表和平整。厂区东南角至今仍然有一条大深沟未填平，这使得实际可利用面积只有原计划的 2/3。工业区管理局曾承诺提供道路、排水、自来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但实际上进展非常缓慢，目前工厂使用的这些设施均为自己建设或连接，包括厂区外几百米进场的道路。管理局声称，凭这些建设费用的发票可抵扣地租，但实际报销流程非常繁琐而缓慢。进入园区的企业，也不享受任何税收方面的优惠。老板之所以选中在此设厂，是因为看中了这块地区靠近国道，交通较为方便，且租金较私人土地便宜，合同签订后也有保障，不会轻易涨价或毁约。此外，最令老板看重的优惠政策是，政府承诺连续租 99 年后，这块土地就能变成私人所有，

对于想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一笔宝贵遗产的人来说，这个条件非常具有吸引力。



图1 与文中喀麦隆木材加工厂老板的合影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结束。在告别了木材厂的大叔后，我走出厂门，在山坡上向四周眺望。远远看见在大片杂草树木和裸露的红土中，分散点缀着大约十余家工厂模样的建筑。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对这些工厂一一进行了拜访。



图2 从山坡上俯瞰南部工业园，远处是与民房混杂在一起的厂房，近处是一块刚刚平整好准备开工的场地。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越南人与黎巴嫩人开设的木材厂的确规模大得多，管理似乎也更加严格。越南工厂既能生产方材又能生产板材，产出的半成品运往越南，用于制造家具，再出口到中国 and 北美。值得一提的是，厂方觉得喀麦隆工人操作过于粗糙，浪费了不少木材，因此将所有的工人均换为越南人。这可能也是越南的人力成本较低、技术较熟练所致。木材产业确实称得上是工业区的支柱产业，规模和效益都较为可观。而相比之下，其它产业则显得有些冷清。

我一直在区内寻找网站上所说的石油产业，当我找到一处竖立着几个十几米高的金属大罐的工厂时，原以为这就是个规模较小的石油加工企业。一问才知，这原来是个葡萄酒加工厂。喀麦隆不产优质葡萄，超市里卖的葡萄贵得令人咋舌，我还见过最高卖到人民币 200 多元一公斤的红提子，一般是绝对消费不起的。而这家工厂的葡萄原料全部进口自法国、意大利等地，成本可想而知。此外，喀麦隆本地市场也早已有很多来自法国的知名葡萄酒品牌。在这么多不利环境的影响下，这家喀麦隆本地品牌的竞争力如何，该厂的负责人没有回答，但我却暗暗为之担心。

在后来的探访中，我又找到了该工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几番申请之下，一位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据他反映，工业园之所以基础设施不足，主要是因为管理局的经费非常有限，而且权限不足。当前管理局的定位，更像是一个土地销售部门，并承担着定期收取地租的职能。而要把如此大的一个工业园建设为现代化园区，仅依靠这样一个无权无钱的小部门是不行的。工业区声称已经有 100 多家企业注册，实际上开厂的却不多，而工业区现有的土地已经全部租出去了，可见有许多租户并真心想办厂，而只是想囤地。此外，工业

区与区内的居民存在着大量的土地纠纷，园区声称这些住户都是在侵占土地，但居民们则声称自己世代居住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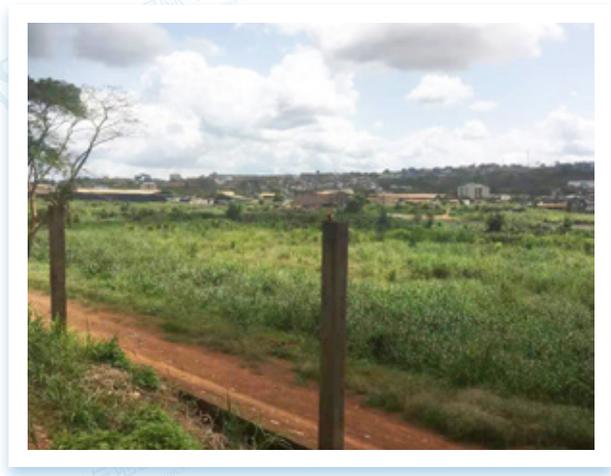


图3 园区内一块尚未开发的空置土地，打好的界桩宣示着这块土地已经租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当我在园区继续探访时，偶然见到一家工厂的门口贴着对联，进去一问，果然是一家中国企业。这家工厂从事制氧产业，员工队伍由一名中国老技工和十几名当地员工构成，老板是一位曾在驻喀中资企业工作，后来又自主创业的小伙子。工厂当时正处于半开工状态，似乎效益一般。当我问起制出的氧气主要销往哪里时，技工师傅告诉我主要是销往雅温得的几个修车厂和医院。当我听到医院一词时，突然联想到，这家制氧厂莫非就是园区网站上所宣传的生物制药企业？我顿悟了，原来在国道旁看到的那个饮料矿泉水仓库，就是园区的物流仓储产业，那家雇佣了七八个人的修车厂，就是钣金加工产业？至于服务业，则必是路边的这些小商店和小饭馆了。由此看来，网站上宣传的这些支柱产业，除了木材加工还能算名副其实外，其它都只能说是“艺术加工”罢了。



图4 在一家半开工的印刷厂内，喀麦隆技师正在修理出故障的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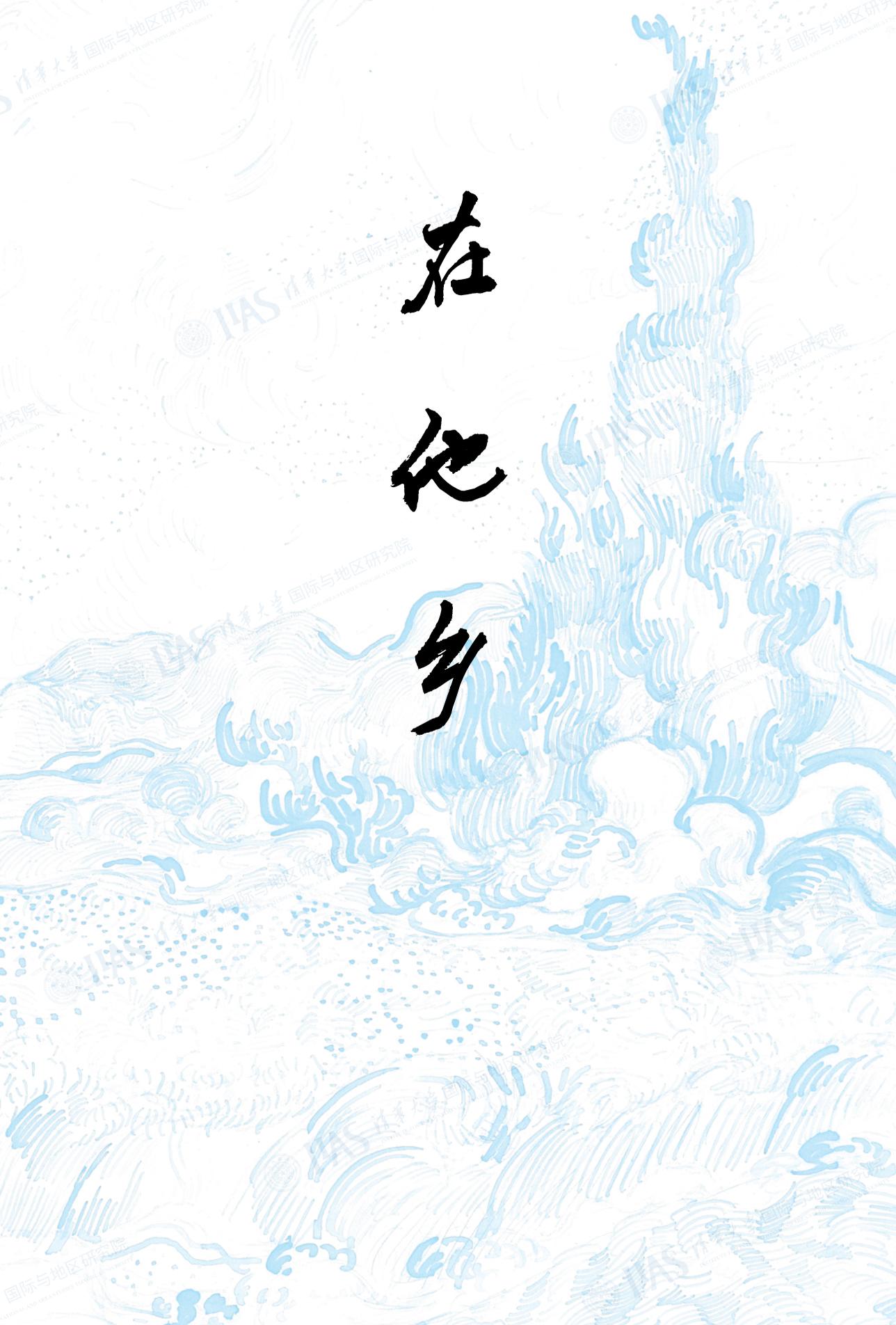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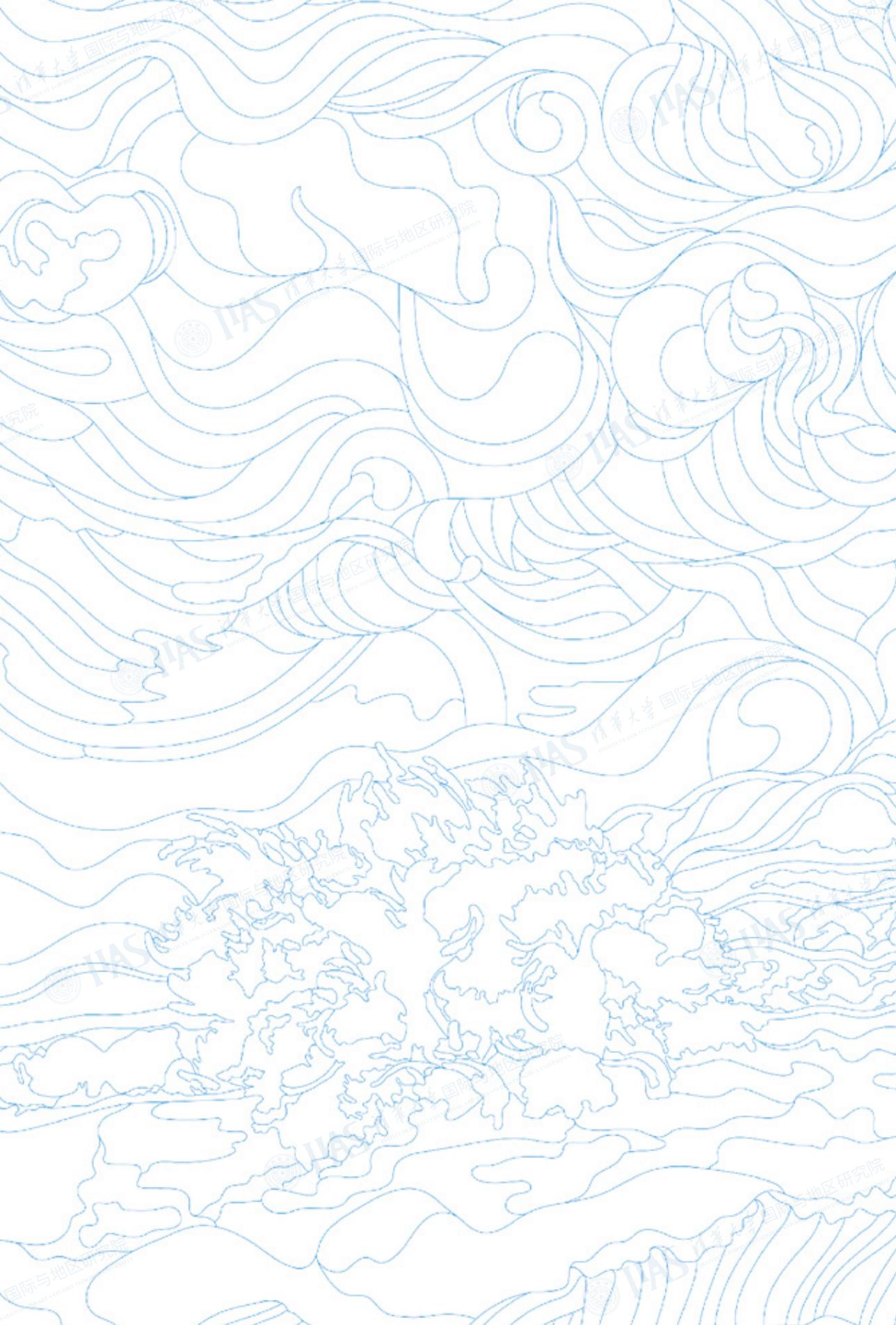
#### 四、结语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对雅温得南部工业区的调查，让我深刻明白了资料阅读和实地调查之间的差距。如果仅看一些数据指标和宣传，或许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发展尚可的工业园区，但田野调查却让我的这些想象变得滑稽可笑。雅温得南部工业区也许算不得一个典型的现代工业园，但它却又是反映喀麦隆发展现状的一个典型，一个在困境中缓慢前行，失望与希望共存的矛盾结合体。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

# 在他乡





# 从“世界尽头”到篮球往事—— 在法国、美国、马达加斯加打球 的那些年

熊星翰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马达加斯加

## 一、引子

二十年前的一天，中午放学，甩掉书包端起碗，戳开电视机的同时已经准备摁下熟稔于心的频道号码。

来了！伴随欢呼与掌声，视角从体育馆中央吊灯下移，黄色 SLAMDUNK 映入眼帘，架子鼓和“噔——等噔，噔——等噔”前奏响起，我才安心开始吃第一口午饭。

五年前，我和如今已是近畿大学经济学部准教授的星河先生自驾从旧金山去洛杉矶，刚上一号公路，太平洋的雾气扑面而来，我给他在汽车音响里放了那首歌，他用兴奋时才会发出的日语感叹词“唔喔——”，来表达对一部分青春回忆被击中的惊奇。然后，他努力尝试要用英文把歌词翻译给我听，最后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This song means...I like...very much, very very much!”

如今，镰仓江之电已是网红圣地，旅日婚拍服务也出了灌篮高手主题款，今天偶然看到变成胖大叔的上杉升老师还在唱《直到世界尽头》时，回忆起自己在世界上几个地方关于篮球的一些往事。

## 二、里昂

里昂中法大学是个历史意义厚重的所在，它背后的一块篮球场似乎也沾染上一种岁月的气息。当年从公寓去这里打球要穿过一个隧道，因为球场被落叶乔木厚实地包裹着，春碧秋黄，所以每次钻出隧道来到球场的时候也仿佛在问候每一个季节。



图1 中法大学后边的篮球场 作者拍摄（2013年2月8日）

这里有来自美属加勒比岛国的高手，一米八不到的控球大师，双腿内置节拍器，练球的时候还时不时扣个篮，一对一我从来没赢过他。有来自本地的背心猛男，寒冬腊月露着肩膀红着脖子，斗牛交换球权都能跟你置气。有来自马里的光速后卫，满场飞奔恨不得自己的袜子都追不上自己。有来自马耳他的华裔射手，他告诉我，在马耳他海边成天没事干只有打球，所以练了一身好本领。当然，还有我和我哥们儿。篮球一开打，我俩就自然而然地学着用法语跟别人在球场上大声交流——“Bien joué（好球）！”“A moi（给我）！”“Faute（犯规）！”……“你大爷的！”“傻X！”

后边这两句是用中文喊的，不过前提是马耳他华裔不在对方战队的时候。

多年以后当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介绍他在赞比亚中资企业研究的雇主——雇员语言关系，他说发现当地雇员会利用本地俗语当面偷偷骂中国老板。此时此刻，中法大学篮球场的激战时刻突然闪现我的脑海之中。

除了中法大学球场，我每周还会去里昂二大的新校区上一次篮球课。那可是每周最期待的活动，虽然要先坐公交下山，然后再地铁转轻轨，但每当看到篮球馆时，鼻尖还是会冒着汗发颤——跟关了一天以后见到主人拿项圈和牵引绳的宠物狗有点像。

等等……今天体育馆里人有点多啊，乌压压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大圈，也没穿运动服。圈子正中一个人在慷慨演讲，讲得好时下边的听众会发出喝彩，同时举起双手十指朝天扭动，像是拧灯泡时触电了。想起最近闹学潮，合着这是学生们在体育馆搞集会。这个时候篮球老师也从更衣室里出来，戴着他的金项链远远站在墙角望着人群，一副见多不怪的淡定。

一下午的篮球课就这样取消了。我看看身边的 Ryo，经常和我同路上篮球课的日本朋友。他还是挂着他招牌的日式微笑，有点像梦枕貊笔下的安倍晴明，也有点像东京道森便利店清晨快下班前见到客人的店员。但无论如何，你知道他肯定会选择默默离开。这个时候很是怀念赤木刚宪，如果那个视篮球馆为圣地的热血男人在这里的话，会把这帮家伙轰出去吗？



图2 里昂大学篮球馆里的学生政治集会 作者拍摄（2007年11月12日）

在断断续续的学潮里，一年的篮球课只上了半年。我参加的基础班，白人学生居多的学院式团队篮球，稍微粘球时间长一点都会被老师呵斥，只好努力防守来提升存在感。后来马里光速后卫告诉我他在高级班，那边的风格比较奔放，说得我有点心动。但有一次，一个高级班的大前锋来基础班技术扶贫，北非血统的空间型内线，动作兼具速率与柔和，在我们头上切瓜砍菜进球的同时还一副“来陪你们玩玩”的表情。

从此，我决定还是留在基础班吧。

回头想想，不知不觉见证了法国篮球的时代转型。2000年奥运会时，他们还靠里加多的神奇三分逆转中国队，整支队伍也是白人为主体，而在2013年欧锦赛夺冠时已经是托尼·帕克带着黑人兄弟们来打江山了。在里昂我的最后一节篮球课结束十年后，2018年世界杯男足决赛日，马达加斯加小城街头的人们狂欢至深夜，我的当地老师意味深长地说：“又到了非洲和法国最团结的一天。”

### 三、湾区

不过在篮球世界里，法国应该没有机会感受自己旧日的帝国荣光了。即便伟大如托尼·帕克，在广大球迷眼中最重要的个人荣誉也只是2007年的NBA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美国篮球是资本博弈、体育竞技、文化推广、教育体系加上人类智慧和精神糅合而成的利维坦，其中顶层殿堂是NBA，三十支球队，奢侈税、选秀、薪资条例和交易规则构筑起一套富有生命力的制度，加上伤病和欲望的微妙扰动，实现了强者无法恒强的权力更迭。球星们每一条跟腱的断裂、每一句负气的言语都可能带来王朝的崩塌。NBA的下边是NCAA，全球最顶级的大学篮球联赛，高中在各州展露锋芒的少年们相会于此，怀揣着扬名立万或是告别贫乏生活的愿望，从九月厮杀到来年的疯狂三月，所有NBA的球探们也在其间四处出没，为球队未来的选秀挖掘一切消息。

2016年2月6日，哈斯球馆(Haas Pavilion)的湾区德比，加州伯克利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斯坦福。这是哈斯球馆全年最重要的比赛，虽然下午五点开场，但两三点钟就有伯克利球迷穿着主队的金黄和青色球衣在体育馆周围造势。这一场比赛的球票是有特别说明的，请求每一个入场的主队球迷按照自己座位区域的颜色穿着对应色彩的衣服，另外还附上一张彩色贴纸，让你蒙在手机闪光灯上，在球员入场仪式时会有用处。我赶紧到学校周边特产店抓了件主队的黄T恤便早早进场，甚至来不及推敲衣服的价格。鼓号队和啦啦队今天格外卖力，王牌选手杰伦·布朗热身时扣篮也少了两个，一副大战在即、保留实力的样子。在金色和青色的浪潮中，有几位斯坦福的拥趸点缀其间，绛红色外套上的大树队标在主场气氛里感觉都缩水了两寸。我前边一位伯克利老太太对着身

旁勇气可嘉的斯坦福球迷一阵嘲讽，像是当妈的在调侃出糗的儿子。



图3 伯克利球迷赛前嘲讽斯坦福球迷 作者拍摄（2016年2月6日）

终于，灯光暗下来，球队劲爆的宣传片在场中心开播，全场手机点亮，一片片金青色跃动的光点如梦如幻。伯克利不负众望拿下比赛，离当季主场全胜又近一步，球迷欢呼着不肯散去。虽然次日在三藩市还有第50届号称“美国春晚”的超级碗比赛，但这场胜利在伯克利铁杆球迷心中的意义应该也非同一般。自杰森·基德离去后，哈斯球馆已沉寂多年，这个赛季的复兴如枯木回春般撩动着很多老球迷的旧日情怀。最终，那年伯克利如愿主场全胜，之后杰伦·布朗在NBA选秀中成为探花，去往遥远的波士顿，在北岸花园成功打出身价后签下了4年1.07亿美元的合同。不过在这之前，金州勇士在一个史诗般73胜赛季的结尾，被克利夫兰逆转丢掉了奥布莱恩杯。那天，旧金山夕阳下辉煌的期待和入夜后沉默的幻灭让人难忘。

#### 四、塔那那利佛

塔那那利佛有一群爱打球的中国朋友，大多数是来马达加斯加做贸易的商人。大家每周日必约球赛，要么早上六点，要么下午两点，有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也有四十多的老家伙。这里的球风粗犷直接，但因为很多福建人的缘故，又带着南派篮球强调跑动和速度的影子。球赛散场时往往已经天黑，身边没家室的几个会一起找地方吃饭，饭桌上还要把下午赛场上精彩的表现再狠狠地回味几遍。这些打球的朋友一起时很少斗酒，大家能者多劳开心就好，完全改变了我对当地中国式饭局竖着进横着出的印象。

经常也会有马达加斯加朋友组队和我们对抗，他们很多穿着泛黄的球鞋和褪色的球衣，但是其中不乏高手。特别六点钟的早场，草上的露珠都还刚刚凝结的时候大家已经呵着手来到场地。人很多，经常要分成四个队以上打21分淘汰制，对抗强度非常高，因为输家就只有在场边站着看的份，天冷的时候一会儿就冻僵了。不过，虽然比赛激烈却很少有严重的冲突，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文化里那种关键时刻忍耐平和的气质渗透其间。有一次我和当地人在比赛时冲突顶牛，下场与对方和好，一个当时在场的好友 Mika 主动来找我聊这件事，他跟我说：“打篮球嘛，主要还是为了健康和开心，大家都穷、平时都不容易不是吗？熊啊，我们马达加斯加人里大多数可没有钱买保险，不管因为打球还是打架，受伤了都没人赔的，搞不好还要耽误工作扣钱。所以，我们还是慢一点吧（Mora mora）。”（注：Mora mora，马达加斯加最常听见的日常用语之一，意为“别着急，慢慢来！”）

曾经听到很多人批评马达加斯加人动作慢、效率低，但 Mika 说完话的一瞬间，我又对马达加斯加人的“慢”多了

一点体会：吾之沟渠，彼之深渊。对于一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都一样，而顾虑多了，自然也就慢了。



图4 夺冠哨响之前 作者拍摄（2018年9月23日）

在塔那那利佛，每年篮球活动的高潮是中资商人自己筹办的锦标赛。我参加的那次是四队单循环赛制，前边两场由于在坦桑尼亚开会错过了，最后一场的日期正好是我返回马达加斯加的当天，队友们为我特意更改了比赛时间，从下午第一场调到第二场。这之前的两场比赛，我们队和马达加斯加当地人组成的队伍都拿下了两连胜，最后一场两队间的直接对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冠军争夺战。于是，在坦桑尼亚会议结束后，我连夜北上赶飞至亚迪斯贝巴，在那里转机后又南下飞回塔那那利佛，整个旅程前后近二十个小时。出机场后我直奔篮球场地，居然没有迟到。慌忙扔下行李箱，换上了队友给我准备好的队服，一看上边居然还有赞助商的标志。这是大学本科篮球赛北门外美发店赞助我们系队以后，我第一次穿有赞助商的球衣。简单热身后决战开始，我们队气势如虹，三节过后就让比赛进入垃圾时间，顺利拿下冠军。晚上庆功宴和颁奖仪式上，队里的中锋兼篮球群群主荣膺最

从“世界尽头”到篮球往事——在法国、美国、马达加斯加打球的那些年

有价值球员 (MVP)，他举着奖杯，开心得像个二百斤重的孩子。

## 五、未终结

跨文化语言实践、政治运动、后殖民主义、资本游戏、校园体育以及马达加斯加质朴的生存哲学……除了以上的故事，很难想象它们会被什么串联在一起；就像我们的手指和篮球刷网而过的美妙声音，除了篮球你想象不到它们会如何发生联系一样。

星河先生，你说的没错，关于篮球，I like...very much, very very much !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许帅

# 一个中国女孩在坦桑尼亚的烧烤创业记（下）

肖齐家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

2019年11月，坦桑尼亚的华人圈子里传开了一则喜讯：曾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做过志愿者的一位中国小伙和当地一名女生登记结婚了！为了感谢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关注，两位新人特意安排了一场婚礼答谢会，地点就设在当地有名的华人大院——中华会馆。作为新郎在孔院时的好友与同事，Breeze Bar的老板Haldi主动接下了筹备答谢会的任务。在活动当天，她还特意给自己这家主打坦桑本地风味的小餐馆补办了开业仪式。

两件喜事凑在一起，给Breeze Bar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Haldi一边招呼着厨师和服务员们准备酒菜，一边向来宾推介餐馆新开发的当地美食，忙得不亦乐乎。

在坦桑尼亚的营商环境连年恶化、许多中餐馆经营惨淡的背景下，为何一家主打当地特色的烧烤铺能够逆流而上、异军突起？出于好奇，我专门拜访了Haldi，请她讲讲这家本地化餐厅的成功故事。



图1 Haldi 和她的朋友们 Haldi 提供

其实，Haldi 也并非一帆风顺，之前也有过承包中餐厅后经营失败的经历。直到一位正在寻找餐饮行业承包机会的西班牙商人联系到她时，她才意识到，原来机会就在身边。

“当时那位西班牙人说，这个中华会馆的位置其实非常好，因为周围有很多银行、国际组织和写字楼，在里面工作的都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而且不管经济形势怎么变化，他们肯定都会留在坦桑。所以他就想和当地朋友一起做点餐饮，以当地菜为主。”

“那他后来是把餐厅租下来了吗？”

“没有。他看中的是会馆院子角落的地方，就在中餐馆的对面。他说想租下来搭个简单的厨房，做做自助餐和外卖。”

就是这句话，让 Haldi 顿时醒悟过来。

在 Haldi 还在承包中餐馆的时候，由于最初的三名中国厨师都已回国发展，Haldi 就从自己的老家云南请来一位厨师掌勺，主打云南特色菜。随后她发现，其中的一道云南手抓饭，不仅受到了中国食客的好评，当地人也很喜欢吃。

“有时候，我感觉坦桑人和我们吃的还挺像的。比如说当地人爱吃的 Pilau，其实就是一种加了羊肉和香料的抓饭。为了吸引附近工作的人来用餐，我们也做过中餐自助，慢慢地就有了几个老顾客。他们都是在附近工作的当地人。”



图2 坦桑尼亚美食，三种主食左起分别为 Wali（米饭）、Pilau（抓饭）和 Ugali（玉米面糊） Haldi 提供

但在当时，她采取的经营策略还是把中国菜推销给当地人，所以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些积极的信号。而遇到西班牙商人之后，她才发现，既然吃中餐的人不多，当地餐饮又这么有市场，不如把思维逆转过来，主打当地菜。要是有中国人来吃，就把这些菜品介绍给他们尝尝。

于是 Haldi 脑子一转，“与其让他赚钱，不如我自己做得了！所以我就没租给他。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悔，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早点开始，仔细地去了解当地顾客的需求，不然顾客肯定会更多。”

在处理了中餐馆的转让事宜后，Haldi 腾出手来，开始想办法开发那块地方。“这时候，就有当地朋友建议我说，可以建一个坦桑式的酒吧。我觉得，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如果你走在街上，远远看到哪家店有茅草铺的尖房顶，那里大概就是坦桑的酒吧了。

白天的酒吧更像是餐馆。客人大多是来吃烤肉和主食的，喝酒的人都很少。可一到晚上，它们摇身一变成了坦桑人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场所——酒吧。周末晚上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店都会爆满。

走进去一看，你会发现，大屏幕的电视是当地几乎所有酒吧的标配。它的前面往往会放着好几排椅子，以便容纳更多前来喝酒看球的客人；而没有足球比赛的时候，店里的大分贝音箱就开始工作了。人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摆，尽情地释放工作中的压力。

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Haldi 拿出了做研究的架势，在朋友的带领下，仔细考察了达市大大小小的当地酒吧。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慢慢摸清了当地顾客的需求。

“当地的各种酒吧，比如 Samaki Samaki、Governers、Elements 和 Stereo Bar，还有一些网红餐厅，我都去过。里面的炸鸡、烤肉、烤香蕉什么的，我也吃过一遍。我发现，在酒吧里，当地人最喜欢的还是啤酒和烤肉。有的酒吧可能卫生条件差一些，桌子和椅子也很破，但当地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个。只要肉烤得好吃，啤酒足够便宜，还有足球比赛看，就能吸引很多人来。甚至有些西装革履、开着豪车的人，也经常到这样的酒吧吃饭。”

其实，在达市也有几家中国人开的烧烤摊，但它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当地客源。经过实地调研，Haldi 认为，这些烧烤摊吸引不来当地顾客，主要是两个原因所造成。“一个是烤串的做法不太一样。中式烤串上的肉一般都比较小，对肉

的部位要求不是特别高，就算硬一点也没关系。但当地的烤串上用的一般都是大块的牛肉，所以只会用软一点的 Fillet（菲力）。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做的烧烤太贵了。”



图3 坦桑尼亚特色的菲力牛肉烤串 Haldi 提供

我接着问道：“都是烤串，肉也是在当地买的，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贵就贵在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啊！在这儿雇中国厨师，除了办手续要花三千美元，一个月还要付五百万先令的工资，合人民币差不多一万五千块。这可是五百万啊——所有的当地员工加起来工资也没那么高。如果烧烤卖便宜了，你根本收不回成本。”

要是做中式烧烤，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当地人来尝鲜。但因为这种烧烤本身就不太合当地人口味，价格又那么高，很快就会把当地客人吓跑。所以，Haldi 这次干脆就没找中国厨师，而是从当地口碑最好的酒吧 Triple Seven 那边挖了一位烤肉师傅过来。再加上招聘来的两名负责烹饪主食的当地厨师，酒吧餐饮的口味一下子正宗了起来。

现在，酒吧里共有三名厨师和八名服务员，他们每月工资加起来也只需要二百万先令——这个数字甚至不到一名中国厨师月工资的一半。“再加上不用像中餐馆那样架 WIFI、开空调，成本一下子省了不少。”

请到了专业的当地师傅，Haldi 的心里总算是有了底。但以往的经验告诉她，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靠谱的经理人。毕竟，按照当地的法律程序，她暂时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做生意。这时，她想到了当初建议她做酒吧生意的朋友 Molu。

Molu 是餐馆所在地的片警，长了一张跟年龄和职业都不相符的娃娃脸。早前，Haldi 的中餐馆里遭了贼，案子就是 Molu 过来处理的。一来二去，他就成了 Haldi 最信任的当地朋友。

“之所以找他当经理，一方面是看中他公职人员的身份。他在酒吧这儿只是兼职，主要的工作还是警察，就算真被他骗了，我还是可以找到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很懂得跟当地人打交道。如果有政府部门的人过来检查，作为名义上的老板，他可以比较容易地应对。他们一看是当地人开的酒吧，就不会太为难。”

事实证明，自从有了 Molu 坐镇，酒吧的筹备工作就变得容易多了。

当初，为了突出酒吧的特色，Haldi 在装潢上花了许多心思。当其他许多酒吧都还在用着破旧的塑料桌椅时，Haldi 不顾妹妹的反对，坚持定做了一套全新的实木桌椅。



图4 酒吧的装潢和实木桌椅 Haldi 提供

“我觉得，既然院子里环境这么好，如果我们的酒吧还用普通的塑料凳子，也就没有什么格调了。而且一般只有比较高级的酒吧才会用实木做的桌椅。虽说这种桌椅要贵得多，做起来也要更费劲一些，但还是值得的。”她想了想，又补充说，“要不是 Molu，我差点还让做家具的工人给骗了。”

这套桌椅里面凝结着 Haldi 不少的心血。除了在联系工人方面有 Molu 的帮助外，挑选木材和确定样式等前期工作，都是她亲自完成的。

“我们这儿有八张桌子和三十六把椅子。材料和人工加起来一共二百万先令，差不多六千块人民币。跟那个工人谈好价格之后，我就给了他三十六万先令，让他先买材料。那天晚上他答应得好好的，说第二天就买好，结果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过去找他时，才发现那人不见了。”

“那他干嘛去了呢？”

“他可能拿了钱去消费了吧。找不到工人，我就去找了 Molu。结果他还挺讲义气，说工人是通过他联系的，我也是

因为信任他，才会把钱给了工人，所以他肯定会找到这个人。但在这之前，他自己出钱帮我找了另一个工人来做家具。整个过程就我跟 Molu 知道，我都没有告诉妹妹。她如果知道了，肯定更不会同意我继续做家具了。”

到了酒吧试运营的阶段，Molu 作为当地人，也给 Haldi 提供了不少本土化的建议。比如酒吧里要准备洗手的水壶或者水盆，水里最好还要加点柠檬。因为当地人喜欢直接拿手抓肉吃，这样会更卫生一点。再比如当地人喜欢在榨果汁时加一些姜，Molu 就直接告诉服务员，让她们给加上。

他还建议 Haldi 在周末的时候搞一个只卖桶装啤酒的 Happy Hour。一来可以靠做活动吸引人气，二是因为桶装啤酒要贵一些，一桶价格在两万先令左右，只有那些有正经工作的人才消费得起。这样就可以过滤掉街上的闲散人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图 5 夜晚的生意照样火爆 Haldi 提供

“他自己平时就经常去酒吧，知道顾客喜欢什么样的服务，所以这些事情他肯定比我更了解。有他帮忙，我就省心了很多。”

而作为酒吧真正的负责人，Haldi 将重点放在了收支情况的监督上。“一开始，我们没有雇专门的会计和采购，买菜和收银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的。虽然我的员工也靠得住，但我想，既然要做这一行，我必须把整个流程都搞清楚。”

做过餐饮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极为繁琐的工作。但出于了解当地社会的目的，Haldi 做得很开心。

“头一个月里，我每天都自己开车到市场上买菜，跟市场里的人也都混得很熟。我们需要的菜大概在什么价位，我全都知道。后来我才让 Molu 帮我找了一个负责采购的人。我带着他去买了三次菜，把他介绍给那些卖菜的人，一来二去，就把采购的价格给确定了。”

食材采购回来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准备饭菜。

“这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Haldi 说，“每种食材能出多少菜，其实都是有数的。比方说，一公斤的米，煮熟后至少可以分四份卖。如果卖少了，而且没有被工作人员偷吃，肯定就是一份给盛太多了。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些来吃饭的顾客都吃得可饱了！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没办法，她只能安排专人监督盛饭的量。

“卖少了，他是要负责的！”Haldi 开玩笑地说。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董慧

# 日惹几日几人

曾嘉慧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印度尼西亚

2019年在日惹的日子，很像抽刀断水，又快又慢。

## 一、“这个酒店有游泳池吗？”

当时，我唯一的主日程是在城市偏北的一个私立语言学校上语言课，用英文教学，价格不菲。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每天只上得起一堂课，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课多在一个半小时内结束。语言学校最大客户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或来为NGO工作、或来做生意、或来做研究。我之前对他们并不太在意，因为上课是一对一的形式，我完全不需要和任何人社交。直到进行到第二本书的中段，当我被迫花了两天时间来学习如何订酒店、订机票、订火车票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和老师Andi抱怨道：“为什么我要学这个？订酒店订十分钟，这是什么高档酒店？我根本用不到。你们不是都用traveloka吗？”Andi大笑：“我也用不到！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说过话！”我这才意识到这个课本的荒谬——

“这个酒店有游泳池吗？”

“有的，先生，我们有一个很宽敞的游泳池。”

毫无疑问，课本对学生的预设——有钱、喜欢旅游、注重酒店游泳的质量，比起穷亚洲学生，更贴合这一预设的当然是眼前晃来晃去的澳大利亚白人。不过他们真能用到多少呢？或者这也是印尼老师的想象呢？我无从考究课本的编写过程，但无论如何，这节课之后，我们决定远离课本规定的习练轨道，多谈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和 Andi 谈生活中的事情当然应该用印尼语，可经常是想问很多，词汇太少，最后总不知不觉地滑到了英语。Andi 是日惹的伊斯兰大学 (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 毕业的，他没出过国，但英文非常好。有一次我们学到 bangun(起床)，他顺口问我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印尼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爪哇岛上清真寺的密度很高，平均一公里至少有一个，清真寺广播是城市里最基本的音轨之一。我说：“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Fajr (晨礼) 的唤拜声，经常到了四点就很惶恐，心里暗暗和 Fajr 比赛，要比它先沉入睡眠，一旦听到 Fajr，那就是我又浪费一天的警钟。”他大笑，说那就是他起床的时间，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他这辈子一次都没缺过 (我不太信)，Fajr 后再回去小睡一会儿，晚上十点一定睡觉。

我慢慢潜入日惹的特殊性，这座只有不到五十万常驻人口的小城，是全国最重要的思想引擎。它有将近 60 所大学，包括频出政界精英的 Gajah Mada 大学，印尼最大的艺术院校 ISI 等。日惹以“学生城市”(kota pelajar) 闻名全国，从房租到食物，都在印尼名列前茅地便宜。这座城市在思想上也格外活跃，代表着“现代”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都在这里繁荣。城市里鲜有摩天大楼，中产阶级式的文书工作较少，因此选择留在日惹工作的毕业生，某种程度上

也意味着选择暂不加入城市中产的快车道。日惹物价虽低，但丝毫不让人觉得匮乏或贫穷。它的街头自带顽皮，紧密的友谊和高度的互相信任，可以让人们以很低的经济成本在这里学习、工作和创作，以交友为主的社会网络负担着社会的大量中介任务。另外，日惹也是隐形的伊斯兰重镇，伊斯兰的光谱在这里也出奇地丰富。日惹既是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改革派 Muhammadiyah 的总部，也是印尼瓦哈比中枢 Al-Mukmin 学校的所在地。

课程快结束时，我冷不丁问 Andi 怎么看待同性恋和（施行伊斯兰教法的）亚齐特区。他狡黠一笑，我忽然意识到，他肯定被喜欢游泳池的学生问过多次了。果然，他给了我一个日惹穆斯林无可挑剔的答案：“我不支持沙里亚治国。我有很多朋友是同性恋，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国家正常地生活下去。”

## 二、“L，我可以摘那个芒果吗？”

每天下午五点半的 Maghrib（昏礼）是我一天中最爱的时刻。一整日爪哇明亮干燥的阳光接近烧完，天色由红转黑，赤道的落日总是非常准时，六点十五分，天会全黑。人力车、摩托车的很多司机都忽然一下在街上消失了，他们在软件上转入下线，随机开进最邻近的清真寺，完成功课。一旦有机会，我都会站在家附近的 Kali Code 河边体会这一时刻。这条河几



图 1 Kali Code 河 作者拍摄

近是我见过最浅的河，河石常露出水面，河水急促，遇上河石总要喘粗气。入夜多少令人遗憾，光的消逝总暗示着某种恒久的逝去，是我长期觉得困难的时刻，但四下无人，被清真寺的唤拜、河水的粗气、远处摩托的喇叭声和食物小贩的叫卖声围绕时，无光的夜晚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

几个中午，我和声音艺术家好友 L 去 Kali Code 河边吃饭，他找到一家聪明的餐馆，把餐桌嵌入了 Kali Code 的堤坝。河边的午饭促人沉思，我们聊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L 在雅加达长大，有一点华人血统，1998 年排华时，曾被父母送到朋友家避难——绝大部分华人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他曾在美国留学，因为名字太穆斯林，经常无缘无故被警察上门突袭，他不堪其扰，没读多久就回国了。我们没有聊过这一段，但他英语非常好，写邮件时常常蹦出诗意，可能是他那段生活的痕迹。

有一天，我和 L 说起室友 Rugun 收到父母寄来的雅加达家里的芒果。“Rugun 是这么跟我说的，jia，你尝尝这个芒果，雅加达来的。我很困惑，雅加达还产芒果？结果她说，哦不，这是我家院子里的！我妈妈种的。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如果我和哥哥不在家，她就会成熟前几天摘好，算好日期寄给我们。天呐，我羡慕坏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希望自己有产的一天！”

他大笑，说他们家曾经有更多，芒果树是爪哇家居的标配，可能就像你们有洗衣机一样。这半是说笑，但种植（home garden, pekarangan）的确是爪哇人对于“家”的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归属一定程度上可以跨越阶级，中产阶级种在自己的院子里，贫民区也有街头的公共花园，种类异常丰富，比如在西爪哇万丹的两个邻近街区可以找到 179 种植物。

也因如此，在大城市，将人们从水平的房子挪到垂直的公寓出奇地难，比如在雅加达重建贫民窟，有心的建筑师需要考虑留出大量的公共绿地，供人们种植。绿地是用来种植的，不是“风景”，这和我在中国的经验迥然不同。在国内的城市，“青青小草，也是一条生命”，意味着你和自然的关系邻近却森严，可远观不可亵玩，绿色是现代城市“文明、卫生、干净”的花边。我没来得及细察 pekarangan 的社会根源，但猜想有两个可能的来历，一个是农业国家的种植传统；二是经济极不稳定。1998 年的金融危机，印尼受创最重，全国近一半人沦为贫困，因为印尼盾价值跳水至 1/3（最低时只等同于 98 年前的 1/6），平民百姓的存款大幅度贬值，一度陷入贫困。即使过去二十年，对正式经济的不信任从未改变过，因此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实践一定是人们的备选。

从此以后，我开始留意路边的种植。日惹鲜有裁剪整齐的公共园艺，但是细看这些杂乱无章的植物，似乎都是有效用的。我和 L 吃完午饭，从河边走回工作室，一株庞大的芒果树伸出了院落，比我手掌大的芒果高垂在人行道上。

“L，我可以摘那个芒果吗？”

“不可以，这是别人家的。”

下次我给你带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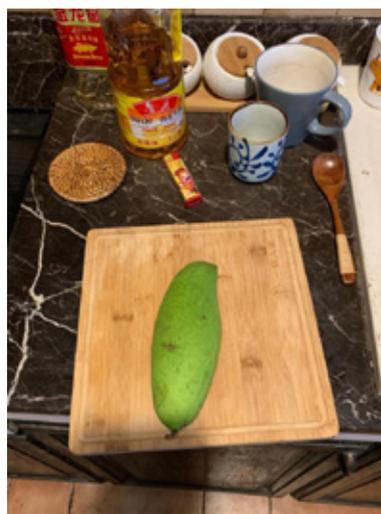


图 2 L 给我的芒果，被我带回了北京  
作者拍摄

### 三、“我们可以结婚吗？”

Nita 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日惹人。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极少闲聊，在课堂的间歇，如果我们无话可说，她会干脆沉默，毫不在意沉默带来的尴尬。这种坚决暗示了一种分明的性格——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Nita 皮肤较黑，双眸深邃，她的少话与灵动更显出内心的敏感。打开她话匣子的契机很特殊，有一天我忽然提起，我住的房子有鬼。好几次近午夜时分，我在房子一层工作，室友们都不在家，小狗 teguh 趴在我身边。一片阒寂时，teguh 会忽然在屋里四处巡视，吼上两声。楼上时不时还会有些奇特的动静。

Nita 问我：“你怯 (takut) 吗？”我倒不太害怕，毕竟鬼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真遇到了，我是彻底的外来者，和它没有世仇。再说了，中爪哇的鬼不会说英文，我肯定听不懂它们说的爪哇话，沟通不畅，应该不会吃掉我吧。Nita 笑说，在这里，鬼无处不在。你看我们上课的地方，这层的厕所，那个转角，都有人撞过鬼。爪哇的房子层高，天花板拱起，鬼喜欢在高处，你去 joglo（一种爪哇传统的房子，屋顶高耸），顶就是鬼休息的地方。她说这话时，赤道的阳光正均匀地洒满窗外，香蕉树沉甸甸地下垂，街边小餐店上的炸物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光亮的。她用 ghosts, spirits, pocong，还有其他我没记住的爪哇词来形容鬼。一想到鬼和我们栖居在一起，不知何故，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甚至令人安慰。

借着我们与鬼的友谊，Nita 终于讲述了她的故事，这个故事十分普通，却最令人心碎。她今年 29 岁了，还没结婚，在爪哇已是严重的晚婚，会为邻居侧目。她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教堂是受人尊敬的长者，她自然也是

基督徒。但宗教对她来说，现在除了是规训和障碍，别的什么都不是。她有一个很相爱的男友，他们是大学同学，刚刚恋爱一年多，感情深厚。这段感情对于她曾经是甜蜜多于折磨，现在是折磨远甚甜蜜，为什么呢？因为她男友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男友来自中爪哇某村落，家里是当地望族，世代经营 pesantren (pesantren 是主要分布在爪哇岛上的伊斯兰经学寄宿学校，往往是爪哇乡村宗教生活的中心，偏传统伊斯兰。现在受宗教事务部认可、采纳宗教事务部课程建议的 pesantren 一般会在课程设置上实行三七开，三分宗教课程，七分普通课程。因为一般不收学费，因此是农村和城市贫民阶层的主要教育选择)，母亲是校长。寄宿学校规模颇大，学生上千人，大部分是从远近的村落赶来上学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男友完全有能力去雅加达或其他大城市谋生，但被母亲召回了村里，现在是 pesantren 的老师。因为学校的周期，他通常一到两个月才有一次休息的机会，村子离日惹不远，大概 200 多公里，但是汽车转火车，来日惹一趟也得六小时余。因此，大部分时间，Nita 在这个城市形单影，她独自来上课，下班后独自回家，少有社交。

“你们考虑结婚吗？”我问。跨宗教结婚 (Interfaith marriage) 在印尼世俗法律上存在操作空间。不过，长久以来，婚姻远不只是世俗法律的领域。1974 年婚姻法将球踢给了个人，“只要婚姻符合双方宗教和信仰，即为有效”，偏保守的宗教领袖就依此认为伊斯兰跨宗教婚姻不合法，MUI (印尼伊斯兰宗教学者理事会) 还曾就此发过 fatwa (教令)。对立志结婚的跨宗教伴侣来说，选项不太多，需要海量的街头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比如更换身份证的假装归信，经济较好的可以去国外登记，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首选。我身边也有在开明的家庭氛围中大大方方结婚的案例。

“我们可以结婚吗？”她反问我。

我愣住了。

“他们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宗教首领，不可能娶非穆斯林。”

“你考虑归信吗？”

“我可以接受……但是父亲……他身体不好，我不可能在他在世的时候改宗。父亲的病是慢病。”

作为女性，Nita 担心的不只是这段感情，还有自己的婚姻机会，毕竟家庭、社区、村落的舆论，都在反对这桩结合。两个月见三四天的周期，听起来也不可持续。“我也见过他妈妈，她知道我们的关系，她看起来很友好，我们见完之后甚至还会发短信问候，天气冷了还会叫我添衣。但她从头到尾，一字都没提过我们结婚的事。这对她来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根本不存在，我们不可能结婚。”

“如果你们真的结婚了，你们要住在哪里？”

“这也是问题，他要我去 pesantren 做英语老师……因为他不可能离开那里。那是他的家族事业，以及比事业更大的东西。”

“啊！Nita，你爱他吗？”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问完我就后悔了。她那么聪敏，知道这个问题等于，“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放弃？”

“你别问我了，我每天都问自己。现在的问题也许已经不是我爱他吗，而是……我可以吗？”

没有一关是易过的。把头埋着或者把头别过去，关都不会过去，只有时间会过去。这次的谈话没有后续。Nita 仍

然给我上课，但之后的课上，我觉得她在有意减少任何我对她私人生活提问的机会。我和她年龄相仿，没有结婚，也面临婚姻机会和家庭压力，但我们的“难”不在一个层级，也并不互通。Nita 下课后就离开学校，绝不多逗留，这里熙熙攘攘的白色的、黄色的、执迷于游泳的学生，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兴趣在中爪哇的某个村庄，一个有女校长的 pesantren 里。对于那里，出生在日惹基督教社区的她可能和我一样外来，也是“鬼都懒得吃的人”。按面积说，中爪哇不大，但它又大得无边，众神的手在这里交叠，缠绕和庆祝。凡人的身体，是最可贵的，又是最可弃的。

注：此文献给他们和 yifei，是她最早促我动笔。近一年过去了，它来晚了，yifei。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董慧